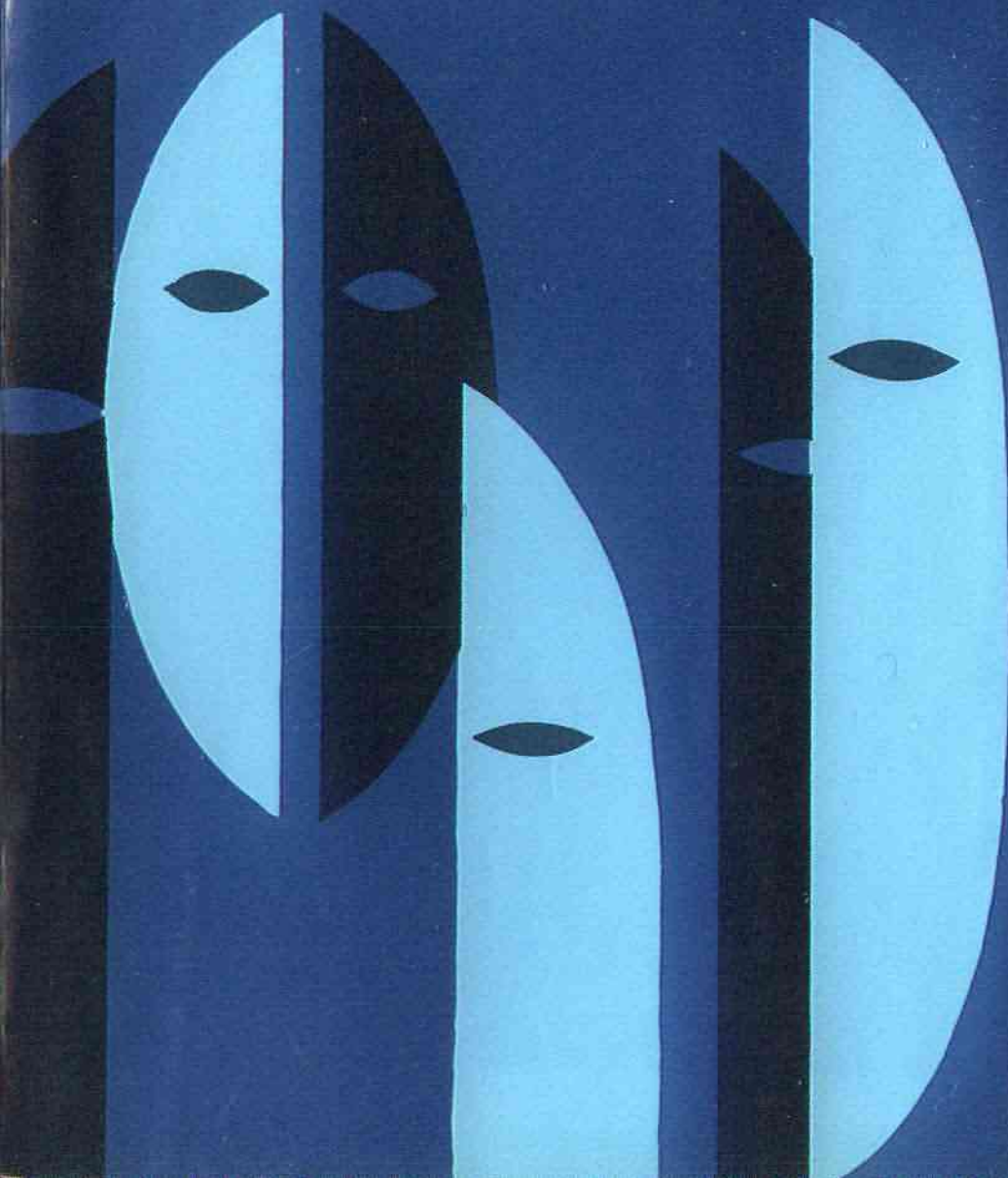


刘宾雁报告文学近作

# 告诉你一个秘密



刘宾雁报告文学近作

告诉你一个秘密

## 目 录

- 告诉你一个秘密…………… ( 1 )
- 他们不肯遗忘…………… ( 32 )
- 书生掌权记…………… ( 52 )
- 孤雁离失记…………… ( 89 )
- 关东奇人传…………… ( 123 )

## 告诉你一个秘密

进入双鸭山，一个总的印象是平静。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马路了，有了一些象样的建筑，新建的公共汽车车站，设计得也很好看。还建起了第一座立交桥……人人赞颂王洪图市长的德政。

但是当这一切在三十年历史中迟迟没有出现时，你也看不见人民有什么不满。我们的人民是尊重和信任领导的，也是含蓄而不易外露的。只有收集民谣的人才能多少摸到一点人们的真实心理和感情：“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市听；一条大街俩岗楼，一个公园一个猴！”这就是对三十年市政建设的一个不完全的总结，因为垃圾满街、污水横流还都没写进去呢。但是就这，已经和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描绘不大一样了。

但是王洪图市长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平均五百人只有一个厕所这个市民们必须每天体验一次的困难，一时就解决不了。为了把这个比例削减一半，你算算得修建多少茅坑！何况人的需要也不只这一种呀。去年以市财政收入新建的住宅只有三十套！在一个拥有四十余万人口的城市，这个数字令我吃了一惊。

所以，这个市的公民们，对于市领导的政绩的反应，也不仅仅是编点顺口溜。在我收到的一封双鸭山的来信里，一位公民就说：“不知怎么的，觉着双鸭山的阳光都不如别处暖和。”

这大约不会是由于双鸭山的纬度太高吧。

## 劣胜优败

双鸭山的地理位置确是有点特别。它位于我国东北三省的东北角，是那个方向上的最末一个城市。从北京去，要换乘两次火车。它看到《人民日报》也要晚上两三天。

“这里太闭塞了，”一位年轻的同志告诉我，“这里的人，你看吧，有点木各章的。”木者，“木然”之意也。

所以，我在这里所写的事，也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很多地区是见不到的。

日本出现了一家“无人工厂”，零件的制造、装配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一概靠机械和仪器进行。双鸭山呢，它的有些情况，有时会使你产生一个感觉：这儿是不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城市呢？

三江平原上每年生产的粮食，双鸭山是一个集散地。当黑龙江的粮食养不活它的两千多万人口时，一部分外来粮食也在这里储存。这样，粮囤就很多了。但是，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些粮食保管的技术和制度，这里的粮食却常常霉烂变质。几百吨上千吨的玉米楂子，说发霉就发霉了。小麦呢，说发芽就发芽了。没发霉、发芽的粮食呢，又常常在加工车间的水坑里泡着。工程师庞秉权设计的全风动现代化面粉加工厂，被拆来改去弄得乱七八糟，以致出粉率年年亏损，质量也低劣不堪。双鸭山

人爱吃玉米糝子，一个人每月却只能分配到二斤。你以为是缺货吧？其实大批的糝子正在粮囤里发烧呢。进来的是上好的小麦，拿到市民餐桌上的，却是又黑又牙碜或者“芽麦”制成的胶粘胶粘的馒头。双鸭山人吃带霉味和带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的粮食，盖有年矣。

这个城市，发展工业的条件本来很好。头一个，不存在能源问题，煤矿就在旁边，工厂不必因停电而“开三停四”。再一个，它是新兴城市，旧工业改造的负担不重。可是地方工业如何呢？一轻局的厂子大部分是半死不活、摇摇晃晃的，有的已经黄了，有的眼看没治了。电子工业不行，机械工业也就靠个平口钳子和手动葫芦。年年亏损。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工业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还靠的是社队企业。一位物资局的同志说：“照这样下去，翻两番得等到哪一年呀？”

“无人管理的城市”？当然不是。主事的人自然是有的。不过你会觉得这里的主人好象心不在焉，又象是随心所欲，办事没个章法，甚至象一个乖僻成性的人，故意把事情搞乱，搞糟，搞垮……

是不是人手不够，顾不过来呢？这几年光是局处级干部就提拔了五六百人，吃“皇粮”的人不可谓不多了。也许，问题出在人的素质上？

这里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叫“大白给”，专指那些干什么都砸锅，废物，白给、免费赠送也没人肯要的人。人家说，粮食局有个名叫李俊川的，就是个“大白给”。他在油米厂干过，不行；调到尖山区粮管所，还是啥也干不了；后来叫他去领导面粉加工厂，又搞得稀里哗啦。没法儿，又弄到工会去担负领导职务去了。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能太

小，还得不断往上升。现在李俊川是副局级干部了。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大白给”就没有一技之长。想当年“文化大革命”，把人关起来动肉刑的时候，李俊川可绝对不是个“大白给”。把人捆起来了，脑袋套上麻袋了，几时动手呢？得看李俊川的信号。他若是倒背着手走出去，那就是说：伙计们，可以“进行”了。这时，猫在窗外的指挥者就能听到室内奏出最动人心弦的音乐了。人打完了，不招供，还得来点软的，这时李俊川又进来了。那人头上的麻袋也摘下来了，这回李俊川的表情全然不同了，他赶忙上去慰问，陪着笑脸说：“这是怎么搞的！只怪大哥我来晚了一步，叫老弟遭罪了！”

“大白给”在另一方面也不“白给”。有个马××，大字不识一斗，在粮食局财务科当科员还不过瘾，提拔到北山粮管所当所长去了。这个粮管所下头有八家粮店，年年都得维修。

马××把这些工程统统包给一个名叫戴宝山的黑包工队长去干。那姓戴的也大方，一上来就甩给马所长五百元人民币作见面礼。接着，就大干起来。这个包工队是轻装型的，自己啥设备也没有，全用“大白给”的。把盛挂面的箱子拿来当灰槽，连铁锹都得由粮管所“大白给”。一项工程需要多少料、多少工也不列个表，由戴宝山随便要，马××随便给。花两万元就能完成的工程，他要了四万七千多元。八个粮店，也就是把屋顶的瓦串一串，一百元都用不了，那戴宝山他敢要八百五十元！

照这么说，双鸭山就没有能人了吗？怎么老叫“大白给”当家呢？

怎么没有能人！每天看着马××“白给”戴宝山干着急的那个李世宏，就是个能人。他眼睛看着，心里算着，见国家白花的银子从姓马的手里往姓戴的口袋里流，心里是急如火燎呀，

可是他毫无办法，因为人家马××是粮管所的一把手，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股长，凡事得听人家的。

李世宏若能总结人生的教训，他也就不去看那令他激动和忧虑的白花花的银子的流向了。那教训是够惨痛的了。可以说，人世间的不幸和痛苦，除了死于非命这一条，他都尝过了。

他是我到双鸭山后最早访问的几位同志之一。看眼睛，他很年轻。然而从他的眼光和表情里可以看到，他在谈话的同时，还克制着某种肉体疼痛的袭击。从尖削的双肩和憔悴的神色看，他似乎未老先衰了。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灾难和肉体受到的非人残害留下的痕迹。

“文革”起，李世宏属于粮食局的“楼下派”，即各业务科人员的一派；“楼上派”则是政工人员，当时的局、科长大都站在他们一边，组织科科长银海江是幕后操纵者。李世宏不仅精于计划统计业务，还能言善辩，对方驳不倒他；又能书善画，一张讽刺画激怒了对立派，被抓进福利屯粮库整夜整夜地非刑拷打，遍体鳞伤，又不许医治。有的伤口刚刚结痂，便有一个名叫薛才的坏人专门来揭去疮痂，以此取乐。结果，他身上的肌肉和移位的筋粘合到一起，神经断裂，造成终生不治的病痛。他的腿萎缩了，步履艰难，上楼梯和上公共汽车都得爬。成天腰疼。由于神经和血管被破坏，失去正常感觉；炕头热得烫手，他坐上去觉得冰凉。坐骨神经疼痛直到耻骨，性功能已全部丧失。他犯了什么罪呢？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他还有功呢。天下大乱那几年，双鸭山市民口粮的供应一点也没耽误，他李世宏就有一功；而那些年煤矿生产没有停顿，又和粮食始终维持着正常供应是分不开的。他的唯一过错就是性子犟，不屈服于压力，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了，他还是口口声声喊：“毛主席，我

是跟着您革命的呀！”不肯说假话，不肯出卖自己的同志。

李世宏的身体简直可以说是“文革”劫后幸存者的一个标本，对于那场灾害及其制造者的一个活的控诉。这一点，“四人帮”垮台以后坐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的银海江也看得一清二楚，便打定主意“决不能叫这小子翻身！”不仅不能给他平反、向他认错，连“公伤”也不能给他算！

那银海江，则是另一种人的标本。这两种人的分化，得从二十几年前说起。佟有祥，论年纪比李世宏大不了几岁。论政治经历，却称得上是李世宏的长辈了。因为他遭到第一次打击时，是一九五七年。

那时候，佟有祥是粮食局办公室主任，刚刚入党，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反右派斗争中，刚出校门不久的化验员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原因是他把一批稻米的等级搞错了。佟有祥想不到秉公直言会成为一种罪行，便起来为张喜春辩护说：“我看是重了。他年轻，缺乏经验，技术也不够熟练。其实，按化验员手册来要求，也没错到哪儿去，只不过是早籼与晚籼之别而已。我看不能说是有意破坏。”几句话，把一个预备党员给丢了。他不服，在支部会上、行政会上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

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嘲弄吧，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补定一个右派，还因为他有一些“反党言论”。他看不起业务上没能耐的人，给一些干部起了些绰号：“大白薯”，“大黑瞎子”（狗熊），“大白给”。而正是从他关进监狱那时起，“大白给”却一天比一天吃香了。

佟有祥看不清形势，偏往狭路上走，受处分以后发愤工作，

把更多的力量使到钻研业务和技术上去了。“大白给”越排挤他，他干得越起劲，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期间，他创造出一台自动无人售粮机，在全国展览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尽管他离右派和反革命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谁知道他档案中是不是写了一条“中右，控制使用”呢），可是已经失去了受表彰和奖励的资格，于是“技术能手”的称号就只能叫粮食局一位副局长给“代理”了。佟有祥偏偏不计较这些，心里还乐滋滋的。别人提级，不给他提，他也不在乎，还不肯改邪归“政”，仍使劲儿攻业务。其后二十多年他命运不济，只怪他执迷不悟，另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谁让你不走呢！

粮食局的两颗明星，就是从一九五七年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冉冉升起来的。几年前还是个搬运工人的银海江，那时是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他亲密战友的段连喜，那时候就是他的助手。就在段连喜天天晚上哼着小调儿给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写定性材料的时候，实践中的政治学和人学发展起来了。银海江就是这一学派的专家。

他的眼睛同时看着你的左边和右边，你会以为他没有看你，其实他始终注视着你呢；就是你不在场的时候，他也在琢磨着你呢。十几年来粮食局换了几任局长和党委书记？唯有他银海江牢牢地留在这里，并且稳步上升。这就因为他是个思维型人物，少言寡语，走路低个头，老是在思索、研究和总结着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心里的道道儿因而就层出不穷。

银海江是颇有“才气”的。他从不自己出面整人。明明整了你，还能让你感激他。表面看去，他确象个古朴厚道，又很有修养的老干部。随着他在政治学和人学方面逐步走向成熟，他能够使一任又一任粮食局长不得不离开那个岗位；能够使科长们

逐渐都成为他自己的心腹；能够使党员们在会上讲的话和私下说的话全然两样；能够使几个月的整党试点根本触动不着，甚至不了解他多年经营的那个体系。

那佟有祥呢，一九五七年以后政治上却老不成熟。不看风朝哪边吹，不想舵该怎么使。除了“白专”以外，当四周一片喜歌时，还常唱反调，说粮食工作有这个缺点、那个问题的，看不见领导人不悦的脸色，不懂得不当“驯服工具”的可怕下场……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浪潮到来了。

这时候，银海江已经是掌管人事大权的粮食局组织科科长，段连喜是保卫科干事。九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政治斗争经验，现在，大显身手的历史良机到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银海江为代表的那股力量同以佟有祥和李世宏为代表的力量之间，优劣高低就看得很明白了。“楼上派”把夺权步骤都研究妥当了，佟有祥和李世宏还在琢磨：到底什么人才算走资派呢？粮食局该不该夺权呢？“楼上派”已经把干部和粮库工人组织成一支杀伤力极强的队伍，准备好囚室和刑具，训练好一批打手了；“楼下派”还在忙于粮食的调配、加工和运输、供应，用一点业余时间写几张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准备辩论会的发言稿呢……

十七年以后，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佟有祥，听他叙述自己的生平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生就一副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显得有几分天真。当他说“李世宏为人正派，精通业务，又勤奋刻苦，一个人能顶他们十个”的时候，我心想：你佟有祥何尝不也是一以当十呢！然而

你们却天然地斗不过银海江们和段连喜们。这是为什么呢？

银海江式的人物同佟有祥式人物之间的竞技，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即使把一方掌权而另一方无权这一点抛开不论，也仍然是不平等的竞技，因为对方完全不遵守竞赛规则。踢足球他动手，打篮球他使脚；你同他个人决斗，他的同伙从一旁放冷枪。那么裁判员哪里去了呢？裁判员是他们的同伙。

### 不祥的“体系”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人为它修史。未来的双鸭山市的史官将会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记载和研究那些有代表性人物的功过和兴衰史。

关心群众，敢说敢干因而人望甚高的葛亚副市长，还有王杰是怎么死的？那些没有死的，又为什么挂个虚职闲着不干事呢？老干部武心田，双鸭山党的第一个支部书记，长期主持过市委宣传工作，德才兼备，人还不老嘛，怎么就硬是不用呢？朱传斌，原副市长，可以说是双鸭山唯一一个懂工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非逼他回山东老家不可呢？人们很留恋他呢。

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人呢？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在“三忠于”高潮中曾全身挂满像章——从脖子到脚，身前身后全挂满，足有几公斤重的有色金属。关于那位姓刘的书记，人们的议论多一些了，因为他上得太快，又说不出哪一件值得称颂的功绩。

老的也不是一概不用，要看你的表现，看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条心，会不会碍事。比如，那位“文革”前主持过公安工作、后来带头“砸烂公检法”的钟某人，就是个信得过的人。老公安、

侦察专家文更新，就不行了。头一个，他是“文革”受罪最重的，感情就不一样。所以他要求到公安局当个顾问，不行，要求“哪怕就让我破破案呢”，也不行。问题正是在于他过分热衷于那个工作，既能干，又认真，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都说双鸭山人排外，那可不见得。那个鼎鼎大名的造反派冯天，不就是打伊春市来双鸭山避难的吗？一来就当副市长，还把“市委常委”的身份也跟介绍信一起转来了呢。这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在市民的记忆中留下的唯一政绩，就是澡塘子工程。他发现市民洗澡难是个问题，决定拆掉原来的平房浴池，盖个二层楼。这当然很好。投资四十万元，建呀建的，建完一层，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建筑材料都拿去建私房了。于是，双鸭山人只能依旧在一个平房浴池里洗澡，只不过新浴池每平方米造价比原先那个平房高出十来倍罢了。

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摆布着人们的命运，凡是妨碍或威胁这个“体系”的安全和发展的人，都被这只巨手无情地推开、按倒甚至扼杀了。

慕润泽在建国时就是个区委书记，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他倒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了。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又坚持正确意见不改，这就威胁了不懂业务的局长；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这就难以博得上司的好感。这四个“不”，带来了另四个“不”：不给安排固定职务，不提拔，不长工资，不分配住房。这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你若是让慕润泽得势，他一旦有了发言权，有朝一日你就得承认现在双鸭山面粉厂十个月损失六百五十吨面粉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你就得承认，当年白花几十万元修建200型榨油厂后来又扒掉，也是拒绝了他的主张的结果。总之，你就得承

认自己无能和有罪，那还得了！

有趣的是在一项工程上糟蹋了国家几十万元钱的冯天始终比曾经阻止国家损失几百万元的慕润泽处于优势。号称“冯大常委”的副市长冯天找他谈话，说：“老慕，你知道，我们俩都是外地人，怕吃不开。咱们得抱个团儿。你放心，跟着我好好干，我决亏不了你！服务局那个局长和书记都不行，我叫你去，就可以提成个局级了。”慕润泽一窍不通，不肯入伙。“冯大常委”就通知粮食局和人事局：“不能给他安排工作；不能给他长工资！”慕润泽后来调到外贸局，冯天的指示又转到外贸局，这时又增添了一个内容：“不能给他分配房子！”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能有这么大！不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吗？就象咱们在日用语言里一样，在生活中，“领导”和“领导人”也是通用的。

舅舅当局长的时候，可以拉扯外甥，让他从税务所里一个小小科员上升为商业局副局长。等外甥成了市委书记，再回过头帮助舅舅。有来有往——我给你儿子弄个文书，你给我女儿一个科长。群众在气愤中说的话，难免偏激，所以应该打点折扣，然而这些话却往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家里的狗要是会讲话，也当上科长了！”至于一般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干活不由东（家），累死也无功”嘛，你得会看眼色，会巴结，会昧着良心顺着说话，还要有所发现（善于感知领导有何需求）和有所创造（使领导家里增添点什么物质，领导心里增添点什么快乐）。你一旦上去了，又可以回过头来享受你原先奉献上去的那一套物质和精神财富。

血缘关系对于这个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五十年代咱们不是繁殖了很多后代吗？到七十年代，纷纷成亲了。双鸭山

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亲家”关系的不下二百余人。志同道合的政治关系、共同的利害关系，再加上这个被孙男孙女联结到一起的亲属关系，你想想要有多强烈的政治激光才能切断这种同盟！

我们很老很老的老祖宗，就总结过这一类教训了。“一物失称(宜)，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汉书·刑法志》)

这个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正是“左”派理论家大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直到把工厂的功能规定为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那段时期。因此，对于双鸭山工业的不景气，理论家的那一份贡献也不应予以抹杀。然而理论家不能就此告退，还得做一次论证：这个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修正主义、当然更不能叫社会主义的体系，也得有个称呼呀。它是什么主义呢？它倒是不“刺激”、不“挂帅”了，只搞“专政”不务生产了，那么这些人工资以外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实的而非抽象的理论问题吗？

双鸭山曾经是闯关东的人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出山海关，就是双鸭山”嘛。一九五八年以前，这里也还比较讲究经济效益；对于干部的要求，也曾有过一段纪律比较严明的时期。那时候粮食部门的人谁若是糟蹋了三五斤粮食，就得好好检讨一番；要是损失了一百斤，就得处分了。后来，政治来冲击经济了，它越来越比经济吃香了，所谓“大折腾”、“大轰隆”，无非就是只图政治上好听好看；一大二公，彻底、痛快。只是忘记了一件事：穷困会成为邪恶的土壤，对于政治和精神上的崇高和纯洁是很不利的。那时候，在批判和清除各种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的时候，又忽略了为害最重的一种个人主义——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它倒是并不在求知和创造上搞个人奋斗，因而不属于“白专”之列。它是“白贪”，“白”是不费苦功，不担风险，只须看风使舵，大吹大擂，弄虚作假，整人拉帮；“贪”是“一抓权，二抓人，三抓钱和物”。这伙人把国家搞穷了，自己上去了，回过头来就从这个穷中大谋私利。

麦麸甚至酒糟为什么在双鸭山有那么大魔力呢？无非是由于这些东西匮乏，而人们收入又低，必须在城市里养猪养鸡，贴补家庭开支。手里掌握户口和粮食关系的人又为什么那样神气呢？那还不是由于经济破坏扩大了城乡差别，人人都想进城吗！若不是瞎折腾破坏了经济，就业和升学也就不求人。

同时，只算“政治帐”而不计经济得失，又使国家法制和经济工作的各项制度松弛了，这就给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很多自由。这些年，“渎职”这个词几乎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权力一旦同责任脱了节，就自然会自由奔放起来，党纪国法在后边紧追，也难以使那匹脱缰的野马就范。

现在担任浸油厂厂长的袁福，得意洋洋、满面春风地带领我们参观现代化设备。就象这套机器是他发明出来的。他自命为有功之臣，因为工厂是在他的主持下建成的。为了礼貌起见，我没有向他提问：这个工厂非用二百多万元钱建不成吗？投产半年了，怎么决算还拿不出来呢？那四十多万元的材料都到哪儿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上来，纠正“左”的错误，想方设法使人民富起来，这将从根本上清除黑暗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些在“文革”时期对“上边”听话、紧跟、雷厉风行“不过夜”的人，现在忽然泄劲了。历

年来在各种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声嘶力竭呐喊和不计后果猛干的英雄们，现在忽然变得三心二意、软弱涣散了。

三中全会过去五年了，双鸭山市委好几位书记，还没有有一位管一管经济的。有了问题去请示，回答是：“我是搞政治的，别的不懂。”“文革”期间这里有七十多人死于非命，却一个凶手也没抓到，这应该是“搞政治的”书记的本行了吧？可是你再去问，书记又说：“双鸭山有没有‘三种人’？我说不清楚。”

### “左”派忽然右了

这位书记还是主管政法和纪检的。我们仔细拜读了赵书记一九八三年春季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双鸭山应该是全国的模范，因为自从“四人帮”一倒台，市委就抓清查工作了，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个办公室、那个工作组，不知成立了多少！……这份报告写得相当漂亮，天衣无缝。拿到一九九〇年仍可一用。问赵书记，听说现在市委主持清查工作的那个人“文革”期间就是一个车站的群众专政队队长，那个专政队成绩还不赖，打瘫过好几个人，你知道吗？赵书记表示惊奇，说他不知道。向他指出，你们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最近提为市卫生局局长的杨玉乔就在手术台上故意多施麻醉药，害死了粮食局的优秀工作人员赵杰。这人，该算得上“三种人”了吧？赵书记迟疑片刻，回说：那人是有毛病，但他的问题大家认识总是不一致……我们向赵书记列举了杨玉乔蓄谋杀人的许多人证，他未予否认。

粮食局的纪检科副科长夏重义，人称“老根本”，意思是“正统”，认真，按原则办事。一九七八年让他去搞“揭批查”，后

来整顿班子、考核干部，他都按老规矩办事，象过去搞运动时一样认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核实，依据大量材料断定：一九六七年率领工宣队进驻福利粮库的吴××曾“残酷镇压群众、迫害干部和技术人员，私设公堂，对三四十人刑讯逼供，致使二人死亡，四人伤残。”可是，当时市委正要让这个吴××去主持全市“揭批查”运动呢！夏重义跑到市委多次提出抗议，管事的张××硬是不同意。要查吴××的问题，张××又说：“这人可有心脏病，弄不好说死就死。还是先找个没病的查吧！”坚持要查，他又说：“是不是先把材料送来？”夏重义说不行，非和吴××本人谈谈不可。张××说：“那就谈吧。可是得好好谈，不能逼他，别施加压力。”说定第二天谈。到那时候一去，你说巧不巧，人家吴××住院了！说是突然生了一场怪病，老是冒汗。一住就是十几天。出院了，也叫冤家路窄，竟在街上叫夏重义碰上了。一见老夏，那姓吴的就心惊肉跳，又冒汗了。这回不能再住院了。把市揭批查办的一位负责人找来，一起坐下来和姓吴的谈，一条一条问，小的都供认了，一问到要害——那粮库革委会主任、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赵发是怎么死的？用火怎么烤的？明知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饮食上怎么折磨的？他支支吾吾，不说实话了。后来银海江也出来保吴××了，说：“赵发那案子，早点结了吧。人家家属困难，平个反，给几个钱就算了。过去的事，有的也讲不清楚了，何况还涉及到市里，咱也不好办……”不久，吴××就提拔为市城建局局长，走马上任了。

这就难怪“三种人”敢于在没有被他打死的人面前这样亮相了：“怎么，我就是斗你、打你了，还打轻了呢，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你要没死，我还要斗你！”

历来的政治运动大多是偏“左”的，唯独这一次清查“三种人”，忽然右起来了，还右得有点儿邪门儿。中央三令五申，若是在过去，各级党委和政工干部还能不紧跟哪？就说银海江吧，一九五七年夏季是粮食局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那时他斗志多么旺盛，气概曾何等轩昂！青年化验员张喜春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把一车小麦的等级定得略微低了一点，你不就定了他一个“反革命破坏罪”吗？办公室主任佟有祥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取消了他预备党员资格，还降了他两级工资呢。你，还有你那亲密助手段连喜，就是靠搞这一套起家的呀。怎么时到今日，你们全变了呢？吴××和薛才（打人、折磨人有功，当上刑警队长了）这类人物，今天即使真犯下“反革命破坏罪”，你们也会给他来个“缺乏经验，致使把小麦等级定得偏低”的结论。总之，你们当年“左”得多么邪乎，如今就右得多么邪乎——不过这话得说明白，这种右，仅限于对待自己人。至于对别人，比如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你们的态度就一如既往了。

那个“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自己人”提上去，出了漏子的时候想方设法保下来。非查不可的时候，派去的人能把大事查小、把问题查没；这边还在审查呢，那边已经在补发工资、“落实政策”、甚至提级升官了。

乔文海不过是很多人中间的一个。他在刑警队工作的时候，有一回就丢了一个内装二千元公款的提包，无人证明属实，也没有查究。当粮食局招待所所长不到三年，赔了一万三千多元，有贪污。纪检委书记高云吾去查，银海江找他说：“乔文海的问题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再查啦，让他走算了！于泉生（商业局长，就是市委刘书记那位舅舅）是他舅舅呢。”高云吾说不

行，还得外调呢。那位书记说：“现在有个单位要他，是不是就算了？调走，把情况告诉那边。”高云吾照办了。他若不办，会怎么样呢？“黑宋”那案子就是个例子。贪污了两万多斤粮票，查了办了，整党的会议上就批评了办案的人搞“极左”，“逼供信”。

这也是个反常现象。历来办案的人都是吃香的。你看“文革”那些年来个公文包四处颠儿颠儿地搞外调的人多神气，大都是受信任、要提拔的呀。真是怪着呢，这几年讲实事求是了，查的基本上都是真正有问题的人了，可是办案的人倒低人一等了。市物资局那起大贪污案，中央都派了工作组嘛。可是，同坏人斗争最坚决并卓有成效的姜百峰倒叫人给揍了。打他的不是别人，还是分管物资局的市计委副主任杨作金。那打人的场景也怪奇特的。副主任接连打了姜百峰七个耳光，一边打一边说：“我就打你了！我就是为打你才来的！你再去告呀！我打的就是你！看你能把我杨作金怎么样！”

主持调查这起大案的物资局党委书记于万有倒是还没挨过这种耳光。他挨的是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耳光。工作组进驻物资局那天，把贪污分子、局长于喜堂调到党校学习，同时把反对这个贪污最坚决、掌握材料最丰富的于万有也弄到党校去了。

后来，于喜堂还是判了刑，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劳改场。他在看守所里当上了食堂管理员，几乎天天可以到双鸭山来自由活动，乘机还可以到一个情妇家幽会呢。

于万有呢？他的家几次被盗被砸，孩子和妻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迁回湖南。他本人呢，不许他回物资局，说是出于爱护，因为于喜堂在那里的势力太强大了。湖南又回不

成，还不如于喜堂呢，人家不管怎么说还有份儿工作呢。

## 艰难的搏斗

“体系”经营了不止十几年，应该说是够牢固的了，可是他们并不放心，老是怕来之不易的权力易手，所以眼睛老是盯着那些德才都比他们高出多少倍的老干部。老干部们担任的已经都是虚职了，他们还不放心。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十二大决议的时候，不敢安排一次大会发言。选举市人大常委会，直到投票的时候，才敢让大家知道候选人是谁，还如临大敌似的郑重警告：投票前不许串连！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想到，当我们党已经有了一条正确路线的时候，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是正派的老干部。他们把普通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了。结果，竟让两个小人物把“体系”的大幕给揭开了。

杨玉辰，十几岁上就在粮食部门被打成右派，还不老老实实脱胎换骨，一九六二年见岭东区粮管所有人销毁了全部粮食供应册籍，又跳出来捣乱了。人家粮食局长不急，他却认真起来了，说册籍是“一切合法凭证的核心”，册籍一毁，粮食供应非乱不可。还真被他给说准了：出现了一家人轮流排队买粮的局面。于是只好一次只卖一、二斤，买粮队伍一排好几里长，造成缺粮九十多万斤的后果。他主张追查，他反对写假报告，他碍人家事，他得罪了一大群人，还大都是官职比他高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先是说他是右派，不宜担任粮食计划调配这样事关重大的工作。那就调动吧。嘿，忽然又变了，取消了他的干部资格，

让他到农场劳动了。他想不通，人家却不等他想通，又变了；停发工资。接下来更干脆：给他几十元钱，叫他退职了。这个决定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的那位段连喜宣布的。杨玉辰质问他：“我有什么罪？就是有错误，不也得给个活路吗？”段连喜的回答很简练：“看你这态度——你等着吧！”

杨玉辰想：好人挨整，这还有是非吗？共产党解放了他全家，不至于这么对待他吧？想必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他便逐级上访，直到中央。粮食局派段连喜等人两次追捕，家里等着他的的是一个全粮食系统科长以上干部的大会。一进会场，就听见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整齐而响亮。你以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吗？不，还早着呢。时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接着就是带上手铐，一根草绳子把双臂一捆，送去“劳教”了。一去就是二年，连家属都没有通知。一家六口人，还全靠他养活呢。

有十年时间，杨玉辰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那正是只许讲阶级斗争、不准讲人道主义的时代。也许目的是为了使杨玉辰的妻子张凤兰也跟他一起经受一番锻炼吧？效果很好。杨玉辰不肯认错，这位非凡的妇女也不肯去劝丈夫认错，咬紧牙把养活一家人的担子挑了起来，承受着莫大的政治压力、人格侮辱和当个临时工都受到的刁难，还要为丈夫的安全提心吊胆——杨玉辰“劳教”归来以后，仍然没有工作，或者虽有工作，报酬和口粮仍被无理克扣。走到街上，什么人都可以打他和骂他，长期的折磨和刺激使他有时神志不清，出了门就找不到家，所以妻子必须常常跟随着他。

比饥寒更难忍耐的，是一家人遭到的凌辱。幸而就是在“阶级斗争为纲”喊得最响、实行得最彻底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

姓和许多干部也没有丧失对于不幸的好人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和帮助，抵住了残酷的打击报复，使杨玉辰一家得到安慰和鼓励，勉强活了下来。他乘火车去京上访，列车长允许他不买车票，甚至还供应他饮食。他饥肠辘辘，有人送给他食品。他付不起住宿费，省粮食局和报社的招待所还让他长期居住。全家人断炊时，热心的邻人送来了几斤面粉或一盆玉米面。三九寒天一家人没有棉鞋时，早晨开门一看，有五双不同号码的棉胶鞋摆在那里。尤其是邻居魏殿斌一家人象亲人一般的关怀和资助，都不仅缓和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危机，而且给那间在漫长的严冬里墙上总是结着白霜的屋子里多少增添了一点温暖。他们深知，人们每送来一点粮食或燃料，每递过一个笑脸或几声慰藉，都担着政治风险。

然而杨玉辰上访十余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他能够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他的实际政治身份始终是“右派”兼“反革命”。粮食局日益严重的腐朽，仍然无人过问。“体系”的那个法宝——打击报复，丝毫也没有减轻它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威力。

如果这仅仅是杨玉辰一人或一家人的遭遇，也就没有一写的价值了。打击报复，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有了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现象，杨玉辰还并未体验到它的全部内容。若按轻重不同的层次排列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带有贬职意义的调动或降职；停止工作，或曰剥夺工作权利；停发工资；人身攻击——造谣污蔑；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政治陷害；肉体摧残。与此相伴随的，是在调资提级、家属户口和工作安排、住宅分配等等方面的歧视和刁难。

应该说，正是在中国解放以来最黑暗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中，一些有利于杨玉辰的历史性变化悄悄开始了。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双鸭山一大批老干部成了法西斯迫害的对象。

杨玉辰与前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坚坐到一起、相对痛哭的那个场面，是有历史意义的。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文革”前杨玉辰曾是统战部的管理对象。杨玉辰开始上访时，找过刘坚，刘坚把他支到粮食局。一九六四年九月粮食局开大会，批斗杨玉辰上访，并当场剥夺他的自由，刘坚是在场的，他支持了这一行动。

“文革”开始，刘坚才体验到并且理解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的那些“左”的错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四人帮”垮台后，他名义上虽然是市委委员，实际上受到排斥和冷遇，最后连自身的起码权利都遭到侵犯：他的住宅被人强占，下水道被人堵死，电源被人掐断。双鸭山市委对此不闻不问。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常常为自己的处境如此凄惨和双鸭山市党风的败坏痛心疾首。这时，他重新认识了杨玉辰，对杨表示自己的悔愧之情。杨玉辰进京上访，他捐助五十元钱给他作路费。

“文革”中遭到残害的工程师庞秉权，是一位有头脑和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这时对杨玉辰多年来的斗争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他想助杨玉辰一臂之力。他真的做到了，使杨玉辰的战斗力的战斗力翻了一番。经庞秉权介绍，杨玉辰获得了一位忠实的战友——福利粮库的会计刘金海。

## 最可爱的人

杨玉辰有一句名言：“他们把事情干的太绝了，能把哑巴

都逼得说出话来！”

刘金海，就是他们逼出来的一个。你看他那个模样——黑黑的脸盘上老是留着一丝憨笑；一笑大发了，就露出两排叫烟叶熏黄了的牙齿，分明是个老实厚道、再“好说话儿”不过的人，根本不是个打官司告状的坏子。他在老家农村里就是当会计的，“盲流”到东北，还是当会计，做事情也象记帐一样，稳稳当当，有板有眼。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倔”，撞上南墙也不回头。老实人一“倔”，就不好办了。

业务上，他是个能手，也是靠天天晚上在灯底下学出来的。也许就因为他太喜欢会计工作又太认真了，他把帐目的真实、精确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就把他卷入了矛盾的旋涡。

油米厂的食堂，用不花钱的饲料养猪，小克郎一长长到三四百斤一头，可是头头还都赔钱，这不邪门儿了吗？这个食堂，最多也就十几个人吃饭，可是一亏就是好几万元，这不是向会计工作挑战吗？一查，就查到厂长袁福头上了。食堂的猪场就象给他家办的；他可以随意来牵走一百多斤重的猪，出了毛病还牵回来再换一个。上行下效。那老蔡，一家七口，初来时穷得丁儿当儿的，现在每顿饭没有好酒和四个菜他就不吃。刘金海干工作不怕事多，管的帐一多，就发现这福利仓库就象个大漏斗，国家财富哗哗往外流……

他最初想到的，还是自己的责任问题。当初考会计的时候有一道题问的就是会计的职责，他记得很牢：不和违反财经制度的行为作斗争，会计就和违法乱纪者同罪。于是，他就去找袁福，好言相劝：“你那猪，还是把钱交了吧，不然查到你也不好。我作会计的也不能替你隐瞒。”想不到那厂长把眼睛一白愣，说：“不要紧，出了事我负责！”刘金海那个“大倔子”劲儿上

来了：“你负啥责！厂长带头这么干，还搞他妈什么经济核算！”

这一“倔”，就把一级工资给“倔”没了。他刘金海在全粮食局会计考试中名列第二，大部分季度都是先进工作者，这次百分之四十的人提工资，群众讨论三榜都题了名，凭什么给拨拉下来？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一层层往上告，人家根本不听他的。这一“告”，又把领导给得罪了。刘金海还不思悔改，继续往前闯。开职工代表会议，需要作个财务报告，本来是股长的事，也是袁福轻敌，让刘金海上台了。他呢，一上去就把食堂的事给抖落出来了：食堂帐目亏损一万四，养猪一项就赔了七千多……袁福等人赶忙制止：这个不必说！可是代表们兴趣大，非叫刘金海说完不可。这就捅了马蜂窝。打击报复又升了级，撵他走。可是，时代毕竟变了。刘金海不走，他们也毫无办法。没强行停止他工作，没扣发他工资，更没送他去“劳教”。

刘金海比杨玉辰幸运得多，他从没有感到过孤立。中国这二十年的历史带来的进步，是人们不那么盲目随从，能够自己判断是非了。在福利粮库，象刘金海一样心疼粮食，关心国家命运，因而痛恨那些败家子干部的人还有很多。看大门的警卫告诉他什么人、在谁的指使下偷运走多少粮食、豆油和木料，搬运工人告诉他自己某一天运出了多少霉烂的粮食，车间里的工人说某个星期一连烧坏了五台电动机，各个单位的会计和出纳则把各种营私舞弊在帐目上留下的罪证向他展示出来。足足有几十个人，一方面不断向他透露信息，同时往他的动力锅炉里投放燃料。

当然，也少不了向那个锅炉里浇水的人。“你跟那杨玉辰一块儿扯个啥？他都闹二十年了，没弄出个什么酸甜！”刘金海咧嘴一笑，说：“现在不一样了——党中央提倡我们和坏人斗，

这是一；第二呢，坏人也比二十年前蝎虎多了。不斗，这国家不完了？”“别跟杨玉辰瞎掺和了，他手里那些材料都是虚的。”刘金海又乐了：“那怕啥？我这里可都是实的呀，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正好虚实结合嘛！”

刘金海老是抿着嘴儿笑，不认识他的人还当他小日子过得不错呢。他前院儿的邻居，劳动模范朱××，大春天就吃不完各种细菜，豆角儿都晒成干儿留着冬天吃。老刘家呢，一年也吃不起一顿豆角儿，全家人就靠一缸大酱下饭，多亏他妻子的娘家亲戚，不然餐桌上就可能一年不见绿。可是刘金海和他妻子白玉芝并不羡慕那位劳模，知道那人是靠昧着良心替领导隐瞒粮库里的严重问题得到赏识和入了伙，才过上好日子的。一到外边下雨，刘金海晚上就得趴在炕沿上观察地上的水势，过一会儿就得爬起来拿盆子往外头舀一阵子水，不然，那水就能涨到炕上来。这也是那位劳模享受不到的乐趣。

他在日记上管媳妇白玉芝叫“爱妻”，那的确是一位可爱的贤妻，对于刘金海不肯同流合污、不拿良心做交易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还常常给他鼓劲儿呢。常说：“宁肯受气吃亏，也不能拍他们马屁！比这苦的日子，咱们也不是没过过。咱们不跟别人比，跟旧社会比，不是还没要饭逃荒吗？党中央要是听得进去咱们的话呢，再受点罪也值得。要是听不见，还让那些混蛋当家主事，就算咱们这一辈子活该倒霉，也没啥了不起！”别看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在农村也是共青团员，当过妇女主任，比丈夫主意还多，因而时常进行一些指导：“你呀，狗戴帽子你都当是好人！往后看人，得看他背后怎么议论别人，当你面儿哪有不说好话的！”刘金海点头称是，满心佩服，说：“你真是我的好参谋！”这时，爱妻便往往会递过一句酸不溜丢的话

来：“哼，谁让我摊上个好丈夫来呢，全家跟你沾光！”又怕丈夫难过，赶忙追加一句：“那能怪你吗？反正咱们没做亏心事，对得起中国人！”

白玉芝心里也憋着一口气。粮库和附属单位用人，得优先录用职工家属。白玉芝在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精明强干，眼明心细，出酒率比别人高。也因为眼明心细，她发现了酒厂厂长带头偷酒——弄个塑料管儿通到盛酒的大木箱里，下头用塑料桶接着。还没等她去揭发呢，不清不白地把她的工作给停了。明摆着呢，是为了打击刘金海——宁肯去农村招临时工，也不能让你家增加收入！白玉芝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从不叫苦，还要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不露一点寒酸。有难处，全瞒着丈夫；借钱借粮的事一概不让他知道。

杨玉辰头次到他们家来的时候，白玉芝还特地到街里买了几条刀鱼。见她把米口袋抖落光了，老杨心里很是难受。白玉芝一边做饭，一边说：“杨大哥，现在老实人吃不着香，吃亏的事倒包了。你按政策办事，人家就把你当眼中钉。都这么胡来，还能叫共产党吗？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国家不完了吗！”这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们夫妇间常说的。往往是在晚间，他们望着熟睡的两个孩子，说起这个话题。酣睡着的孩子，显得特别可爱。孩子出息得很好，一男一女，又漂亮，又健壮，学习成绩也好。可是国家要是叫那些败家子儿给踢荡完了，这些孩子将来还不得遭罪呀？……

刘金海到杨玉辰家里的次数更多些。老哥儿俩一见面，杨玉辰就特别兴奋，把历年来写的材料抱出来，在地上摊开，挑选这回用得着的数字。刘金海呢，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小本子，把近几天收集到的新材料一笔笔念给杨大哥听。然后，两

人就研究给北京的第二百几十封信怎么写。张凤兰呢，一边在外屋擀面条，一边侧耳细听男人们的讨论。老杨总是太兴奋，教她不放心。这不，方才他放着自己面前的茶不喝，把客人的杯子端过来喝了。昨天他明明要叫女儿，却不断喊儿子的名儿。他的神经分明有些不正常了。一想到这里，老杨在大街上被孩子们追打，老杨出狱那天她用最后一点钱给他买的那件褂子被人一把撕破，老杨十冬腊月穿着露脚趾头的破鞋去北京告状……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就又在眼前出现了。凤兰强忍住眼泪，想使自己从一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她不愿意老杨看那些材料，希望他跟自己多活几年（他这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右派”的问题平了反，孩子也大了，这两年日子才稍微舒心一点），可是她又知道老杨的命根子就在他二十年来为之豁出一切的那场斗争里。不让他干，他就发呆了，他就象没了魂儿似的，那也活不长啊……

两人核计完或者写完又一封信，刘金海这才到马路上去截车，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搭上一趟车。不管怎么晚，他非得赶回去不可，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一定得准时上班。让那些反对他的人找不出一点岔子，是一件乐事。他刘金海敢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儿叫号儿：“不是要整我吗？去查嘛！看我拿过公家一捆草没有！”一身清白，毫无贪图，不依附于任何人，是他的骄傲，叫那些人站出来跟他比一比！

### 一旦他们强大起来……

刘金海说：“坏人还是怕好人。”为什么呢？油米厂帐面上那二万四千元，是粮库几个领导人心里的一块病，老来找他。

现在是求他了：把食堂的帐核销了吧！刘金海说：“不行，还没查清呢。”袁福说：“那么多年了，谁能查得清！”“怎么查不清呢！我就能查清。三座大山都推翻了，这么点小土堆弄不平它！你去告诉张局长，给我配个人，我准能查个水落石出，还管保不怕得罪人！”过几天，袁福又来了：“不核销不行了，不能老在我帐上挂着。”他有点动火了。刘金海说：“急什么，慢慢说嘛。这事儿还是我告发的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先搁着呗。”袁福给点了根烟，叫他抽，抽就抽。这回是恳求了：“老刘啊，帮帮忙，把那鸡巴玩意给核销掉了！”“你老找我干啥？我得听局里的。你叫局长开个条子，命令我核销，他签了字，我一定照办。”哪个局长敢签这个字？……就这么着，翻来覆去多少回，刘金海运用他手里那么一丁点儿权，那些人硬是没有办法！

中国的小人物们，手里的权要是再多一点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啦。杨玉辰和刘金海现在正在做的事，也许就在起一点儿这种作用。可是眼下他们还是不能不听到官职高几级的人说这种话：“你们上访顶个啥！谁听你的？你上北京跑一千遍，看谁能给你解决问题！到哪儿去告，也得我粮食局党委给你办才算数。你还能上联合国？”这种话，多噎人！也有点儿令人寒心哪。你还不能不承认它里面有一定的道理。杨玉辰这二十年跑碎了多少双鞋，他的命运不还是攥在人家一级党委的手心里吗？国内各地有多少申诉信转来转去最后落在被告人的手里！说句公道话，双鸭山还有了很大进步呢，至少刘金海不会被抓去“劳教”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走出几百里，因上访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就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要说违反宪法的事，双鸭山还有一丁点儿；杨玉辰从北京写给刘金海的信，

教人家给偷拆了。那是人家自己暴露的，可见偷拆个信什么的算不了什么。那天，宗××经理对刘金海说：“老刘，你又和老杨往《人民日报》写材料告我啦？告倒我们，能有你们啥好处呢？能当个局长？再说，你也告不倒嘛。”问他怎么知道的，说是看了杨玉辰从北京发来的向刘金海要补充材料的信。怎么看到的呢？“在厕所里拣到的。”

有时候两种人不能相互理解，就象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宗××认为刘金海是想弄个局长当当。还有人说：“给杨玉辰一个科长，他就老实了，不会告状了。”还有人说，这些人染上了上访的瘾，吃到甜头了，成上访油子了。

其实他们是逼出来的。那上访的日子是好过的？有人一听“这人是上访的”，恨不得地遁了才好呢，就象碰上染了鼠疫的耗子似的。形象的确不很雅观，往往是蓬首垢面，满面晦气。夜卧站前广场，空气倒很流通，可是不是太冷就是太饿，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收容”起来。

宗××同志，你们若是收敛一点，比方说，偷偷盖几间房自己住住，而不要再拿八万斤酒糟去换地皮，用公家的砖和廉价木料盖房子，又一转手高价卖给公家（说“这是我爹盖的”）；你们若是把坏事干得隐蔽一点，别那么刺激人；你们若是逐渐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对国家财富的掠夺和糟蹋，杨玉辰和刘金海式的人物就会少起来，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冷淡下来，他们本人的“上访瘾”也就会慢慢戒掉了。中国老百姓是很宽容的呀。

可是你们不，失职、渎职和公然毁灭国家财物的行为还在逐步升级，这教人怎么消得了这口气！一九八三年春天，一家伙就坏掉了几千吨上好的包米糝子！这可是历史最高纪录呀。你

们不承认，统一口径，把数字缩小为三百三十二吨；你们不检查；工人跑去粮食局告急，你们的人还在办公室打扑克玩儿呢。

你们这就是双重的犯罪了：经济破坏和往共产党脸上抹黑。你们去听听双鸭山的群众和干部在说些什么……

## 乌云不散

咱们先得交代一下：前文中所写的所有现象，二十余年来都是秘而不宣的。近几年有案可查的，是一位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对口赛”还是“对口吃”》，批评商业系统大吃大喝的。此外，市、省和中央报纸上对双鸭山的报道，大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对口吃”一次，算得了什么！可怜那位作者，先是被市民们当作英雄般敬佩，可是没有几天，他一倒霉，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可笑的唐吉珂德了。从此六年来所有报纸对于我们前面所写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保持缄默。所以，我们敢担保，如果双鸭山市人民中间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人民日报》一月六日发表第一篇揭露双鸭山问题的文章）以前对于本市党政领导有什么不满，那绝不是记者煽动的。

看来，至少在双鸭山，至少在以下问题上，人们精神上消极的东西不是来源于可怕的文字，而是从一些比文字更生动、更坚硬、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源源流入人们的头脑的。

一位长年在粮食系统工作的党员干部说：“眼看着这些人把党糟踏成这个样子，心里发疼呀。好好儿一个党，斗争了几十年，能自己把自己打倒？……我有了厌世情绪……”

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位女同志说：“工人党员绝大

部分都是好的，就是这些干部把党的形象给破坏了！整党，不搞运动可以，可是不能便宜了那些坏人。非开除一批不可！”

再听听工人的。六十年代，杨玉辰在砖厂当过几天临时工，身上缺衣，肚中无食，累得直摔跟头。一位名叫赵锡奎的四级老窑工，一只手残废了，用另一只手扶他到自己家里，从此成了至交。后来，当妻子一看他弄揭发材料就心烦的时候，杨玉辰就把刘金海领到老赵头家里，在那儿一宿一宿地写。老赵头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把老杨和老刘找到跟前，说下了他这辈子最后的几句话：“……那些科长、局长、厂长什么的，都是属猪的，给他们一点麸子就能喂住，什么原则不原则、政策不政策的，都不在话下了。你们揭发人家，碍了人家的事，人家还不千方百计干掉你们！现在科级干部肥了，局级干部更不用说了，他们连接（钱）带搞（女人），就没有人能制服他们，一个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那些要德没德、要才没才的人，多年来混在党内，不干好事，只会败家，这是党和人民的祸害呀！‘人多架不住死，家大架不住败’，现在那么多败家子儿钻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自己干坏事还不算，还作假案，害人灭口，不想个万全之计清掉他们能行吗？……杨老弟，你和金海俩要好好干，把力量合起来，千万别泄气。你们不成功，我死不瞑目呀……”

那些人不怕给个“党内警告”、“建议行政撤职”之类的处分，却害怕大名在报纸上和人民见面。一九八〇年以后，杨玉辰和刘金海偏偏把工作重点放到党报上。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人民日报》记者两次到双鸭山市采访。一九八四年年初，发表了两篇报道揭露双鸭山市粮食系统和党内生活的严重问题。黑龙江省领导机关已经派出调查组到双鸭山来，目前，

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双鸭山市的干部和群众正以极大的期待注视着调查组的工作。这些年，省里、市里的调查组、工作组什么的也没少来，但愿这一次不要再把问题给查没了；也不要象有的省那样，把文章里写的一条条全给推翻了，说“批评全部失实”，三年以后再翻过来，承认“全部属实”。

有时候你想保，怎奈那被保的人也太不争气。调查组本来想否掉“上千吨”玉米发霉变质，已经打道回府了，双鸭山又来了长途电话：“不是上千吨了，根据计算，发霉变质的粮食上万吨了！”想否掉玉米，又来了电话：小麦也出了问题——五千斤小麦生了虫子，有人还把每公斤小麦生虫“17”至“227”都给计算出来了！

群众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听到有人大骂记者，市里又风传“杨玉辰、刘金海和夏重义都给抓起来了”；一些声名很坏的人还在荣升；新任副市长宣布对有严重问题的企业“不追究个人责任”。于是，百姓就不免怀疑：“用自己的刀割得了自己的尾巴吗？”

## 他们不肯遗忘……

——联邦德国散记

机舱外面，始终是黑夜。连续十七个小时，我们吃了四顿饭，却一直生活在夜里。这是因为我们是追着太阳后面的黑影西行的，有点“一命归西”的意思，不太吉利。

带了三本书，有两本是与我正前往的联邦德国有关的。我翻开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但没看上几页，就被邻座的客人打断了。一位荷兰人，是到北京做煤气制造生意的。象每一个外国人一样，对于在中国旅行太短、看的地方太少表示由衷的遗憾。他叫住空中小姐，要买些礼物带给他的夫人和孩子。我见他没付钱，交出一张小小的信用卡。西德航空公司在巴基斯坦上空，可以相信一张荷兰人的信用卡——世界毕竟进入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

窗外始终是一片漆黑。直到接近法兰克福机场时，天才微微露亮。这里好象刚刚下过一场雪。向下看去，在一片白色的海洋中，有一片又一片大大的黑色岛屿，我猜想那一定是市区的树林。我猜对了。

在德国上空飞行，已经往返过两次，却从未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飞机在降落。关于这个国家，我了解些什么呢？最早从银幕上看到它，还是我少年时候。黑白新闻影片上一次又一次

出现希特勒发表演说、检阅军队和接受欢迎的人群向他投过鲜花与欢呼的场面。铁一般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开进奥地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吞并波兰的西部……然后，从书本上读了康德、黑格尔、莱辛、马克思和海涅。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德意志吗？

中国总是有太多自己的事情，妨碍我们去关注遥远的外国。但是一九四二年严冬时节，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德国和日本的通讯社至少三次宣布占领顿河沿岸这个苏联城市的时候，却使几个十几岁的中国人首次在极度痛苦中饮起酒来，并且抱头痛哭了。我们本能地预感到，那次战役的胜败是人类自由与法西斯暴政你死我活的关键。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全国解放以后，关于德国我们看到和听到过些什么呢？将近三十年，留在记忆里的似乎只有阿登纳的漫画和关于军国主义复活危险和新纳粹分子活跃的报道。最近几年，我们才忽然得知，联邦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马克成了世界最坚挺的货币。我们从联邦德国进口了许多机械，在武汉还有一名联邦德国人当中国工厂的厂长。

飞机着陆了。我本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这里，然而现在却是——

凄凉的十一月，  
日子已渐渐阴郁，  
风把树叶摘落，  
我走上德国的旅途。

我和海涅在同一个季节来到德国。这是他那部长诗《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开头。那正是一八四四年，法国即将发生一场新的革命，海涅流亡十三年后返回祖国，为它的黑暗、沉滞和伪善感到悲哀，接着，诗人发出充满激情的呼号：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一百年之后，德国最后一个、也是最残酷的帝国才被埋葬掉。那个“地上的天国”是否建造起来了呢？

当我们行走在法兰克福的市街上和参观歌德故居时，又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冒了出来：今年是希特勒第三帝国覆灭的四十周年，让我们看看德国人是怎样对待他们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怎样清除这起空前浩劫的后果的吧。

### 我关心那精神上的废墟

歌德纪念馆的主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真正的歌德故居，已全部毁于战火，这里的一切都是根据战前纪念馆的那位有心的馆长在战争初期拍摄下来的照片复制出来的。赝品，总会使人兴味大减，但我对于德国人在如何把全部陈设——木器、铁器、陶器等等整新如旧上所花费的心计和功夫，却不能不暗暗赞赏。除了墙纸的新鲜度和它图案的粗糙令人感到可疑以外，一切都无可指摘，你不能不相信歌德的童年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度过的。

我们在歌德站立着写作的写字台旁拍了一张照片。原来他也有海明威的这个习惯！我产生一个联想：中国人若是站着开会和作报告就好了，咱们偏偏缺乏长时间站立的习惯。

对于初次到欧洲的人，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波恩的建筑与街景肯定会显得新奇诱人。房屋的样式与色彩，连同门窗的规格，都很少重复。更难得的是，大部分建筑还保有古风。

波恩市是遭受破坏最小的城市，还有百分之六十建筑毁于战火。柏林和汉堡，则百分之九十被毁坏了。当年在斯大林格勒，我就在废墟前发过愁：单是清理堆积如山的残砖碎瓦，就得耗费多少人力和时间！一位英国专家估计：战后德国人光是清除废墟就得花去二十年时间。此刻，我奇怪的是四十年前几千万德国人无处栖身，他们怎会有时间和财力把住宅建造得这样精致呢？是否象美国那样，先建一批又一批简陋楼房，六十年代后又拆掉重建的呢？

四个城市，都不见战争留下的任何痕迹。在波恩，我们见到正在拆掉一幢旧楼，却小心翼翼地保留住宅的楼面。听说许多战前建筑都是用这种办法改建的。

得知联邦德国平均每人占有住宅面积已达三十五平方米，我吃了一惊。这并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度——联邦德国的人口相当于战前全德人口数量——六千二百万人，而领土却减少了三分之二，每平方公里平均二百八十多人。

我们漫步联邦德国街头时，距圣诞节尚有一个月之遥。我们每隔一、二日或三日到达一个城市，节日的气氛都加重几分。街旁的树上，市街两侧和街的上空，都燃起无数灯火。为圣诞节临时开设的许多商棚和饮食摊，使物资的丰盛更加夺目。

在每个城市，我们走过的市街两侧，都有一个特点引起我的注意：大部分橱窗里陈列的，都并非生活必需品，价格之昂贵相当可观。这些商品，绝不是那二百万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的家庭所能问津的。然而这些出售高级玻璃器皿、服装、首饰、化妆品与古玩等等的商店能有生意可做，说明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家已不是人口的少数。就是在旧货市场上，货摊上摆着的也大都是可有可无的供装饰和摆设用的旧物。德国人现在喜古。五十年代建造的有些建筑，有些已被政府指定为不得拆除的文物了。

在德国人的物质生活中，或生活中的有形部分里，已经很难找到战争的痕迹了。那么留在人们精神上的废墟，清理得怎样呢？

### 必先挖掘，而后才能埋葬

一提慕尼黑，中国人就会想到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与希特勒在这里签定的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有些人还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是在这里起家的。但是关于一九一九年德国共产党曾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三件大事，倒过去算，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间德国历史的三个阶段。

慕尼黑市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而巴伐利亚一向是政治上最保守的一个州。德国的年轻人一提起这个州和它的州长，就不免要用起嘲笑的口吻。

现在，在慕尼黑的伊登饭店大厅的咖啡间里，坐在我对面

的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米海尔·阿卡曼。

“我也常常想：德国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情况跟你们一九七六年以后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几年前我忽然想到：中国一九七八年以后文学界出现了写‘文革’的高潮，为什么我们德国一九四五年以后没有很快就出现许多写法西斯时代的作品呢？这很奇怪，也很重要。我们是六十年代末期学生运动中才出现反对那段历史的高峰的。我那时问父母：希特勒上台那时候，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反对过他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反犹太人和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事吗？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知道？”

先后有三个青年人向我述说这件事，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此次陪同我们旅行的波恩大学研究生多罗蒂·缪勒小姐最先告诉我：战后，人们都把精力用到解决吃穿住的方面，关注经济的恢复，很少回顾历史。也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她也向在拜耳医药公司工作的父亲提出过这个问题：“希特勒那时候，你做什么来？”那时，慕尼黑电台上还出现过一个节目：十几个青年男女向观众述说，当他们向父母提出希特勒怎么可能上台的问题时，父母一般都连最一般的解释都做不出来，只能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有人表示自己也有责任，或者干脆说：“我也没法儿给你讲明白。”

多罗蒂是一九五八年才出生的，距希特勒政权的覆灭已十三年。阿卡曼也是五十年代生人。德国人的可爱之点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这些青年人之所以要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使自己不重犯先辈的错误，而是认为自己也应该分担他们父母犯下的罪过。德国大部分人内心里都藏着对于本民族在纳粹时代对于犹太人和对于整个欧洲犯下的那场大罪的罪愆感，尽管他们本身也多是受害者——在德国，你难找到一个没

有死难者的家庭，有很多家庭只剩下孤儿寡妇。但是德国人，越是没有在纳粹时代玷污过双手的德国人，越是自动地分担起罪责。战后，有些德国青年曾跑到以色列为犹太人做苦工，用以赎“罪”，减轻自己良心上的痛苦。德国前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访问波兰，在波兰无名烈士碑前献上花圈后，双膝跪倒在死难者灵前代表德意志人向波兰人民请罪的场景，曾感人至深。显然，这并不是在历史上犯过同样罪恶的别的民族也能够做到的。

阿卡曼接着说：“对纳粹法西斯的真正研究，从六十年代才开始，至今不衰。真怪，无论是纪实文学、小说或历史，写希特勒时代的作品现在比四五十年代要多得多，好象大家方才发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似的。

“经济恢复时期，象我母亲那样的普通人是不想政治的。那时候正饿着肚子，愁的是明天有什么吃的。但就在四——五十年代之间，很多纳粹分子又当官了，那些当年包庇法西斯的法官又出来了；重建军队时期，原先的军人又成了军官了。很多人自知自己有责任，不愿想那段历史，不愿承担责任。所以，法西斯纳粹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我问：学校教科书里总要写一写吧？）那纯粹是表面的东西。法西斯是怎样产生的？到现在也没有被人真正理解。很多人也不想理解，好象那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大家都忘记它吧，不要旧事重提了。五十年代冷战那时候，谁一提纯粹问题，就说你是共产党。那时候有美国的影响，想利用纳粹来反苏。六十年代我们一个总理基辛格（当然不是美国那个前国务卿），本人是个一般纳粹分子。很多德国人认为他没什么问题，也没迫害犹太人嘛。年纪大的人认为无所谓，但是我们青年人觉得不合适，不可想象。

“结果，从六六年起，德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我认为，这同我们从未彻底清算法西斯很有关系。历史的课题你是回避不了的。你绕开走，最后就要自食其果。”

阿卡曼是通过他姐姐苏珊·阿卡曼要求和我会面的，而苏珊又是这天上午我们的访问对象。她是德国女作家出版社的负责人。

## 他们有这样的作家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慕尼黑市郊区小镇敖尔塔赫，在一家餐馆里同名作家伯恩特·恩格曼先生及其夫人共进午餐。恩格曼是联邦德国纪实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是《最高勋章》，写缉拿漏网的纳粹犯罪分子的，在西德销行四十余万册。在一个六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了。

他这一辈子，也可以说就一直在追踪纳粹，算他们的旧帐，挖他们的老根，揭那些仍在台上的法西斯分子的真面目。他的三十几部著作，大部是这一类主题。厚厚的一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可能是一个例外。

午餐席间，经我们提问，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一九四五年他二十四岁时，结束了达豪集中营的生活，入大学读书。后做《镜报》记者，常到国外采访。一九六一年他在电视台主持一个专题节目：德国的富人。都是他亲自访问过的真人真事，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出版社便要他写一本书。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名为《我的朋友百万富翁》，成为畅销书，现在书店中仍在出售。从此他便开始自己选题，从事写作了。迄今已写

了三十多部书，总计销量八百多万册。

一个以政治和历史为主题的作家，平均一本书可以销到二十余万册，这个事实印证了我听到的一个说法：西德人同西方各国相比，是政治兴趣很高的。当然也有人说，近年来大不如六七十年代了，但即令如此，从90%的选民参加投票、电视台节目有三分之一介绍国内外信息以及新起的带有左派色彩的“绿党”已经在和联邦德国议会五百个席位中取得三十席等等迹象看，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诸国相比，西德人的政治兴趣仍然不低。

恩格曼夫妇住在一幢相当讲究的三层楼的住宅中。他说他不喜欢巴伐利亚州这个保守的政治环境，但赶忙补充说，慕尼黑是个例外。他喜欢敦尔塔赫镇这个幽静的所在。

我们先参观了他设在二楼的书房。他本人的著作就摆满了整整一个书架，大约有五层，令人艳羡不止。我当场向他要书。德文我不懂，他送了我四本苏联《进步》出版社的俄文版本，和一本美国班坦出版公司英文版的《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由蓝、褐、浅褐三色印成的分为三行的标题——“德国，没有，犹太人”，使封面相当醒目而美观。书皮上的小字介绍了书的主题：“从大屠杀到今天。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如何粉碎了德国文化。”“德国在政治、科学与艺术上受到令人震惊的损失……”几本俄文版的书名是：《最高勋章》、《正在放下的绞索》、《帝国崩溃了，寡头垄断还健在》……

我们回到客厅，重新坐下来。一面饮着恩格曼夫人备好的中国绿茶，一面听作家介绍他的写作生涯。

“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同法西斯有关。战后很多人不愿意想法西斯的问题，我却提笔写起德国法西斯的经济基础了。近

年来青年人特别想了解这段历史和它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年半以前，我又写了一本书。那是我对于曾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一百二十个人的访问记。话题是每人对那段生活的体验。访问对象是各种不同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的人。有人热烈支持纳粹，有人强烈反对纳粹。可以说，当年支持法西斯的人，现在大多数内心里仍然支持。那些人现在已经老了，政治上不起多大作用了。现在，六十年代学生运动那一代青年人，已经开始掌权，但是在教育方面，那些人的作用仍然很大。昨天慕尼黑大学一个政治学讲师，就在课堂上公然支持南非的种族歧视。结果学生大哗，开会反对，找他来质问，吓得他溜走了。”

他接下去谈到作家，说到二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为纳粹的登台做了准备。

这使我想起从另一个来源得到的情况。德国法西斯较之意大利、法国的法西斯势力，得到更多知识分子的拥护甚至积极参加，是它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在中国也相当闻名的剧作家霍甫特曼（他的话剧《织工》影响甚广，记得中国在二十年代就有了译本），追随纳粹直至最后。一流作家托马斯·曼，也曾大声疾呼地为希特勒鸣锣开道，几年以后才察觉错了，逃亡到美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戏剧家阿·布洛宁，以《西方的没落》闻名的著作家施本格勒等人，也都同流合污了。

从托马斯·曼走过的路里，多少能看到德意志民族传统中最终导致毁灭性灾难的某种因素。留恋古老的生活方式而反对资本主义变革和民主，耽于幻想与抽象思维而趋向绝对、排外与好战……都是托马斯·曼的政治观与艺术观中有所反映。托马斯·曼赞赏战争。他认为民主是强迫每个人参与政治，而这对艺术是致命的。“艺术永远是‘向后看’的，它永远是反

动的。艺术常常和宗教一样被视为反民主的力量，是有道理的。把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乃是民主主义的胡说八道。从政治意义上看，艺术永远不会是道德的。它永远不会是讲究道德的；进步永远别指望它会得到艺术的支持。……艺术的喜悦就在于它那惹人反感的非理性主义，它爱‘野蛮’，因为野蛮产生美，这种爱是无法根除的……”他认为反动的艺术家是德国文化的产物，而知识分子则是民主的产物。德国这个音乐的冠军，它的艺术精神需要一种反动制度。他“坚信，德国人民永远不会喜爱政治民主，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可能喜爱政治……我希望有一个王国……”

“现在不同了，”恩格曼说，“现在德国作家的百分之九十都反对法西斯。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很不一致，主要问题在于人们怀疑那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在作家中的论争，主要是左派与左派之间的论争，比如如何处理东西德关系问题……”

“在您的作品中，您最得意的是哪一部呢？”——我问道。

“这很难回答，就象问一个人喜欢他哪一个子女一样，我最喜欢、也认为是最重要的作品，是《我们是奴仆》，这本书的副题是：一本反历史的书。它写的是历史，但不是用帝王贵族的眼光，而是用民众的眼光看历史。过去的历史多是写有权者的历史。你在十九世纪的史书上看到的都是早上吃火腿、晚上穿夜礼服那些人物，而他们在德国人中不超过百分之零点零二。历史学家批评我，说我不科学，用的资料不写出处。但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事实，而在于观点。这本书一九七七年出版，销了四十万册。支持者说：‘这才是真的历史！’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美国哲学家索洛因说：‘人们如果不知道自己

真实的历史，就注定会重犯历史错误。‘我赞同他的观点。’

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落后和保守的国家，甚至在很长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那许多杰出人物呢？

恩格曼稍加思索，回答说：“这里有各种因素起作用。头一个，德国很晚才统一，不象法国那样很早就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致全国文化界精华都集中在首都巴黎。我们有很多独立的小国，各有自己的国王和政府，都以培育出自己的文化名流为荣，因而作家、艺术家就有了较多的发展条件。第二，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同外国的先进文化有较多的交流机会，不象西班牙那样与外界隔绝。第三，是我们由于权力分散，作家和学者有较多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个教授，由于思想太进步，不能为一个小王国所容许，他就可以迁往另一小国。你在慕尼黑无法立足，可以到耶拿去；耶拿不行，还可以上柏林。在英国或法国，你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了。权力分散，对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大有好处。今天仍是如此。我们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如果你认为巴伐利亚州太保守，不利于你的学术活动，便可以到黑森州或其他更进步的地区去。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办公室里，专设一人处理这方面事项——当某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言行在某一个州被认为‘违宪’、不能工作下去时，就设法安排他到另一个州去工作。有百分之五十的知识分子是在外州找到更适宜的工作环境的。”

变中央集权制为联邦制，是联邦德国一九四九年新宪法针对魏玛共和国被希特勒篡夺的历史教训而实行的一个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基本法”导言中写道：“政府的联邦形式，在许多细节上，是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按：即纳粹制度）滥用集

中权力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有其历史根基……每个联邦州有其自己的宪法，有其民主选出的议会，有其政府和各种行政机构，以及独立的法院。”

## 四十年，前事不忘

连日降雪，慕尼黑马路两侧密密麻麻的汽车上都积了厚厚的雪。看来，有些人干脆就没有车库，把车停在路边。它本来是个大城市，加上这个原因，在我的印象里慕尼黑就远不如斯图加特和波恩那样美丽而整洁了。

象在法国一样，在这里不通德文使我感到憋得慌。没有一张印刷品是我能看懂的，这就使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我成为废物，而那里边肯定有许许多多我所需要的信息和思想！我必须买有关德国的英文书，尽管明知这比在美国要困难几百倍，很可能就一无所获。

新闻局派来一位青年汉学家、未来的法学家专门陪我跑书店。此人的汉文译名叫我吃了一惊——他叫“宾彦士”，前两个字正是我小时使用过的名字。

宾彦士常陪中国代表团，这既使他得到练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机会，也使他得到一笔收入。不然，正在读法律系的他，恐怕就不可能每到假期都去国外旅行了。他健谈，也富幽默感。一路上讲了不少大学生生活中的趣事。比如旅游，坐得起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吗？得挑最便宜的飞机坐。去年上泰国，他乘的就是约旦的飞机，只收了他五百马克。便宜是到家了，可是那个惊险，也只有大学生受得了。他得随时提防着劫机或爆炸……

英文书，最多的是美国的纸皮通俗小说。宾彦士一边扒拉，嘴里一边说：“废物！废物！”忽然，他的手停在一本“废物”上不动了。那是美国人杰拉德·格林写的长篇小说《大屠杀》，厚厚的一本。宾彦士举起这本书给我看，说：“根据这本书拍成的电视片，轰动了整个联邦德国。是写纳粹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集体屠杀犹太人的。Holocaust(英语，大屠杀)，德语中本没有这个词，现在成了通用语汇了。”

小说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九七九年初在西德电视三台开始放映它的电视系列片。影片先拍摄了当年德国市民的反犹情绪——闯入民宅，捣毁犹太人商店，打砸抢，焚毁图书，给犹太人挂牌游街……然后介绍纳粹党人如何赶走犹太人，拆毁家庭，强奸，纵火。这是第二阶段。最后，是集体屠杀，穿插了当年实地拍摄的许多镜头：一个个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剥得赤条条的，然后枪杀、掩埋，或投入煤气炉。

这部影片写了一个犹太人家庭。怀斯先生本来有一个幸福家庭，他是一个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的医生。太太是一位贤妻良母。这对夫妇和一儿一女，都遭杀害，只有二儿子九死一生，保住了性命。

重要的是影片写了一个德国人，常到怀斯处看病的多尔夫先生。他读完法律，正愁找不到出路。妻子怂恿他加入了纳粹的秘密特务组织SS。他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对怀斯大夫毫无恻隐之心，一再为特务出谋划策，终于实现了在最短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最节约的办法集体消灭犹太人的计划。

据电视台统计，仅一月二十五日晚，收看率就达到拥有电视机数量的百分之三十九，观众约一千四百万人，几乎打破了历史上收看率的最高纪录。电视台收到观众电话三万多次，

来信数千封。后来还组织了电视讨论。

这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三十四年，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问题早已成为历史，并且这显然不属于德意志人历史上光彩的一页。然而竟然还有那么多德国人认真而激动地看完这部影片！据我们在汉堡结识的朋友关愚谦先生讲，“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早上，我要到一个报社去教书，然后赶到大学去授课，下午还要参加一个德国文学讨论会。但是这一天，德国人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我的课也上不成了，书也教不成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部影片。在有些家庭里，这部电影甚至引起了家庭纠纷，太太逼着丈夫、子女逼着父母问：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反犹太人的暴行？弄得这些家长不得不向电视台呼吁，请他们说明：不是所有参加过纳粹党的人都直接参加过集体屠杀。”

算来，这已经是六十年代学运高潮十几年以后的事了。这就是说，这次大激荡的主人公，已经是六十年代那一代大学生的小弟小妹了。

在人们的印象里，德国人似乎是谨严刻板、循规蹈矩、崇尚理性、不动感情甚至接近冷酷无情的人。最后一点，其实是误解。德国人在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传统，信仰，或英雄）受到玷污或坚信不移的主张或观念遭到反对的时候，他们感情的激动甚至可以超过别的民族。所以，当他们被引上错误道路的时候，也会比别的民族走得更远，干得更彻底。只要想一想在不到七十年里德国曾三次卷入军国主义狂热和侵略就够了。

《大屠杀》这部电视影片，还引起了观众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有几点意见很值得注意：一、为什么过去德国有人老是不

愿触及这一段历史？这部影片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美国拍摄出来，就说明德国人还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也许有人还认为杀犹太人杀对了呢。二、这部影片很有价值，但暴露得还不深刻、不够彻底，电视台的讨论会也没有谈透，例如人们只谈到过去，而没谈到以后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惨剧的重演。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听说，近年来只要国外出现有关纳粹罪行的影片或图片资料，德国电视台一律转播不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有些思想并不保守的青年人也发生了反感，说：“怎么没完没了啦？难道纳粹上台和第二次大战全是我们德国人的罪过吗？”

这话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 一个青年看政治

“假如我提早四十年出生，我想我也会成为一个纳粹分子。”宾彦士在一家中餐馆里，在我对面就坐后，含笑说。

这一句话，就说明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比他们的先辈宽容多了。而绝对主义、不容异己，正是德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弱点。

宾彦士是个政治热情很高的人。他没来得及参加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从三个姐姐那里间接受到那场政治运动的影响的。一九七二年，还不到二十岁，他已热情参加竞选活动了，把写着勃兰特名字“Willy”的徽章插在左胸前，为社会民主党拉选票。就在那个时期，他在学校里还参加过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辩论。他爱中国，但反对“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说法；由于讨厌政治八股，他讨厌当时《北京周报》德文版和《中国建设》

英文版上的文章，对于中国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也抱反感。他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要事实证明它优越、能使一个条件相当的国家比联邦德国还要富，他就拥护那种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基本法》，根据德国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改革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宾彦士说，“魏玛时期总统的权力太大，象个临时皇帝一样——他可以解散国会，紧急时期可以任命总理，可以停止宪法，现在大大缩小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一投不信任票，总理就得下台，临时总理只能处理行政事务。《基本法》规定，议会必须先选出一个新的总理，才能罢免现任总理。过去小党太多，造成混乱，现在规定必须取得百分之五以上选票或三个席位的党，才能参加议会。鉴于纳粹党经常对司法横加干涉，新宪法特别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性，并且设置了联邦宪法法庭，监督宪法的执行，联邦与各州政府都必须遵从宪法法庭的决定……”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宾彦士在读完汉学以后又考入法律系。他现在正为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而感到紧张。百分之六十的毕业生将被刷掉，拿不到文凭。毕不了业，还不能留级，也不能重读法律系，只能到别的系从头读起。

“你算算看，我再上一次大学，毕业时候该是什么岁数了？”宾彦士又笑了。

## 德国人，过去和现在的

联邦德国为什么要选定小小的波恩做它的首府呢？这里战争的破坏较小，而且有一个当时联邦德国唯一能用来作会堂的场所——战前新建的师范大学的礼堂。那里至今还是联邦德国

议会所在地。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那时没想到东、西德的分裂会持续几十年之久，以为很快就会迁都柏林的。

波洪大学教授、汉学家马丁·马汉茂先开车带我去科隆访问联邦德国最大的广播和电视台之一——科隆电台。“我的车是BMW牌，恐怖分子和抢劫银行的人最爱用这种车，”马丁说，“因为它快，时速可达一百八十公里。”他接着就讲到在公路上流露出来的德国人性格的一个特点：开高级车的人都想显显自己的威风，这是身份的一个标志。那些车子较差的人呢，又不服气，偏不许你超车。“你看，这个车讨厌不？它在离我这么近的前方忽然拐到我这条线上来，我若开的是高档，就准刹不住，非撞车不可。”这是德国人心中还残留着尊卑观念和嫉妒心理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和美国人不一样？”我问。马丁点头称是。

从电台出来，已暮色沉沉。我们走过世界闻名的科隆大教堂。仰首望去，它比白日显得更加高大而阴森了。简直象一座阴山——它也确是德国“王冠与祭坛”相结合那个漫长的黑暗年代的象征，曾牢牢压在德国人民心上。于是我又想起海涅的诗句：

“试看看吧！/在那月光里，/它耸立着，象恶魔般漆黑，/它就是科隆大教堂。

“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狱——/狡猾的教皇至上论者曾这样想：/有着这样巨大的囚牢，/德国的理性就会衰亡！”

“这儿曾有柴堆发出火焰，/把书籍和人命一齐吞咽，/同时到处都发出钟声，/并歌唱着‘天主矜怜我

们’。”

在西柏林，我们第一次见到战争的废墟。一处是原柏林火车站，只剩下一面正墙。一处是一个教堂，被炮弹削掉了顶端。

《时代周刊》是一家影响很大的刊物，以知识分子为对象，销行四十余万份。如果按中国和西德两国人口之比乘以十六，它就应该是六百多万份了。

由于对方三位女士和先生对中国的兴趣太高，我们又讲究中国式的客气，便使访问者成了访问的对象。我的主要收获是向玛丽昂·冬霍芙女士要了一本书，一九八二年在伦敦出版的《化敌为友》。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章：《谁是德国人？》

我此次旅途中看了一些书的某些篇章，有一些就是从德国民族性格来探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的。但冬霍芙女士论点也有新颖之处。她分析德国人的特点，第一条就是“奇怪的‘绝对’倾向”，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里都可以找到。“德国人渴望绝对真理，纯而又纯的教义，毫不妥协地献身和自我牺牲。”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带有保守性和崇拜权威的特点。德国人认为只有政府和长官才能管好国家大事，因而政府官员的权力达到近乎绝对的地步，而政党则被视为追逐私利的小宗派。认为民主制度有害于民族优良传统。“在最近的过去，（德国人的）正面价值被歪曲了。在希特勒统治下，理想主义变成了无批判地信奉权威；适应性变成看风使舵；忠诚变成奴性；献身精神则最后变成犯罪。”

我在波恩市旧书店里买到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德国：昨天和明天》（作者莫克尔）就德国历史、德意志民族性格和纳粹

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分析。我的总印象是：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同它的政治制度与传统意识形态之保守与落后不相协调。德国已经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反资本主义的思潮却始终很顽强。德国几次有过宪法和议会，但人们轻视民主甚至反对民主，以至一再发生议员把权力拱手交给独裁者的怪事。经济生活中早就有了自由竞争，但人们意识里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却始终浓厚，并随时准备着放弃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而屈从和拜倒在权威脚下……

这就使德国近代史上连续出现反复。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民族，却很难接受历史教训，几次错过历史良机，终于酿成历史上最大一场悲剧，国破家亡，贻害人类。

现在不同了。德国人在废墟上创造了“经济奇迹”以后，不忘总结历史教训。这个过程还在继续……

而且，还出现了新一代德国人。我先后同五位德国青年交谈过，在他们身上，你再也找不到普鲁士气息了。独立感，批判精神和世界眼光。好象生怕我们对这一代德国人印象还不够深刻，在离开德国的前两天，命运又给我们送来另一位德国青年，他的中国名字叫霍悟道。好象真的悟通了什么道似的，他是彻底地无忧无虑，毫无保留地喜气洋洋。热情、真挚、亲切不用说，一天到晚他老是在笑，走起路来象跳舞。其实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也并不是没有个人的烦恼，真叫人不明白他怎会老是那么乐天，心地也单纯得惊人。

他还有哪一点象传统的德国人呢？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八日写于西柏林

## 书生掌权记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旬，段加林横渡赣江，到万安县去赴任。他站在船头，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思绪万千。他想起南宋大臣、文学家、吉州庐陵人氏文天祥所作的千古诗篇《过零丁洋》：“惶恐滩上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惶恐滩，就坐落在万安县城，他希望这一去，能够唱好文山公的《正气歌》，希望给万安人民奉献一片丹心。他还想起了南宋文武双全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万安造口写的倾吐壮志难酬的名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我们的读者当然理解词人所用“鹧鸪”的含义，那是取“鹧鸪”啼鸣时的谐音“行不得呀，哥哥”。但读者可能很难理解，应当是踌躇满志的段加林，他大脑记忆的仓库里此时此刻为什么会冒出这首悲愤凄凉的词来。这个问题，看完此文后，读者自会找出答案。不过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段加林是深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不然，他大概也不会如此欣然从命。

## 奇异的宁静

万安县，段加林曾去过两次，一次作为《井冈山报》的记者，一次作为吉安地区行署的工作人员。那两次，他都是看、听和记，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他是不能施加什么影响的。从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以来这二十一年，他当过几年记者，然后就到行署机关当秘书，当办公室副主任。这些工作，都不需要、甚至也不允许他发表什么意见。他正好也不是一个愿意说很多话的人。但是他对于看到和听到的事，想得却很多。

这一次不同了。他是到万安县来接任县委书记的。对于这里的二十三万人民，他要独立地负起责任了。

进了县城，一路上他不住地留神观看这里十年来有了什么变化。变化很小。仍然是那些古老的街巷和简陋的房屋。路旁依然看不见几株象样的树木。县城里倒有了几幢新的楼房，那是水电站施工部队建造的，然而它们也并未使这个城镇变得美丽些。象一个孩子心不在焉地摆下的几块积木，七零八落，倒使市容显得更加破落而杂乱了。“显然，县委对县城的建设布局没有花什么心思！”——段加林不悦地想道。他知道，本来电站施工部队打算将自己二十多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结合县城规划来建设，形成一条数华里长的街道，只因当时有人舍不得二、三百亩耕地，只好在山腰造了一些简陋的临时住房。多么令人惋惜呀！

县委办公楼是座二层楼，三层是几间附加建筑。在那里，段加林无意中看到一面相当考究的大镜子。玻璃的质地显然是上等的，从远处照进去，人也不变形。镜架也是上等木料制成，

雕着相当美丽的花纹。这里很少有人来，为什么要放一面大镜子呢？一问，原来是有人吩咐从二楼搬到三楼的。段加林明白了：这是为了不使人们老在镜子里端详自己。那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念了：一个人常常看到或想到自己，并且注意自己的仪容，就会忘记革命，走到邪路上去。段加林叫办公室的人把大镜子搬回二楼。这个意见没有马上执行。后来他了解到，有人是想尽量维持原先的秩序不动。段加林不得不去讲道理了：“照照镜子，难道就会把无产阶级思想照跑吗？如果会照跑的话，那么，这种思想也绝不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再说，你看过旧戏吗？县官的公堂上不是挂着一块匾，上写‘明镜高悬’吗？所以，镜子从政治上讲也不是个坏东西。”

县委书记们和常委们对这位新书记没有任何不欢迎的表示，有些人还相当热情。段加林心里明白：“这也是一面镜子，是‘一把手’地位的反映。有的同志对我寄以期望，有的人则是为了搞好关系。”

万安县的人民，仍然象过去一样淳朴善良。近几年收入略有提高，生活却依然没有越过贫困线。但他们似乎已经感到满足；对于党政干部，仍然怀着近似解放初期的爱戴心情。

段加林深知，贫穷、闭塞与文化的落后给人们的精神造成的损害是什么。但除此以外，他在万安的空气中还嗅出另一种味道，很难名状，或者可以叫做“沉闷”吧。县委的同志们，衣着朴素，甚至打着补丁。连女同志也仍没有一个穿花衣服、烫卷发或留披肩发的，更不用说穿喇叭裤、高跟鞋了。在那里听不到歌声笑语，连走路都是慢吞吞、静悄悄的。一个个都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好象深怕触动别人；过于拘谨，不苟言笑，

也有点象害怕那面从二楼搬到三楼的镜子似的，是不愿意或不敢于表露自己吧？

他很少听到有人滔滔不绝地讲话。是没有什么可讲呢？还是不敢讲呢？无论哪一种，都是不正常的。

这究竟是为什呢？段加林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原来有股邪恶势力在控制、窒息舆论。这股势力以往常常可以凌驾于县委常委之上。同时，人们对新来的县委书记并不了解，倘若依然是官官相护，对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来说，岂不是自酿苦酒？

段加林深入各单位、各部门，还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到全县各公社跑了一遍，广泛接触了各阶层的人士，特别是十分虚心地听取离、退休的老同志、没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的教师、医生、科技人员以及普通群众的意见。从中他听到了许多重要情况，尤其是县里党风方面的一些严重问题。他也收到了一些同一类内容的来信。

这期间，也有一些人，带着某些目的，在他面前频献殷勤。这少数人可谓拍马有术，说起恭维话来还很能“联系实际”，不觉空洞。段加林却很不耐烦，时间长了，他便抬起胳膊看手表，说：“还有什么正事吗？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 一看就不象“太平官”

十一月下旬，在新任县委书记同县里干部第一次见面的全县科级以上一百多人的干部大会上，段加林正式亮相。这实际上是他关于自己施政纲领的一次就职演说。谁也想不到，这位书记一上来就把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话搬出来了：“臣受命之

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说完，话锋一转，就向县委机关内部的不正之风开了第一炮：

“听说我们县委机关实行一种‘加班工资’制度，凡星期天上班的，都要拿一天工资。有的人一年竟拿了十四个多月的工资！真是那么忙，有那么多事要加班吗？星期天早晨提个菜篮子到办公室转悠一下，就要拿一天工资的有没有？据说这是经过一定的会议决定的。那么那些比机关干部辛苦得多的教师们、医生们，是不是也该拿加班工资？……不合理的决定，要推翻。我相信多数同志会同意我的意见，退回不合理的收入……”

接着，他不指名地批评了前县委政法书记“得志便猖狂”，大开后门，搞非法的“农转非”；庇护自己亲戚强占百姓土地建房；自己也建了很大的私房；老婆还很嚣张。“真是无法无天！算他运气好，调到地区去了，没落到我手上！”又点了一位部长以权谋私让大队支书送一车木料建私房，“人家说，这位部长除了棺材和坟地以外都准备齐全了！”……段加林不用讲稿，接连列举了十种不正之风的表现，俱是真人实事，虽未点名，听众一听就明白指的是谁，人心大快。县委书记作这种演说，声色俱厉，感情充沛，在万安县真正是前所未有！人们从他高高额头下充满义愤的眼光里，印证了他最后的一句话中表露的决心：“对于一切搞不正之风，败坏我们党的声誉的人，我要郑重地告诉他们：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通常县里开这种会，人们都是进进出出，交头接耳，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全场凝静，全神贯注的；更没有给照本宣科念稿子的讲演人鼓掌的事。今天，段加林别开生面的演说，却使全场人心激动，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被他批评的人，也只

好和大家一起鼓掌。

阵阵掌声，无异于是对段加林的施政方针投了赞成票。但是人们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些年听到的好话、漂亮话和慷慨激昂的许诺，实在是太多了。就说党风吧，一九八〇年中央不就有了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条吗？单说干部非法建私房问题，上边作过多少决定，下过多少通知，那些人何尝收敛过呢？

万安县的历届县委书记、副书记中，“清官”是有；他们律己很严，但是对于自己身边和下面的“赃官”，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很软，甚至受那些人欺负。这个段加林，能是一个例外吗？人们不无疑虑，默默地关注着。

## 胜利了，但有不祥的尾声

韶口公社的社长郭世裕，是全县一个名人。年年是优秀党员，模范干部，是全县十个“戴红花”的人物之一。有人告诉段加林：那都是假的。郭世裕专会做表面文章。平时躲在家里喝大酒，睡懒觉。电话一来，说上边有人要来了，郭世裕马上跑到田里。上边的干部到公社，问郭社长何在？就回说：到生产队去了。派人找来，总是满身泥巴，一脸汗水。看上去，人也是憨厚老实，大大咧咧的。可是有好几个人向段书记揭发，此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无所不为。怎么办？段加林初到万安，县委不少人都很欣赏郭世裕。他经营多年，多方面“关系”甚多，不是轻易搬得动的。可是不去触动这种“大家伙”，就不能一在万安县的民心中引起一点震撼。

段加林叫县纪检委派几个可靠的人下去摸摸虚实。一查，

基本属实。于是段加林就在常委会上提出，决定派出工作组检查郭世裕的问题。他亲自到韶口开座谈会，找郭世裕谈话。不出两天，就查出一大堆问题：郭世裕是那里的一霸，人称“他连韶口的天都能搬到家里去”，不算夸张。盗伐和倒卖木材，他往乡间关卡那里一坐，一车车非法木材便畅通无阻，谁也不敢说一声“检查”。公社水库养的鱼，他往卡车里随便扔，扔到满意为止，开车扬长而去。他建私房，可以到四处去拉料，一拖拉机一拖拉机地往家里运。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要查实取证却非常困难：上下左右有人庇护，攻守同盟早已订妥。最后能落实下来的只有一千八百元。

段加林查郭世裕的事一传开，人心大快，全县传开：“万安来了一个段青天！”人们却不知道这个“青天”是多么难做。

县纪检委提出郭世裕的处分方案是“留党察看一年”，使段加林吃了一惊，心想：纪检委分明是怕，这个姓郭的怎会那么可怕呢？问他们为什么处分这样轻？答曰：“是比照过去案例定的。”段加林说：“你们只看那有实证的一千八，实际上几个一千八都不止！先不说刑事处分，党员他够吗？一定要开除党籍！”常委会上，纷纷说情了：“念他工作这么多年，贡献还是有的……”“我也没否定他过去。”都说“还是教育教育以观后效吧！”

“不行！党内不能容纳这种人！就算我独断专行，我也要独断专行这一次。”段加林斩钉截铁。就是这么一件早就应该处理的案件，直到最后，段加林还遇到重重阻力，他能不“独断专行”一下吗？

## 归山之虎和无畏之人

“文革”前的一位副县长姜正群，在万安拉帮结派，成为一霸。县委书记治不了他，地委领导照顾书记的难处，把他弄到地区百货公司当经理。八三年借“机构改革”之机，说是他“老骥伏枥”，要回家乡发挥“余热”，要求归县。因为他把地委某领导在百货公司的孩子送到省里一所高等院校去进修，那位领导就只好拒绝了。段加林也不宜违抗，把他放在县人大，做最末一名副主任。他还不满意，跑到地委叫苦，嫌那“枥”太低了，与“老骥”身分不合。于是又摆到第一副主任的椅子上。万安人说，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段加林只好说“为维持生态平衡，山上有个虎也好嘛”，心想：我自有治虎之计。

“老骥”归来发挥的第一股“余热”，就是从省里开后门要来了一个指标，由公家负高额学费，发工资，报销差旅费，把自己的“小骥”弄到江西大学去读三年经济系。“小骥”本是财政局一般工作人员，为了使这件事合法化，“老骥”要县财政局许局长以组织的名义决定“小骥”去进修。财政局长曾是“老骥”一手提拔上来的，可是许局长既想报“滴水之恩”，又怕负责任，就去找县长。县长是他介绍入党的，也是“双怕”，既怕忘恩负义，又怕沾包，说：“我表示同意，但你可别说找过我，还是去找找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吧！”副书记知道这事不该办，但又怕得罪姜正群，就说：“我现在不管组织了，你还是去找分管的副书记吧！”分管的副书记虽是姜正群的儿女亲家，但更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就说：“我倒是管组织工作，但我看还是找直接管这神事的组织部长为好。”组织部长怎么说呢？他说：“这事我一

个人定不了。但是，我知道了。”就这样，谁也不得罪人，谁也不愿沾包，但事情还是办成了。

无奈段加林消息灵通，马上把财政局长找来，严辞责问他道：“你过去大事小事总喜欢找我请示汇报，为什么这件事不告诉我？是不是怕我知道了，你的人情就做不成了？”那人只得如实讲来。段加林说：“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以财政局名义写信给江西大学，说由于工作需要，请办理退学手续，把人收回来；第二个方案是：你去告诉姜正群，段书记指示，你儿子必须回来上班。还有第三个方案：你去和姜正群商议：现在不是提倡智力开发吗？各地方不都有停薪留职的作法吗？叫他自己出钱供他儿子上大学。”姜正群自己找上门来求情，段加林板起面孔说：“你知道老百姓说什么吗？说让你回来是放虎归山。以后有事情先跟我打个招呼。我若不管，老百姓就该说共产党员不敢摸老虎屁股了。”

那只老虎还偏偏不断把屁股送上来。他一位儿媳参加转干考试，只取二人，她考了第三，有人给她加上八分，成了第二名了。状子告到段加林这里，下令拿了下來。另一位儿媳第一胎生了个女孩，还要生二胎。姜正群盼孙心切，慷慨得很，说：“无非是扣一级工资嘛，生！”因为是姜副主任的儿媳，所以特别惹人注目，全县城的人都盯着她的肚子，看她敢不敢生二胎。段加林通过医院党委告知那女人，必须依法引产。否则，政策虽然规定生二胎夫妇各降一级工资，但还有一条：个别情节严重恶劣者可以采取行政、经济手段制裁，包括取消双方工资，拿生活费二年！段加林说到做到。这一来，慷慨的“老骥”也不能不叹息这个第三代价值过于昂贵了。本来，县里人说，姜正群在万安是个“除了月亮什么都能拿到”的人物，现在，大家都

看到：段加林把这只老虎的猎食能力给刹掉很多，虎威扫地了。

## 唯一的奥秘

这时，段加林的住处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来客。有的说，万安这地方可是复杂得很，你单人匹马横冲直撞，可千万要小心哟！有的说，这股邪恶势力已根深蒂固，关系网织得又厚又密，你看前几任县委书记哪一个敢去触动过？弄不好不但会落个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个人的安全也难保障呢。还收到内容相似的匿名信。

段加林始终没有闹清：这些人是出于好意提出忠告呢？还是负有使命恐吓他呢？

还在来万安之前，他精神上就早有准备了。熟人劝他多带几个人，单枪匹马绝斗不过邪恶势力。但段加林却很执拗，他不信邪，他相信万安干部和群众的多数是希望万安好起来的，因而必定跟他站到一起。

段加林公开声言：“有人想把我拱掉。我还求之不得呢。老实说，我是将乌纱帽掼到桌子上来干的。我个人无所求，也不希罕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对于当这个书记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现在的形势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党从来没有过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每个人大有可为的时候。现在不干，更待何时！反正我决心已定：党既委派我来，我就要竭尽全力，同各种邪恶势力斗争到底。打不赢怎么办？打不赢就跑——去干我的记者去！就是当记者，我也还要经常回到万安来，用笔作武器，继续与邪恶势力斗争，至少要弄得那些人不得安宁！”

不时有人告诉段加林：“昨天晚上，×××到我家来打听你的什么什么事情。”他们要下手了！“好。严阵以待，奉陪到底！”段加林严峻地回答。

如果对方收敛一些，不来刺激段加林，也许他就会腾出更多时间去抓建设了。靠近兴国县的山区（也是老苏区）一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五十元！这就是说：解放三十四年了，烈士的遗属和后裔们连温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是，也许就是这种刺眼的贫穷，激发了段加林同党内不正之风斗争的激情吧？在这块浸透共产党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以共产党的招牌胡作非为，不是加倍的犯罪吗！

## 疯狂的“王子”

县委副书记姜致远，是那位姜正群的儿女亲家。这位同志本身还是不错的，坏事的是他的亲属。打击刑事犯罪的浪潮里，公安部门摧毁了一个流氓团伙。团伙分子除一人外全部抓起来了，那一人就是姜致远的儿子姜滔。一位县领导人提出的理由是：“考虑到是领导干部的子弟，须更慎重些。”竟有这样的逻辑！段加林上任不久，就指示公安局把那姜滔抓将起来，理由简单得很：不是封建王朝都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抓起姜滔并判了刑后，“王子”的那位素以驽悍无赖著称的母亲咽不下这口气，先以“保外就医”名义使儿子恢复自由，再弄上一辆小车带上儿子沿街兜风，还要让儿子带上一个女伴！这就分明是游行示威了，看你段加林能把我儿子怎么样！你不是将我儿子判了刑吗？我儿子“保外就医”，还照样玩女人！

母亲的有恃无恐传染给儿子，他果然利用这个自由越放肆

无忌惮地胡干起来。收监以后，他还毫无顾忌地炫耀自己的一些无耻行径，某时某地，玩了某女学生。某时某地与某些人轮奸过某女职工……更有甚者，“就医”期间的一天晚上他翻过围墙，以无耻威胁手段又奸污了一个女人。段加林支持公检法去查实和处理这些罪行。检察院院长郭幼慈、公安局局长许春桃是敢于坚持原则，敢打敢冲的人，对县里的各种不正之风早已忍无可忍。他俩赶忙部署下属去侦察，新的罪行被证实了，法院决定开庭改判。“王子”的母亲又跑到公安局大闹，辱骂威胁公安人员。报到段加林那里请示如何处置？段加林说：好办。段加林亲自拟就通知，立即让她的所属单位令她停职检查，然后他又当场布置公安局传讯这个女人，并具体交待：要由几位民警穿上警服，佩带枪支，押她在县城大街上游一圈，剝剝这女人的臭威风。

这时，那孩子的父亲，县委副书记姜致远沉不住气了。先由同他过往甚密的人到段加林这里来说情，被顶回去了。姜致远亲自打电话来，软硬兼施，反对重审，唯一的理由无非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段加林反唇相讥：“既然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不爱护他，教育好他，却让他犯罪呢？难道天下的独生子都可以享有豁免权吗？”重审的结果，决定对姜滔加刑，改判为五年徒刑。

这两件事在县内外广泛传为美谈之后，一些与官场斗争毫无瓜葛的普通百姓，纷纷来信给段加林表示称道。有人赞许地说：“段书记真行，终于切了这一刀！”可见民愤郁结之久。还有的干部群众深怕段加林顶不住，在信中表示愿作坚强后盾，甚至说：“万一斗不过，被抓去坐牢，我们会给您送饭来；”“就是你屈死铁窗，万安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怀念您。”还有一位外

县的同志在来信中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您能兼任我县的县委书记，该多好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是段加林对自己的同僚过于无情；他自己也没料到对这一个家族他还要再切一刀。原来姜致远有个弟弟，在韶口公社任粮站站长，奸污了自己一个表侄女，然后就霸占下来，已有一年之久。那姑娘慑于县委副书记的强大权势，只能忍泣吞声，继续被蹂躏。现在女友鼓动她上告了，说姜致远既然连他儿子、老婆都保不住，还保得了他弟弟吗？那女孩便找段加林来哭诉。结果就切了第三刀：那犯罪分子被判六年徒刑。

这年春季，经过段加林大力整治，万安县的党风明显好转了。算来，也只不过几个月工夫。谁说共产党的党风成了不治之症，好转不了呢？

## 心在平民百姓家

段加林初上任时，有些人轻蔑地说：“万安县来了一个书生！”现在他们愕然了。邓拓同志有一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段加林也许就凭着那几分“书生气”，一上来就镇住了群邪，给他们个措手不及。万安县也不是没有过想改变一下党风日下局面的书记，但就因缺少这点“书生气”，前怕狼，后怕虎，在那张密密层层的关系网前而软了下来。“书生”一旦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就能无所畏惧，甚至看不到危险所在。正如段加林自己所云：“我无牵无挂，无私无畏，当了官先不把官位当作一回事，能够象无官一身轻似的去工作，去战斗。我就不信斗不过邪恶势力。”同久居官场的人相比，这就是

个极大的优势。

段加林也不是“初生牛犊”。但是将近二十年的“官场”生活，没有消磨掉他“平民”的感情。一九二八年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母亲被诬陷为“叛徒”，久久不能平反，也使他体验了受歧视、受压抑者的辛酸和痛苦。这对于他能保持一颗童心也起了一定作用。

不然，他对于万安县老百姓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就不会那么敏感了。他知道，邪恶势力和他们“网”中的人物，都利用职权，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亲属以至非亲属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了。还有如就业、住房等等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最优厚的一份。每逢招工，他们衣袋里都装着几个指标，可以随意送人，作为交易的资本。可是，无权无势的百姓呢？……

段加林决定：从今以后，一切招工都要公开考试，实行择优录取。考试结果张榜公布，允许人查分。考场由公安局派人监考，不许任何人徇私舞弊。这一下就杜绝了许多流弊。过去由兄弟姐妹学习成绩较好者代考，现在不行了。劳动局长的女儿考试只差零点二分，不取。县委常委兼副县长的女儿，未上分数线也不取。这就使连年报考、多次被不正之风搞掉的普通群众家的待业青年终于取得了就业机会。

他还要把优惠给予最困难的人。决定对多子女而都未就业的家庭给以照顾，每家可有一人优先就业。一些年已三十好几、生儿育女而始终未能就业的老知识青年，也得到了工作机会。段加林见有些夫妇携儿抱女登门向他道谢，心里不禁一阵心酸：这本来是他们早该得到的东西嘛，我无非是还债而已！

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奇怪的来信。字迹歪歪扭扭，也

看不懂要说的是什么。一看署名前写着“三年级小学生”，他的心就为之一动。没有大事，这么小的孩子是不会给县委书记写信的。到那孩子家里一看，就明白了！原来那孩子的父母和姐姐都没有工作，只靠做些油条，由父亲拿到四乡去兜售，一日所赚不过几角钱，全家赖以为生。这怎么养得活四口之家！

段加林回到县委，立即通过有关部门，给这户人家送上五十元钱，聊补无米之炊。接着又让劳动部门为那孩子的十八岁的姐姐安排了一个工作。事情办完，他心里仍不安：“也不过每月增添了三十来元收入而已。这家人日子还是很难过的。党和人民委托我来万安工作，如果连眼皮底下的群众的温饱也得不到解决，疾苦得不到关心，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什么呢？”想到这里，他又及时把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一起，布置他们将全县特别贫困的家庭，逐一进行调查登记，然后组织力量帮助这些特困户制定脱贫致富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 积雪难融

万安县群众对某些干部有句评语：“胆子不小步子小；本事不大气派大。”还有一句：“党员不是骨干；骨干不是党员。”段加林想得最多的是干部问题。这类“民间创作”里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呢。

“胆子不小”吗？那要看干什么事情。开常委会的时候，段加林常常暗暗观察和思忖：多数人是好同志，但是，一个普遍的特点，是胆子小，怕担风险、怕负责任。就连其中出类拔萃的好同志，在以拨乱反正精神处理一些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时，即使明知正确，胆子也是小的。然而少数不正派的人，干起违法乱

纪的事来，气派却很大，甚至大摇大摆公开地以权谋私。就好像一当了官，就有了天赋权利，可以享有一般人不能企望的好处。这种人，工作上却“本事不大”，或智能虽然不低，却不往工作上使。“步子小”，就因为好人怕负责任，迈不开大步，不大好的人又根本不想往前走。人们对于乡干部的职责和工作内容，也有一个概括：“上传下达，提留、结扎。”这句话也大体上可以用到县级干部身上。长年以来形成的秩序就是如此：只要把现状维持下去就行，所谓“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好象与他们无关。无过便是功。

除了搞不正之风，在推行“左”的一套上，胆子也不小。

曾任分管组织工作县委副书记的顾峻，为官大体称得上清廉，那股邪恶势力，一直想把他整下去，可是他不入帮伙，堪称正直。但他又是一位坚定、自觉的“左派”。段加林在万安县一年多工作中，在整治以权谋私者之外，必须对付的第二种力量——“左”，顾峻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到万安不久，段加林参加县政协召开的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快结束时，主席问一位头发半白的老年人：“吴老，你是不是讲讲？”那吴老板着面孔，冷冷地说：“我没什么说的，你们看着办吧！”段加林觉得这句话里面有文章。

他找人了解。原来此人名叫吴泽鹏，是位南下干部，医生。早期担任过内科副主任。肃反、反右期间，抓住他家庭出身、莫须有的个人历史问题和几个所谓医疗事故不放，工资和职务都给降了很多，几十年不能入党。

段加林把吴泽鹏请来，一见面就赔礼道歉：“吴老，叫你背这么多年包袱，作为党的干部，我有愧于你！”谈到最后，段加林说：“为了快一些解决，你是不是去找一下分管党群、组织

的顾峻同志？”吴泽鹏一听，脸就沉下来，说：“算了。到此为止，我什么人也不找了。”段加林一下就想起顾峻平时那副冷峻的面孔，想得出在吴泽鹏这样的人面前，那张脸一定更是冷冰冰、硬邦邦的了。

改进医院工作，并非当务之急。但是段加林总觉得欠了一笔债，便找来有关部门的人，叫他们组成工作组，内查外调。三个多月以后，查得清清楚楚。推翻了强加在吴泽鹏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压抑了多年的吴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段加林并不就此罢休，他又把医院党委的人找来，问吴泽鹏平日表现如何？“一直很好。长期身处逆境，精神压力很大，但工作上始终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提过入党要求吗？”“过去提过，后来就不再提了。”作出新的结论以后，段加林又把吴泽鹏找来，告诉他，现在可以申请入党了。吴泽鹏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只是握住段加林的手，久久不放。

对于这个素昧平生的人，段加林仍然觉得还没有偿还完债务。他在常委会上提出，破例地安排吴泽鹏当医院的顾问，享受副院长待遇。那老人从此精神焕发，白天晚上投入医院的整顿工作，拼命挖掘潜力不止。再见到段加林时，他又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声音颤抖地说：“段书记，我只恨相见太晚……”

那家医院，二十四年来总共只发展了两个人入党。不然，怎叫“党员非骨干，骨干非党员”呢！吴泽鹏入党，是一个突破，党支部又先后把八个老、中年医务人员吸收到共产党里来。

但是，尽管“书记就是党”、“一把手说了算”已成惯例，段加林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仍然困难重重。万安人许经纶原是县委农工部部长，妻子辛萍梅曾是中心小学校长。一九六二年间，由于宗族派性，许经纶受诬告，被免职。调他去垦殖场，

他不服，一怒之下回家种田去了。辛萍梅也屈于政治压力，写了辞职报告，随夫还乡。段加林来任之前，许经纶一案已经平反，辛萍梅却不能恢复职务。“谁也没有强迫她，是她自己写的辞职申请”，这一条就成了县委有关干部手里推不倒的理由。“怎么办呢？”段加林发愁了。强烈的同情促使他给这对夫妇想点子，出主意。“你们不是跟地委书记有些私交吗？写封信试试，他若批下来，就好办了。”批是批下来了，可是顾峻无动于衷，一挥手就交给了组织部，存档了。段加林找顾，顾仍然坚持“自愿辞职”，不属落实政策范围。气得段加林大发肝火，问他：“自愿？那你怎么没申请辞职呢？”拿到常委会上去。一般问题，多数常委还是听一把手的，可是也怪，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把手的权威就不灵了。段加林搬出三中全会路线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反复讲“自愿辞职”实是在非自愿条件下造成的，又搬出地委书记的批示为自己助威，费尽唇舌，百分之一百地动用了一把手的权威，才使常委们同意辛萍梅可以返城吃商品粮，按退休人员待遇。段加林乘胜追击：“不光她本人，子女也应享受商品粮待遇。”也通过了。

会散了，段加林还坐在那里不走，心想：“那辛萍梅今年才五十二岁，还可以工作嘛。万安又缺的是优秀师资。我怎么没有想到冲破一下那个惯例——过去落实人的政策时，类似情况一律按退休处理，让她恢复工作呢？难道这些同志要求落实政策就是为了得几个退休金吗？”他觉得遗憾，感到懊悔。可是又一想：“能允许享受退休待遇，他们已经是好大面子了，恐怕提了也没用。以后再说吧。”这才稍感宽慰。

后来，只要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给一个人落实政策，顾峻始终都是一个反对派。段加林常常要和他争论，两人都弄得面红

耳赤。

段加林暗自思忖：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这些案子当年是他参与决定的，因而不愿意推翻？推翻了就等于否定了他的过去？还是因为他至今固守一整套“左”的思想体系不改，总认为即使他处理错了，被处理的人也仍然有几分问题呢？是不是由于他在那条“左”的轨道上走得太久了，养成习惯，对很多很多人仍然持猜疑的或蔑视的眼光呢？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顾峻（也不仅是他一个人）对于人，缺乏感情；人的痛苦、悲哀和不幸似乎很难引起他的同情。他也很少露出笑容。有时段加林都禁不住对他有点同情了；他这一生，虽然由于执行“左”的政策，剥夺了别人的幸福和欢乐，他本人也并不幸福，很少欢乐呀。他那枯瘦的身躯，也是缺乏感情的滋润和吸不进外界新的政治营养的结果吧？他经常愁容不解，说明他本人也为“左”的路线付出牺牲，在新形势下心情老是别别扭扭吧？

尽管如此，段加林对顾峻身上的一个特点还是欣赏的：他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的意见，不怕得罪县委书记，于己不利。这是今天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段加林也报之以诚，费很大气力劝说他放弃那个过时的思想体系，但直到他去任为止，收效甚微。

### 不愁富不了，只怕……

对人的态度，是同对事业的态度分不开的。全县十二家工厂，竟有一半连年亏损。一年要由国库补贴二百余万元！书记和常委们并不介意，似乎办工业的意义就在于养活一批人，县

里每年拿得出一个过得去的“工业产值”数字报到上边去。

历届书记，都以到乡里“蹲点”的时间和次数作为工作深入程度和政绩高低的标志。交接工作时，原任县委书记着重向段加林谈到万安县这些年来粮食产量的变化。粮食产量的增长，也确是惊人的。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仅七年光景，全县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一亿斤。段加林听着，一边向窗外望去，远处一片荒山秃岭。有的还长着青草，有的则赤裸裸的，露出红土壤的地方，象人体上的伤口，令人惨不忍睹。“粮食上去了，”段加林心想，“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呢？群众的生活，县里的财政收入又怎么样呢？”段加林一来，就郑重宣称他不当农业书记，更不当粮食书记。他敬佩赵增益省长的品格和工作精神，决心在万安认真贯彻赵省长提出的经济设想和奋斗目标。把眼睛盯在全县整个经济工作上，总揽经济全局，从实际出发，切实讲究经济效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县锅炉厂由一个原乡党支书领导，已经濒于倒闭。看县领导干部，好象没有这回事似的。段加林却急得不行。他看中县经委一个年轻的普通干部马欣然，是六十年代中等机械学校毕业的，革命烈士子弟，有胆有才。在常委会上一提出来，遭到一致反对，都说此人是造反派，根本不能重用。常委们也认为问题的性质无非是“说错话，做错事”而已，但还是坚持不能起用。段加林有理有据地说服大家：“造反派里固然有‘三种人’，可是也有第三梯队。”这在有些人听来，简直是奇谈怪论！那么锅炉厂就要倒闭，二百多人即将失业，可怎么办呢？那是无关紧要的，但干部队伍一定要保持“纯洁”。

幸好这时干部任免权已经开始下放，副职不需党委批准。段加林就去找经委主任王贻隆，一位与他思想一致、干劲很足

的同志，把事情的原委如实相告，问他：“你敢不敢发个通知，起用马欣然为锅炉厂的副厂长？他暂时不是党员，就由你们经委派一个副主任去厂里兼任党支部书记。厂里的工作全权交给马欣然去干！”王贻隆说：“你敢，我有什么不敢？！”定了。但在中层干部会上宣布任命时，还是引起爆炸般的反响，以为这是胡来。马欣然懂机械，也懂管理，又有魄力。他首先对科室和车间人员做了调整，派人出去跑销售和进原材料，又打破大锅饭，实行责任制和工资浮动。锅炉厂这年到四月为止，产值只有十九万，马欣然上任后，一个月一下就创造出二十万零五千元的产值，以后一直稳定在二十万元以上。八四年这一年，全厂盈利一百三十多万元，是建厂以来最高的一年，质量也上去了。结果怎么样呢？县委里还有人跑来找段加林说：“这个人可是不能用呀！”段加林只能苦笑地说：“试试看吧。只要查明马欣然是三种人，他下台，我检讨。”

万安地下资源丰富：钨、石灰岩、煤、砂土、莹石、水晶矿、钾盐等等，藏量都很丰富。你以为这些东西开出来就会是财富吗？非也。水泥厂创办十五年，连续十五年亏损。建厂投资不过一百一十多万元，亏损总额却达到一百五十六万！等于把一个半工厂活活吃掉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产品质量不稳，生产出来的常常连300标号也达不到，根本就不是水泥。人称老大难工厂。其实也并不难。把长期搞化验的两个年轻的大学生换上去当厂长和副书记，派人出去学习，请人来厂指导，原来主要是个配方问题。把配方改过来，再添点设备，八四年七月份产量一下就达到一千多吨（原先是二百吨至四百吨）。到九月，摘掉亏损帽子，到十二月，就盈利五万多赚了。

查查每个厂矿的兴衰史，都是同一类故事。领导无能，又

不团结，抱住老制度，死吃大锅饭。一换人，马上面目一新，生产直线上升。经委主任王贻隆原是计委主任，见全县工业奄奄一息，县委安之如怡，已经不想干了。段加林把他调到经委当主任，将帅一心，使劲抓经济改革，不出一年，除一家工厂外，全部上去了。到八四年年底一算，县经委口的所属企业，比上年增利八十余万元。这个地处偏僻，工业基础很差，技术力量薄弱，交通信息闭塞的小县，总算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起步。

新建的糖厂，提前一年投产，专家们称为糖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靠起用得力的知识分子。省里八四年三月决定年内投产的时候，在赣州订货的设备还未制造，它的原材料还在四川躺着呢。那是个日处理甘蔗一千多吨的中型糖厂，总投资二千三百万元，到八三年年底才用掉二百六十万元。段加林也担心九个月能不能完成原计划二十一个月的工作量。但是决心已定，他打头，后面跟上几个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处跑。不可缺少的一种无缝钢管眼看是没希望弄到了，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县委书记和助手们到工厂各个车间角落里去拣人家扔弃的下脚料。糖厂终于在十二月十五日试榨成功，当年创造产值一百二十六万元。稍微了解一些办企业艰难的同志都明白，从图纸设计、资金投放、基建进度、设备订货、安装施工，都是按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投产的要求来安排的，结果却提前了整整一年建成投产，这是多不容易！

但是，正如历年来工业的亏损没有妨碍一批又一批干部荣升一样，段加林本人和他起用的新人这一年做出的成绩，对于他们今后的仕途也不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一切好象都是理所当然的。人的价值不是由他的业绩来决定的。

## 珍珠与粪土

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得到社会的酬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之间的不成比例，简直到了惊人的程度。失望造成的痛苦是难捱的。

万安县城唯一的建筑工程师，城里几十年来所有建筑的设计者，浙江人、中专毕业生李友昌这个人，县委领导怎么硬是看不见呢？万安县再没有第二个这种人才，怎么能放他走呢？现在南昌县看中了他，答应给他一套住房，加二级工资，儿女也可以带去。段加林若晚来一步，李友昌也就走了。李友昌就是这么说的：“段书记，不是你来，我非走不可。”为什么要走呢？因为他觉得这里并不需要他。他建了几十年房，全家人却只能住在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居室里。他的设计，外行的领导指手划脚，他不能不遵命改动，房子造好了，挨骂的又是他！前两年，为了搞城市总体规划，他常常必须打夜班，经建委主任批准，奖给他二百元奖金。主任和没打夜班的人，也照领一份不误。后来又说这笔奖金不该发，必须如数缴还。其实主任等人若不拿，也就无此一说了。李友昌无奈，只好卖掉自己家的自行车和缝纫机，挥泪“退赔”他当之无愧的合理报酬！段加林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件事，抱不平地说：“他那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价值绝不止二百元！”结果经县委同意，补发了二百元给李友昌。可是段加林还觉得过意不去，对李友昌说：“老李，凭你的本事，有钱也买不到好自行车了。来，我给你开个条子，去买一辆凤凰牌。反正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李友昌感动得几乎落泪，段加林却面有愧色，心想：“就是奖给你

十辆凤凰牌，也抵不过你这些年拿着低工资、受着窝囊气为万安人做出的贡献呀！”

李友昌决定放弃外地的住房和高薪，不走了，工作干劲倍增。然而到段加林要提他做城建局副局长时，还有人不通，甚至还提出那二百元奖金也根本不应发还！段加林不予理睬。县政府里还是增添了一名精通业务、热心四化的城建局副局长。

然而副局长本人的自我意识却依然比这个身分低得多。一次开会讨论建设规划，与会人员多为有关局的正、副局长，李友昌自然是主要角色。他一上来就规规矩矩地说：“各位领导，今天由我来汇报，请领导同志指示……”段加林立即打断他，笑呵呵地说：“老李，你本人也是领导嘛！不是请示，应该说和在座的同志们商议一下。”他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为受压多年的知识分子撑腰壮胆。

房子怎么办？还住那十四平方米呢。段加林和几位副县长与办公室主任商量：无论如何得给李友昌分配住房。“实在没有的话，就请你们几位让出一间怎么样？”不久，李友昌一家终于迁入两间住房。

段加林离开万安时，李友昌来送行，流着眼泪，手都激动得发抖，结结巴巴说不清话，但段加林还是听懂了他出自肺腑的话，只不过内心里很是不平：“到底应该谁感谢谁呢？他不为名，不图利，几十年如一日，没日没夜地把心血倾注到这块土地上！有些人却饱食终日，日夜为私利奔忙，日子越过越好。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段加林啊，你来得太晚了！

江西留不住人。万安也留不住人。越是穷困，发展停滞，因而人才理应更加珍贵的地方，人才倒越贬值，是不是有点

怪？

周甘霖夫妇，都是华中水电学院的毕业生，在万安工作多年，只因有海外关系，受过很多苦，始终不能重用，硬是不能当县水利局局长。人家一到广西，就马上当上了水利厅长！江西农学院一九六一年本科毕业生朱国忠，在万安县一直被冷眼相待。人家去了井冈山市，就当上了农牧局长。周增旺，也是江西农学院毕业生，学园艺的，万安县柑桔种植业亟待发展，也不肯重用。到了浙江省一个县，就当上了副局长。还有一位从事种子工作的田继昌，在万安县只能当一般干部，到了吉安，竟当了地区商业局副局长！

这里有没有一个恶性循环呢？越是穷困落后地区，没有文化、不肯学习、眼界狭隘、事业心差的干部，晋升的机会就越多。没有本事的人是靠权养威的，有能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权威就会形成一种威胁。于是，贬之，压之，冷待之，最后，使之外流。于是，前一种人的权威便巩固了，再以自己为模式，选拔接班人。穷困被维持下来，建立在穷困土壤上的权威，便以近亲繁殖使这穷困继续下去。

经济改革和干部四化，打断了这个链条上的某些环节。段加林上任不久，地委派出参加县里机构改革的工作组便接踵而至。没有“机构改革”这个好时机，段加林是不可能短短一年里就更换了中层的几乎所有干部和县级一批领导干部的。

段加林刚到万安不久，地委组织部来电话通知，要求万安县派十四名四十五岁以下、正科级以上的干部，去地委党校轮训几个月。县组织部选来选去，全县符合条件的只有三四个人。那时，县直单位和公社里，绝大多数是五十岁以上的同志在那里担任主要领导。而当段加林离开万安时，中层主要领导

基本上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了。这第一个“基本上”到第二个“基本上”，该是一个多么可贵的飞跃啊！有了这个飞跃，才有前面所述的成绩；有了这个飞跃，才有万安的希望和更加美好的前景。

当然，在大批中青年干部涌上领导岗位时，也难免有选得不准的地方，还有个别中青年干部，“少年得志，不可一世”。对这少数同志，段加林的办法是一看二帮三调离。在万安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段加林就果断地变动了两个常委、两个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打破了历来“能上不能下”和终身制的传统。这一着，对于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更是有神奇的威力。他们明白，谁也不能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了。如果不努力工作，不严格要求自己，不做出显著成绩，就不好向县委交帐了，甚至随时有被调离的可能。

## 重绘河山，也有拦路虎

段加林说他不当“农业书记”和“粮食书记”，意思是他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去办传统的农业。

他胸有成竹，要重新描画万安县那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图。多年来，这张地图的色彩难道不是过于单调了吗？那上面的山水、土地、道路和建筑难道不是过于静止而呆滞了吗？

“猫是吃鼠的，田是饱肚的”——这句民谚，这个传统观念，害苦了江西老俵啊！透过这个具体观念，还看得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人们是太容易满足了，而那条“左”的路线又把人的地位贬得太低，把人的需求放到一条只求温饱这个动物般的低水平上，“饱肚”而已！

但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却不限于饱肚。传统的领导方式为什么老是书记选定一个点、这个点又偏偏是富足而先进，并且老是给它吃偏食，用优厚的化肥、机电、资金等等供应喂得白白胖胖呢？这就不是为了“饱肚”了。为的是显示领导高明呀。“高明”而后继之就是提升。

段加林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选最穷苦、最偏远的山沟做自己的“点”。其实也难说他有什么“点”，因为他心常念之、人常往之的“点”是太多了。他去得太勤，有些穷困社队甚至担心他来多了，招待不起。幸好那段书记浑身没一点官气，说的全是真话，他谢绝招待，真的是不想吃喝，大家也就放心了。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深知万安的优势和潜力，在山、在水、在耕地、在良好的自然气候。他考虑的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如何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使产品优势变成商品优势，使商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段加林眼睛不是盯住全县人平这一亩多耕地，而是着眼于人平十多亩山地。走到哪里，他就和那里的干群研究如何治山。为了让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山场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他竟下了一道道死命令严禁用木材和茅草烧砖瓦窑；严禁烧木炭，除医院和接待单位外，各机关团体冬天不许烤木炭火；严禁乱砍乱伐林木，包括杂木棍。他说，这是干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蠢事。段加林还说，如果近几年内，能够把全部荒山绿化起来，就是粮食总产掉下来了，也在所不惜。当然他心里明白，林茂粮丰，林业上去了，粮食产量是掉不下来的。

段加林对多年来被人们遗忘的草山草坡，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要求千家万户大养猪牛，他让畜牧兽医人员去外地采购优良草种，推广蛋白质含量高的墨西哥玉米、黑麦草，引进西

门答尔奶役两用牛、黑白花奶牛。

段加林发动群众大种甘蔗、柑桔、花生、西瓜，甚至主张拿出好田来种，在便于运输的公路两旁种，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段加林对为数甚多的水面也格外关注。他要求充分利用水库水塘，大养其鱼，还广泛开辟稻田养鱼的新途径。

段加林就是对于粮食生产本身，也有他的新花样，除了种水稻而外，他还主张多种玉米、大豆、五谷杂粮，对于劣质的水稻品种，他坚决果断地淘汰。有人硬是想不通，无非是担心“产量指标”会掉下来而已，却不考虑劣质大米是赔钱货。在一次讨论推广优质大米品种的乡党委书记会上，段加林既严厉又幽默地说：“对不起，你们不换种，我可就要换人了。”说得党委书记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这就需要人，需要各色各样的人才。段加林和县常委把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大、中专毕业生，长期没无闻奋斗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提拔担任了县委农工部的副部长，科委主任、副主任，农业局长，副局长，林业局长，副局长，水电局长、副局长，有些乡党委的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农科所所长、副所长，良种场、渔种场、畜种场、林场的场长、副场长。有时，段加林带科技人员下乡，乡里的领导见他来了，连忙跟他握手，而把科技人员冷落在一边。段加林当场就批评说：“你们的水平还不及普通农民，我和科技人员访问专业户时，人家把科技人员奉若上宾，而在你们眼里，却如此无足轻重！”

这个从大学时代起一心想做个作家的书记，自己也觉着奇怪，怎么对于看来枯燥而琐细的经济和技术事项有了这么大兴趣呢？他对于猪、鱼、柑桔、蜜蜂、蘑菇和西瓜的兴趣，可以保证：同他的食欲和将来的作品是无关的。不知不觉中，他跟

许多专业户交了朋友。他给缺乏配合饲料的人批条子，给想买电动机的人找卖主。猪育肥了，找不到销路，他让食品公司去疏通渠道，到食欲旺盛的广东人那里去开辟市场。西瓜产地弹前乡丰产了，发愁销路不畅，他就把《江西日报》、省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请来，又发消息，又播录像，打开了市场……

作为一个江西人生活在江西，段加林深知过时的观念，长年累月奉为正统而早已同改革和四化的需要相抵触的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东西，如何牢牢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和行动。于是，他让县里五套班子的领导，带领各乡的党委书记和县直有关单位的领导，一行五十多人到广东参观学习，使他们大开眼界。“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思想通了就不难。”这大大小小的“老大”们，原来一直固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沾沾自喜，满足于“产量不高年年增，贡献不大年年有”。出去一看，耳目一新；看到了差距，焕发了精神，增强了发展商品生产的信心和力量。

经过艰苦努力，这一年，万安虽遭到多种自然灾害，又拿出了近三万亩田来种经济作物，粮食总产比上年仍有所增长。林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新造各种林木十万亩，大大超过了地区下达的计划。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新增柑桔面积近六千亩，几乎接近于解放以来柑桔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西瓜的总产和瓜农的总收入均超过了上年。渔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乡镇企业开始起步。农民群众的收入比上年有了明显的增加。

仅仅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段加林眼看着山的外貌、水的内容和地表的作物在变，喜不自胜。尤其可喜的，是人的精神境界也随着物质上的富裕而升高了。粮食专业户赖肇钰一次购买国库券三千元，还常常拿出钱粮无偿供应五保户、困难

户。养猪专业户廖长生，对前来学习养猪技术的外乡农民，免费提供吃、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还以小型粉碎机作为奖品相赠。“八机部长”张小曼，购置一辆客车，以优惠的价格，方便乡亲进城。养鱼专业户赖承梁，柑桔专业户刘恒宝，为了让更多的农户掌握生产技术，经常应邀到各乡传授知识，来回费用自理，不取分文报酬……

诚然，这些人尚未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个崇高境界。但是，极左路线猖獗之时，这些人确曾被迫地“毫不利己”，还彻底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程度，却也很难“利人”，更谈不上“专门”了。现在，他们在“利己”的同时就为社会增添了那么多财富，也算“利人”吧？然后，又慷慨解囊，自愿报国助人，这就是自觉“利人”了。看来，“利己”与“利人”也并不是绝然不能共存的。看来，富裕并不就一定就破坏理想和道德，只要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好好引导，它还会在比以贫穷为土壤的更高层次上重建理想和道德吧？

一想到曾有那么多年月，如此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只能沉睡在那里，甚至遭到无情破坏；如此聪明勤奋的人民只能压抑着甚至掩埋起自己的热情、才干和精力，段加林就不能不感到痛心，叹息不止。

谢天谢地，那个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不管什么人和多少人至今还依依不舍，发着和段加林全然不同的叹息，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是任何人都无力挽回的。

### 酝酿着一个转折……

一九八四年秋，在万安县所属的吉安地委里，发生一起事件。省委决定，地委书记要换人。由谁来继任呢？仍然按照常

规，由省委提名，实际上是担任过前一届吉安地委书记的同志和即将卸任的这一届地委书记（他也是那位前届书记提名的）提名，省委书记和常委批准。

历来如此。但这一次却有人提出了异议。不征求地委班子的意见就指定接班人，地区专员王国本对于这种作法表示反对，认为具体人选也不适宜：此人“文革”期间有问题，自己长期没有交代；政治素质也不理想。

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万绍芬经过调查，支持王国本的意见。于是省委书记们就重新研究吉安地委书记的人选，要采取新的方式来决定了。

这件事，对于段加林的前程将发生非同小可的影响。段加林却全然不知。他仍然做着同省委即将做出的决定没有多大关系的事。

### 这里荒草最深，因为同“指标”和升官无关

在治理万安今天的同时，段加林想到万安的明天和未来。人的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他常说，生产是今天，科研是明天，教育是后天。科学技术是当前的生产力，教育则是未来的生产力。他到万安以后的第一天，就让送他前来上任的妻子刘苏英先行前往拜访他俩中学时代的老校长、特级教师衷期星。第二天，他又登门拜访了老校长和万安中学的师生员工。在座谈中，他听说万安中学近年来拖欠了有关单位的基建经费达十多万元，还听说全县有不少的教师，看病的药费都因公费医疗费用“超支”，无处报帐，心情十分沉重，一直谨记在心中。年终县财政决算时，还有二十余万元结余。段加林首先提

出：用这笔钱，让万安中学还清拖欠的基建款，让每个教师把身上的药费单拿出来报销。县委书记深入中学，这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在万安县却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新闻。财政拨款给学校还清旧帐，报销药费，本来是一件早就应当做的事，却成为段加林关心教育事业的一大政绩。干部群众，特别是师生员工欢欣雀跃，奔走相告。这倒使段加林反而感到惭愧和不安了……

每次下乡，段加林总要去看看乡村的中小学，并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高陂中学，他发现一幢新教学大楼没有铺楼板。赖校长告诉他，这幢大楼八〇年就已盖好，铺楼板的木料也准备好了，就差一千元工钱，反映了多次也没有得到解决。段加林听后便对陪同他去的公社党委书记说：“你乡有多少个大队？”“八个。”“明天你下个通知，让每个大队集资一百元，剩下两百元你公社付，再不然你我各出一百元也行，你看怎么样？”那位公社党委书记连声应诺。拖了三年之久的事，不到三分钟就解决了。

校长见到县委书记，竟有紧张得直冒冷汗的！那是在视头中学。见此情景，段加林亲切地说：“张校长，我也是学师范的，如果不是机遇和历史潮流，把我推到现在这个岗位，也许我就是这里的一名语文老师，你还是我的领导哩。”一席话把校长的紧张心情打消了。接着段加林让校长领他去听课，他还拿起课本给学生讲解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当问到学生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时，张校长说，学生饮用的水，取自一条渠道，而上游不远是公社医院，医院的污水脏物常往渠道里倒，影响学生的健康。段加林连忙到实地查看，并找医院康院长来共商解决的办法。康院长表示当天之内解决这个问题。段加林说：“好！

本来我今天打算赶回县城，明天上午还要参加一个会。现在不走了，明天早晨验收后，我再离开这里。”第二天清晨，他见到医院近渠道的垃圾全部清除后，才放心地离去。

在社坪中学，段加林看到学校门口的大桥被洪水冲垮，学生上学要蹚水过河，他立即让有关部门拨款建桥。在武术小学，段加林见学生晚自习时，电灯下点着煤油灯，他让公社马上换上大灯泡。

欺侮老师的行为，段加林更不能容忍。有一次特级教师衷期星向他反映，百加中学管理员凭肉票向公社食品站买了十多斤肉，已经快到学校了，食品站的会计从后面追来，不容分说地要把肉拿回去。原来站里刚接到电话，说县公司经理要来检查工作，而肉又卖完了，便来要回中学买去的肉。段加林听后，连声说，“欺人太甚”。

第二天上班，他坐上车子专程赶到百加公社。找到食品站的负责人和会计，狠狠批评说：“天天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至今日，你们还如此欺侮老师，实在难以容忍！你们必须写出深刻检讨，并保证今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

县里每年都有一批高中毕业生高考中名落孙山。这批学生中，有门路的可返回中学，重读高三。绝大多数学生想有个补习机会，却只能望着校门兴叹。段加林听了很是心疼。他本人虽一帆风顺读完了大学，但能够体会失去求知和上进机会的年轻人的痛苦。他去找政协的领导，请他们出面，办两个补习班，请退休的老教师来任课。补习班设在什么地方呢？段加林想到以往开群众大会用的那个主席台，把当年阶级斗争的指挥台改建成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教室，这太好了！从此，一百多名学生，又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 好兆头：不想升官的人升了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版出现了一条新闻：

108名县级干部当“伯乐”

吉安民主推选地委书记

本报12月21日专电 通讯员李志勤、华有良，记者赵相如报道：中共江西省吉安地委根据江西省委决定，召集县集以上干部民主推选地委书记。江西省委根据投票推选的意见，于12月14日正式批准段加林任吉安地委书记。

原吉安地委书记由于年高退居二线。谁来接任这一职务？有些人曾以为省里定会委派接任；有的人甚至认为上级机关已经内定，徒求意见不过是个形式。省委书记许勤、省委常委万绍芬来到吉安明确指出，吉安地委书记不派不调，省委一个推选名头不提，由地区一百零八名县级干部中自由提名，民主投票，谁得票多，谁当选。省委只要求被推选者须具备以下条件：政治上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表现好；要有大专以上或相当于大专以上文化；年龄在五十岁以下；能开创新局面，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许勤和万绍芬要求大家不徇私情，要投党性票、投公心票、投对人民负责的慎重票，不投派终票、不投个人恩怨票、不投封官许愿票、不投不负责任的随便票。他们对被提名的十八名同志的简况作了介绍，供与会者继续酝酿；又对推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公布事实真相，追根究底，

不轻易放过有关的疑点，使大家对被推选同志有了全面的了解。通过几个回合的反复筛选，在最后一道筛选中，得票超过半数以上、大学本科毕业、这几年工作很有成绩的万安县委书记段加林当选地委书记。

这次民主推选地委书记，在江西省反响热烈，普遍认为是发扬民主、改革党员领导干部制度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 临别的忧虑

段加林是参加了这次选举的。他得到的选票，起先低于那位两届地委书记提名的人。到第三次投票时，他超过那个人了。最后一次投票，则远远超过那人的选票，取得了压倒的优势。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本来，奉命前来万安时，段加林对于县委书记这个角色并无多大兴趣。当然他决不是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只因为他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后来他想到：要为知识分子争口气，也证明一下自己是否能够担得起这副担子。一年以后，他却对万安这块土地和人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向全县提出“动员千家万户，付出千辛万苦，开发千山万水，造福千秋万代！”这个口号时，是把自己也放在里边的。他多么希望，通过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的艰苦努力，尽快把万安建成青山绿水，美丽富饶，政通人和，文明繁荣的新万安！

想不到，正在他很想万安多干几年，按自己的设想把这个县的党风整得再好些，使二十三万人民生活真正富裕起来的时候，他却必须离开这里了。

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是不是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一个共产党

的县委书记在现今条件下所能做到的事呢？“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让历史去检验，人民去评说吧！

他想得更多的，是万安县的未来。有些迹象，使他不敢放心。

当他怀着惜别和内疚的心情去向仍未摆脱贫困的农民们告别时，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万安人没有福气，刚刚来了这么一位好书记，又这么快就走了！”

“‘福气’！”段加林有点气恼地想道，“解放三十五年了，老百姓能不能得到一个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地方官，还要靠运气！这点选择的权利，早就应该有了吧？”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段加林再次横渡赣江，回到吉安市履新。站在船头，他再一次想起了文天祥的诗和辛弃疾的词。段加林还想起毛泽东《送瘟神》中的两句诗：“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血吸虫是小虫。然而在万安县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无形的小虫呢？

他回想起一年多来他曾经与之做过斗争的几种力量。他想起取得的胜利，也想起遇到的挫折。党风确实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为什么有些经他建议和争取安排到领导职位上的同志，送行时忧心忡忡，好象他段某人一走，他们的命运就有点飘忽不定了呢？有一位和他一起同不正之风做过勇敢斗争的同志竟要求段加林把他的儿子带到吉安去，颇有点“托孤”的意味，使段加林感到凄然，就好象看到有一个相当大的阴影立在这一家人的背后。

为了马欣然的党籍问题，他做了最大的努力，仍然归于无效。头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忽然有人提出马欣然是“文革”中

突击入党的，把段加林给懵住了。后来查明，人家是一九六五年入党的。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常委会上，段加林认为同他观点一致的同志，竟然也采取了弃权的态度，对于恢复马欣然党籍的问题不置可否！

他这一年多，确实做了不少前人未曾做的事。然而他无能为力的事，也绝不止马欣然这一起。他想裁减人浮于事的乡干部。县医院里通过多种“关系”塞进去的非医务人员占去了许多名额，真正能治病的医生却嫌不足。他主张把学校中能力太差的教师抽下去进修，然后经过考试重新录取——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竟也未能办成。

万安县人民赠给段加林的评语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是看来仅仅靠一个“清官”还不够。

他段加林现在更加坚信：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是很好的，是想把万安县搞上去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形成不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制止和惩罚不了恶人，甚至往往无力保护自己和自己所从事的崇高事业呢？

人们对他的卸任越是惋惜，对于他的离去越是依依不舍，段加林心头的思绪越是紊乱。

想到他即将担任的新职，段加林决心一如既往，拚搏上阵，但如果实践证明他干不了，他也决心让贤。他这一介书生，自有一套书生的人生观：“文章千古事，为官一时荣。”何足惜耶？到那个时候，他将挂冠而去，重操旧业，继续他的记者生涯。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于江西井冈山上

# 孤雁离失记

## 第一章

“1984年9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干事打开监狱的门，叫了一声：‘刘永江，你出来！’我来到所部，见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同志站起来跟我握手，说：‘我是《工人日报》记者。他是位电视剧编导。我们专程为你的案子来，想先找你谈谈。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已命令释放你出去……’回监狱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总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犯人们都说：‘不是做梦，是党的阳光照进了监狱。刘师傅，你终于重见光明了！’”

下午六时，两位同志又亲自接我出监，用小车送我回到家中，还送我家很多东西，直感动得我一家上自八旬老母，下到小儿不知说什么好。我在心中默默念道：‘感谢英明的党，感谢好人啊！……’”

这个四十五岁、身材瘦长的汉子，此刻用一双大手捂住他形容枯槁的脸，大颗泪珠从他深陷的眼窝中流淌出来……

## 天生丽质难自弃

这是一双不平凡的手，三十四年来不知有多少金属和非金属经过这双手变成急需的工具、部件以至一台又一台机器，其中许多是前所未有的。刘永江为一个又一个工厂解除了生产危机，挽回了一起又一起社会财富的损失，使人们转忧为喜，向他投过感激和惊羡的眼光……

按照先天的安排，刘永江应该是个天才的工程师或发明家。但他只上了两年小学，十二岁上就不得不去劳动，养活贫病交加的双亲了。中国有多少人物，在这个生活的岔道上埋葬了自己的才能！刘永江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技术的天生的兴趣，总是和他对于人的感情混和在一起，形成他创造的冲动；在他善良的心里，那感情又总是不见衰退。十二岁那一年，在柏溪镇那间低矮的锻工棚里，他开始有生以来第一个技术构思的时候，就是从对人的同情开始的：见过路的老乡们常在躬着背吭哧吭哧地磨刀，小学徒就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琢磨开来了：“能不能省点力呢？”他一连十几天鼓捣到深夜，利用他并未学过的偏心轮原理创制出一种脚踏式磨刀机。人只须踩几下，刀就磨好了。

他当然得不到任何报酬。仍然是师傅每月拿三斗米，刘永江每月三升米。但老乡们的笑容和他对自己创造力量的发现，就足以使他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磨刀机唰唰的响声，就给他的一生定下了音。

接下来是参军，当汽车驾驶员。复员后在四川和云南的几家工厂做工。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勤学苦练，练就了车、钳、刨、

铣、焊和汽车修理技术，学会了机械设计和制图。在走过的每一处，他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不是突破了什么技术难关，就是填补了某个空白……

也不是没有不祥的信号，可惜他全没有理会。

一九七四年，屏山县工业局的易书记慕名而来，请刘永江去帮助建一个小厂安置待业青年。资金很可怜，只有两千元，却要造全厂的设备。刘永江一听是安置知青的，就爽快地答应了。易书记很受感动，觉得应该有以相报，便许诺说：“搞成了，我想法把你老婆和娃娃的户口转到县里来。你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让你为家里的事分心。”

这是十年前的往事了。刘永江家属的安置问题，第一次被提上日程。那时，妻子刚刚在宜宾生下第四个孩子。刘永江心疼妻子，把二娃和三娃这两个调皮的男孩子放在自己身边，爷仨每天靠两分钱咸菜度日。上工时候，他就把两个娃儿拴在车间的柱子上。

这一回，刘永江照例又是自己设计、制图和加工制造，一个月以后，十一台自动象棋制造机就交货了。这个县几十名知识青年有了生活出路。易书记也未食言。他先把刘永江的妻子李天蓉安排到农机厂当临时工，再办一家人的户口。各方面都谈通了，只有一个人不肯点头，理由是：“刘永江一贯只专不红。这样的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凭什么把他的家属弄到城里来？”

事情就这样吹了。刘永江没有去领会这件事的含义，从而放过了生活向他发出的这个信号。

那人并不是出于什么堂而皇之的信念反对刘永江的，他曾三次托人找刘永江给他车制三个玻璃瓶水杯的盖子，刘永江没

有从命，如此而已。

哦，一边是三个茶杯盖，另一边是一家人的命运——生活中竟会有这样的等式！

潜在的危机，已经露出它狰狞的头部。

### 雄心勃勃

为了离家近些，便于照料妻儿和年迈的双亲，一九七五年刘永江到宜宾县化工厂工作。

一天夜晚收车回来，他见厂区一片慌乱。一辆救护车停在车间门前。刘永江赶忙跑进车间，只见硝烟弥漫，对面墙壁和屋顶已掀去了半边。

几十个工人吊唁似地站在机器残骸旁，一个老工人喃喃地说：“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啦。还好，这回没死人……”

看着工人们的满脸愁云，刘永江的心沉了下来。他用自己的第一个月的全部补助津贴买了慰问品，到素不相识的受伤工人家去探望。一个人手炸掉了。还有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失去一只眼睛。原来是这样：一个小炮仗大的雷管在压药时一炸，就能引爆几十个、几百个雷管。这种“殉爆”现象在工厂频繁发生。有一次一个月就炸了十一次。去年炸死三个人，有门路的都在琢磨着调走。工厂光为修房子就背了十几万元的债了。

并没有人用期望的眼光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的高个子驾驶员，盼望他来为改变现状做些什么。可刘永江却禁不住想：“就不能让它们不爆炸吗？”

从此以后，刘永江就用卸车的间歇到车间去察看了。他边看边问生产工人，逐渐弄懂了爆炸的原因：工人完全用手工往料斗倒药，然后用手扳压力机压药。每一根雷管都要压三次，

每次用力不匀或动作过急都会引起爆炸。还有几十米长的生产线，各工序之间全靠手工传递，也有爆炸的危险。

生产线每班二三十名工人，只能生产两万发雷管，效率太低了，质量也不好，老是有外壳鼓肚子、起皱的。

“搞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就好了，”他暗暗想。谁来做呢？凭过去二十多年的革新和创造经验，“我能行！”

他觉得热血在撞击胸膛了。

在这家专门生产工程用雷管的小厂里，他的工作恐怕是与火工生产距离最远的工种了。一个人伺弄一辆山城牌卡车，每天五点起床到几十里外的核桃坝拉三车煤，回来还要到河滩拉十多车砂石，晚上八九点才能收车（后来接替他工作的司机，每天只拉一次煤，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就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何况汽车的保养、修理也全是他的活儿呢！

最初的设计构思阶段就是漫长而艰巨的。给孩子买课本的钱用来买技术书了，睡眠也俭省到每天四小时……

尽管设计是悄悄进行的，还是被工厂支部书记李吉成发觉了。这个瘦削精干的老头儿，成了刘永江的第一个知音。他一进厂，就决心改变这里生产低、质量差和事故频仍的状况了。他知道刘永江正在设计的雷管生产自动线，国内没有，在世界火工工业上也是个空白。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人敢于攀登这样的高峰！几年以后，当刘永江已接近成功的峰巅时，工厂里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还当作笑柄。李吉成却在当时就油然而产生一种敬意，因为他从那车库中通夜不熄的灯光、从刘永江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一麻袋图纸里，看出这是一个不凡的人，相信他会成功。

一九七六年十月，他终于完成了雷管生产主要过程十二个自动工位的设计构想。摆在面前的新课题是：用一种什么形式把这些工位——或者说机器组装成一个整体呢？

### 怪影憧憧

刘永江是过分热衷于排除雷管给他人带来的危险了，竟未察觉他无意中在自己脚下埋进了地雷。他无意中、甚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怠慢了个别人，怎么就会在他们心中埋下怨恨的种子呢？

那天财会股副股长曹炳香搭他的车走亲戚，他没有送她到目的地，确实是担心缺油，车回不了厂。他在约定地点等曹会计回厂，等了半小时她还未来，对面跑来二十多人要强行搭车。他的车已经装载了四吨煤，他怕出事，只好把车挂上挡，冲出了人群。曹会计难道没听说那些年有很多司机因为拒绝强行搭车而挨打吗？然而她还是要在心里狠狠记上一笔帐。

因为头夜下了雨，那天刘永江的车一出厂就必须开低挡驶过又陡又窄的黄泥路下坡，因而噪音很大，打雷都听不见，能听见洪副书记在车子后面又赶又喊吗？这就又得罪了一位领导人，而副书记又是曹副股长的丈夫。

这就会造成一种联想：“哦，你刘永江分明是不把我们夫妇放在眼里呀，你是仗势欺人哪！”仗谁的势呢？李吉成叹。这就使怨恚翻了一番。

至于人事股长佐自成，他当然有更多的理由怨恨刘永江。佐股长要学开车，再三要他给车。这是严重违章的事呀，压死了人谁负责？股长学习心切，遭到几次拒绝之后还不死心，又多次强行开车。这可怎么办！刘永江不报告李书记怎么行？可

是他一报告，书记一批评，自然就恨上加恨了。

他只能叹息。当司机这么多年，他拒绝过多少人搭车或开他的车！怎么只得罪了这三位呢？无非因为他们大小是个“官”嘛。不然，曹副股长那天就不会狠叨叨地说，“看今后谁找谁的时候多”了。

搞报复的时候，办公效率是很高的。刘永江的妻子李天蓉在屏山县象棋厂的时候是四级机修工。宜宾县化工厂的机修车间是她建立起来的；车工是她，钳工、焊工也是她。但是她现在却只能拿小工的工资了。去问吧，人家说得有原单位的证明。好，证明信来了：“李天蓉同志原在我厂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担任四级机修工。”三位领导又说：“证明信来迟了，不能算数。”劳动局和工业局干涉，厂子里可以不听。后来郭厂长同意发技工工资了，三个月以后又被曹会计强行扣回已领的工资！

再看那佐股长介绍来的那个十几岁的农民：厂里并不需要木工，他却可以学木工；他明明是学徒，却给他定了个五级技工，还拿六级技工的工资！

刘永江夫妇都工作，可是有一个月他们全家竟没有一元钱伙食费！那是刘永江父亲去世，向厂子借了一百元钱办丧。别人家有红白喜事，厂子都给一两回补助。刘永江非但得不到一分钱补助，曹会计还非逼他一次还清债款不可，要求分两个月还清都不行。

刘永江都忍了。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想不到，这一切还会自行升级。

### 机遇偏爱有志人

幸而刘永江也享有一种特权，那是创造者得天独厚的优惠：

他干脆没有多余的时间和感情用到怨天尤人上去。这，大约也是人类在最黑暗的时代也能有所前进的原因之一吧。

刘永江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他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那条自动线。如今，十二个工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构成一个圆盘型了。这样占地面积小，所需高造价工房比起国内最先进的油压机生产线还节省五分之四，工人远距离安全操作也有保证了。可那个十二对伞齿轮组成的三层圆盘，在转换时怎么精确倒位呢？

一连三个月，画出了上千张草图，都失败了。设计，好象突然进了死巷。不巧家中的三娃又病了。刘永江只好放下纸笔，抱上娃儿去看病。

他拿着处方来到取药处，目光一下落在装药的圆盘上。圆盘在飞旋，各式药瓶变成了浅棕色的雷管，三层药盘正是自动装药机的支撑盘和模具盘，而那只推药盘的手……

“自动操纵杆！操纵杆！”刘永江欣喜地大叫起来。女司药递过的药他没有拿，却兴奋地抓住了她的手。

他象发了疯似地嘻笑着，抱着病娃跑回家中。进了家，妻子才发现急需注射的青霉素还没有开封。当她回身想责怪粗心的丈夫时，刘永江早已不见踪影了……

一九七七年刘永江结识了五机部第六设计院的一位副所长、工程师朱玉琪。刘永江的才能和热情，使朱玉琪感到惊奇。他手上没有草图或草稿，向朱玉琪介绍他的装药机设计方案，竟能一口气讲三个晚上！当老朱向他索取主要零部件机械图时，他又连续三个晚上不睡觉，第四天早上交出四张图纸。

从这时起，朱玉琪就成了刘永江的忠实伙伴，为他苦难的

创造历程铺路搭桥，替他上下求援、四方呼号，在危难时刻给他鼓劲出力。

经朱玉琪的推荐和组织，在刘永江完成装药机全部图纸后不过三个月，就由技术部门对他的方案进行了两次技术审定。不出四个月，四川省化工局就决定拨款两万元和钢材四吨，进行样机试制。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机部在京组织专家又一次审定这个方案，结论是：这是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填补世界空白的先进方案。该部正式确定由部属泸州化工厂承担样机的试制任务。

### 祸福同降

一九七八年对于刘永江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他生涯中绵绵不断的两条主线，这一年里同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年十月，在二十八年劳动生活中他付出心血最多、寄与希望最大也是价值最高的一次创造——转盘式雷管自动装药机终告完成，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出生证——五机部肯定这项设计，并批准试制。

然而几乎同时，刘永江妻子儿女五口人，却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粮食供应。

妻子是农村户口，刘永江常年为自己不能分担家务，为妻子独力负起重担——既要工作又要领粮和种自留地而揪心。他心疼妻子，每个孩子又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儿。他觉得自己欠了他们很多债，他必须补偿。他不敢抱非分之想——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入城内；他只是想把他们从较远的第五生产队迁到离城较近的第一生产队，还都属于同一个大队。事先征得公社、大队和两个生产队的同意，从那边起出了户口，但到落户口的时

候出了麻烦：粮管所里一个人，硬是不许落；谁来说情也不行。再迁回五队，也办不到了。于是五口人从此便吊到了半空。

粮管所里那个人，就是化工厂人秘股长佐自成的“关系户”。三年了，佐股长还没有忘记刘永江的一箭之仇——不许他开车和向书记告他。但佐某人此举的意义，却远超出报私仇的范围。他立了非同小可的一功，替刘永江的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对手最终毁灭刘永江和他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持久的良机。

对于刘永江，这堪称致命的一击。因为当时宜宾县黑市粮价每斤八角以上。仅仅为五口“黑人”购回足以糊口的粮食，就必须用去他和爱人的全部工资。

## 第二章

### 逼他回头，他倒创出个奇迹

一项世界先进水平的机械设计完成了，并得到中央一级政府部门的承认，它的设计者的生活却坠落到全县居民的最低水平。刘永江每见心爱的孩子们不得不靠红薯稀饭度日，便心痛欲裂。这完全是一家之主他本人造成的！他是罪人！

刘永江急不可待地四处奔走，要求还给他一家五口人吃饭的权利。好心人也帮忙疏通过，却硬是过不了粮站小小管理员赵明松那一关。县委书记温巨成允诺他：“只要机器试制成功，你老婆孩子的‘农转非’不成问题！”

作为设计者，刘永江已完成了他的任务；机器试制是别人的事。况且，放弃开车的工作，就失去了到农村买价格稍低的粮食的机会，每天一元二角钱的出车补助也没了。总之，去

泸州，就等于失去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收入。但刘永江还是去了。他知道全家人会更苦，但是将来能使子女们有一个城市户口，作父亲的也算对得起他们了。他不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会食言。

到泸州一看，困难比他预想的要多：很多材料材质不合规；合乎要求的，有时又不够裁制；两个大部件，泸州根本造不了；人手也紧得很。

然而泸州化工厂的气氛不同。厂里上下都关注这套样机试制的进展，动员起全厂的技术力量。由于朱玉琪在成都四处奔走，兄弟厂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刘永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既指挥制造，又跑外加工，高难度的车、钳工活儿自己动手干，有时还自己去开车。他觉得出来，有很多人用赞赏和敬佩的眼光注视着他。

这时，宜宾县化工厂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对于刘永江和他的事业说来，意义不下于一起改变。

副书记张伯光接替了李吉成。张调进化工厂时，厂部曾让刘永江腾出他设在车库的试验场地，他没有立即从命，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张伯光在化肥厂当车间主任的时候，就以唯我独尊和专横独断著称，对触犯他的意志与尊严的事有很强的记忆力。加之，在他左右，那几位副厂长和正副股长向他描绘的刘永江肖像——目无领导，骄傲自大，自行其是，本已引起他的反感。刘永江正在从事的试制工作一旦成功，对他的权威就会是一个威胁了。

这时，厂里要选举人民代表了。开会讨论代表候选人时，张伯光指名技术员周开俊，群众则推举刘永江。张书记按捺不住了，索性公布了刘永江的几条劣行：欠公款太多，还有骄傲

自满什么的。工厂选举那天，张书记又大步上台，再三重复着他代表党指定的候选人周开俊的名字，然后规定：一不许做小动作，二不许交头接耳，三不许擅自离开会场。如果到了十二点票还没唱完，就让炊事员把饭送到会场来。

谁料得到呢？唱票才唱到九点半，刘永江已经独得九十六票，周开俊却只有六票，张书记那张胖胖的黑脸气得更黑了，大声宣布：“散会！”

刘永江被宜宾县人民选为县人大代表，后来又被选为人大常委；张伯光呢，提拔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周开俊当了厂长。

一九八〇年七月，刘永江回到宜宾化工厂，请求派两至三名技工协助他完成总装。

当时的县化工厂正在停产改建，许多工人都闲在家里。可张伯光的回答却斩钉截铁：“不行！一个也不能派！”

刘永江三次祈求，三次遭到拒绝，只好痛心地只身踏上归程。

家中已经快揭不开锅了，最小的孩子常偷偷到街上去要饭。老二和老三也被迫停学了。妻子和孩子送他上路，五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怨恨；却充满了期望。踏上长途汽车，刘永江咬紧牙关暗下决心：“一个人，也要把样机装出来。不然，对得起谁啊！”

可是，装一台样机，谈何容易？几十个复杂的机械结构，上万个零件，大的有一吨多重，要用行车吊装；小的不足一两，得象修手表一样精心。而一双眼睛要观测十二个工位的动作协调，还要指挥空中行车和地面操作……纵使一个技艺极高的人，做到这一切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更可怕的是那样一种感觉：明明你干一桩于国于民有利的

大好事，明明你做的事最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实现四化做贡献的号召，可是你所在单位的那个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竟然在关键时候撒手不管，阴笑着等待你的失败。

当样机总装明显地由于缺少帮手而出现各种重大挫折乃至险情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重压就达到令人心痛欲裂的程度了。一次，刘永江正指挥行车徐徐吊下上顶盘，突然发现下支撑盘还需清洗。他刚刚清洗完毕，忽听周围工人们齐声惊呼，急忙钻出来，一吨重的顶盘砰然落地，把眼前三厘米厚的钢板砸成两段！

迟离半秒钟，就会轧成肉泥！望着围拢过来的泸州化工厂的工人们，刘永江一下子哭起来……

刘永江吃在工作台旁，睡在零件堆里，腿上长了个碗大的疮，架起一条腿还在干活……七个月的时间，他的头上出现了点点白发，而这台二米多直径的复杂设备竟然组装完毕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国第一台，不，应该说是世界第一台圆盘式自动雷管装药机终于出世了——因为直到一九七六年，才有杂志报道日本已经试制成功了五台单机联机的自动线；而刘永江的发明创造，当属日本的第三代产品。

朱玉琪从成都赶到泸州。为准备专家鉴定，他亲自进行了模拟生产试验，结果表明，机器工作动作协调，产品外觀光洁无损，内部密实度合格。局部爆炸试验又表明，该机完全可以避免雷管生产中最可怕、也最令人苦恼的殉爆现象。

简直是奇迹，可这毕竟是事实。工人刘永江设计并一人组装的雷管自动装药机样机达到预想目的，一次调试获得基本成功！

## 也有这样的桂冠

刘永江并没有象一个凯旋的战士那样，意气风发地回到离别两年的县化工厂。

第一个打击就几乎是不堪承受的，虽然打击本身已不使他惊讶了：工厂公然食言，不再让他开车了。“你既是人才，就去生技股管设备吧！”张伯光脸上挂着两丝有嘲弄意味的笑。不管刘永江怎样陈述家中的困境，怎样许诺在开车的同时兼管设备，都无济于事。

张伯光怎么能把开车的金饭碗还给刘永江呢！干这行不光每月加班工资和补贴就有五十多元，每月跑几次乡场买必需品，还能省下三四十元开支。私下帮人运货捞的外快就没法算了。宜宾有多少家司机都置上了彩电。能便宜了刘永江吗？

开不成车，能把家属的户口落下来也好。泸州化工厂的同志们寄来一封公函，根据刘永江的业务水平和两年来试制样品中的出色贡献，建议宜宾县授予他工程师或技师的职称。有了职称，户口就能办成了。可是这个“便宜”，张伯光也不能给他。

张书记不是不知道，金沙江畔刘永江家那间年久失修的阴暗的小木屋里，红薯稀饭里米粒越来越少，八岁的男孩子上街讨饭已不止一年了。问题就在于刘永江构成了对于宜宾县化工厂内“党的领导”的威胁。他多次写信给上级机关和在县人大常委会上揭露张书记对工厂领导无方。他多次当众批评周厂长和吕副厂长，“剪领导干部的眉毛”。有刘永江在，宜宾县化工厂里他张伯光可怎么“坚持党的领导”呢？

他忘记了机械和人间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为了有效运转，

需要谐调和润滑。而刘永江向人间机器里扔进去的，却是沙粒！

## 自掘陷阱

作为政治家而出现的县人大常委刘永江，他的威胁所及，又比化工厂领导高了两级。

刘永江生就一副热心肠；他秉性刚直，从不曲意逢迎；他感情充沛，语锋锐利，讲话富感染力。这些素质，在正常条件下本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应具备的条件，绝不会伤害他自己。

然而八十年代的宜宾县，却不是适宜于这种政治家生存的环境。刘永江自觉重任在肩，必须按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自己的职责表达人民的意愿。这，同他的性格是一致的，却同他作为人的那个基本需要——解决一家人吃饭的权利问题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冲突。

刘永江当上人民代表后的第一个提案里，就把县委书记温巨成搞不正之风的一系列丑事给端出来了。在他慷慨陈词之时，有一个事实被他忘记了，那就是：他还得去找温书记，请他帮助自己解决家属的吃饭问题。

按规定，县委拟定的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任免名单都必须经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比如说，要任命合江县一个组织部一般干部到宜宾县当人事局长，别人明明不同意，却默不作声，只等着举手呢，他刘永江却来劲了，站起来就说：“宜宾县就没个人能当局长？这个宫××在当地是提不起来的。地委Z部长给县上G副书记批了个条子，点着名给的官。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局长！”几句话，至少树了三个对手，还得罪了同这三人有共同利害、共同观点和血缘关系的一大片人。

他是过于天真了。在机械的世界里，他几乎无往而不胜；一回到人间，热情和率真就处处碰壁。

历史进入了一九八二年，刘永江妻儿五口沦为“黑人”已是第四个年头，三中全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这个家庭。这一家人纵使光吃稀饭也揭不开锅了，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早已失学在家，八旬母亲又患重病卧床不起，无钱医疗。怎么办呢？

身为县人大常委的刘永江几乎踏平了公社、工业局、粮食局、公安局和县委至少两位书记的门坎。县人大常委六名正副主任先后多次为他奔波。他给县以上直至中央的党政机关写过几十封信，一概石沉大海，连个回条都没有。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张贴大字报？那已经属于非法手段了。击鼓鸣冤？现今是社会主义时代，不兴那个。衙门口没有鼓了，县太爷也不会升堂。找报社？这倒是击鼓时代所没有，并且是合法的。但是任何批评稿件都必须经上级党委审阅和被批评者本人过目，这不又转个弯子回到书记大人手心里了吗？温巨成和张伯光能同意发表吗？

左思右想，无计可施。这位发明家，竟创造不出一个表达他这位人大常委的“民意”的手段！写信不灵，谈话无效，那么用实物怎么样？孩子是他的，法律并未规定当父母无力抚养时孩子不许转让。好，就这么办。天真的刘永江决定以子为鼓，敲敲看，也许可以呼唤出一位青天升堂视事，解除他一家人的苦难。

三月十一日，刘永江领着一对饿得双眼深陷的娃娃来到地委门前，铺开一张地状：“我因搞科研，一家人落为黑人黑户已近五年，娃儿饿得实在可怜。有好心人愿买娃娃，可看孩议

价。”

刘永江大概以为娇儿的啼哭可以震惊和感动森严的地委大院，然后就会有负责同志来亲理自己的冤情了吧？

刘永江的举动不过使他差一点被以“无理取闹”为由送去“劳教”，他“取闹”的内容呢？在地委转了个圈圈，又回到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县委。而由于此举，他还犯下了双重的错误：既给人留下把柄，说他“臊了社会主义的脸皮”，又切切实实臊了中国共产党宜宾县委和县化工厂党委的脸皮！

## 活埋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声霹雳——刘永江接到一纸通知：省化工局决定：该（刘永江所设计和制造的）样机不予鉴定，直接封存，原设计方案予以注销。

这简直难以置信！近七年心血，六万余元国家资金，都要毁于一旦？可以改变国家化工生产面貌的样机，怎么看也不看，就凭一纸空文给活活扼杀了？

他把那张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不予鉴定”，“予以注销”，字字如铁。

他只觉眼前发黑，头嗡嗡作响，拉开门跌跌撞撞来到工厂资料室。

“我想看看我那些图纸。”他对资料员说。

库房门打开了，两麻袋图纸拿出来。刘永江把图纸倒在地上，一张张整理着。

这一百张白报纸画的是“土设计图”，纸是自己掏钱买的。哦，就是这张的右上角上，染着妻子的鲜血……那是一九七六年除夕夜里，妻子催他回家和孩子们团聚，他烦了，头也没

抬，推了她一下，不想她竟跌破了头，人事不省……

这三十张，是在成都五所画的那批吧？那次整整三个月没出工作室，吃饭是助手端来的，夜里就是趴在制图板上睡的觉……

这就是在北京得到专家们肯定的那四张了？对了，拿回来以后还给妻子和娃娃们看过，他们笑得好开心啊——虽然从那时候起，全家人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还有李书记给打着灯画的，朱所长、杨工、姚工他们帮着整的，泸州化工厂的工人们给出了主意的……

图纸上，又浮现出一双双期望的眼睛，接着，眼睛里滴出了泪，又滴出了血……

刘永江再也忍受不住了。他直起身，把一张又一张图纸撕得粉碎，然后，趴在小山似的碎纸堆上大哭起来……

有哭的，就有笑的。宜宾县化工厂的主要领导们早就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刘永江的那个鬼方案成功，他们手中强有力的武器是：党的一级组织代表人物的身份以及用属于人民币买来的成箱的五粮液和各种土特产。周开俊就多次在会上公然说过：“刘永江那个方案，我跟上面说了，根本就不配鉴定！”张伯光也曾斩钉截铁地断言：“刘永江的方案不可能成功，也不能让它成功！”

由于刘永江多方申诉和《工人日报》记者范玉章的干预，省化工局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又匆匆撤销了“注销”，决定立即召开一次样机鉴定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鉴定呢？我们看看刘永江写给朱玉琪的信就明白了。

“朱哥，你好！”

我早知道你对我的方案的关怀要白费心血。一言难尽。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主管设计单位来开鉴定会？因为知道你会主持正义，你最熟悉而且支持我的方案。不出所料，部派的东北474科研所的C和Z，极力反对我的方案。会前，对样机还没看上一眼，他们就找我谈话，说我的样机肯定不能成功，因为‘殉爆’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一位说他搞了十几年，花了国家一百多万元钱，终告失败。他们在会上再三说：‘我们多次去过美国，西德，日本，瑞典等国考察，他们搞自动线都没有成功，国内多少实力雄厚的厂子搞了十多年也失败了。’还说我国人多，你搞自动线，多余下来的劳力怎么办？××所的W工程师私下对我说：他们二人搞的转盘自动线我见过，比你的差远了。他们是专家，你是个穷工人，通过了你的，他们的脸往哪儿放？

从种种迹象看，他们是奉个别领导人之命，鉴定前已决定扼杀我的样机。他们害我事小；他们犯了害我们国家的大罪呀！就算我国人口多，就不怕出事故死人吗？外国人登不上的高峰，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上不去吗？……

早就想给你写信了，只因样机死了，我手好似被千斤闸所轧，心如刀割，一直难以提笔，勿此。

永江”

绝不能低估宜宾化工厂领导人所起的作用。鉴定之前，厂长周开俊和吕龙彬亲眼见到样机的殉爆试验很成功，证明它安全

可靠。但在鉴定会上，他们却一言不发。还在到会人员中极力诋毁刘永江本人，说“这人浑蛋得很！”“他纯粹是异想天开！”

这里，已经透露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不但要否定样机，还要把刘永江本人置于死地！

### 第三章

#### 逼上“梁山”……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刘永江到重庆出差。从这里，他踏上了驶往广州的火车。

他是自费进行这段旅行的，目的是到深圳去找兵器部一位帮助过自己的精通非标准设备设计的姚工程师，研究样机从机械传动改为液压传动的方案。

那次鉴定会后，刘永江左思右想，对自己那台样机的最后成功更有把握了。工厂和县上越是把他三千九百个日夜的辛苦劳顿说得一钱不值，越是对他继续革新百般压制，他越是想尽快搞出完善的改进方案，争得有关各方支持，使自己的创造变成国家的财富。在重庆，他得到一位曾参加鉴定会的工程师的鼓励，这种心情更迫切了。

从广州搭便车来到深圳，刘永江找到姚工程师的单位，才得知姚工还在北京，没有到任。

这下子刘永江可发愁了：身上的钱没几个了，此地连话也听不大懂。怎么办呢？正在踌躇之间，一位当地青年走过来。先是兜售电子表，后来就和刘永江攀谈起来。听刘永江谈完自己的遭遇，这位青年笑了，用手指着南边说：“这好办，到那边

去就是了。这边中央的政策好是好，可到了底下贪官污吏那么多，根本行不通。过去以后，凭你的技术，保险英雄有用武之地，能拿一大笔钱，你那个什么机也搞出来了。”

说完，还告诉刘永江：“从福田公社那边就好过去。”

素不相识的青年走了，刘永江兀自站在原地发呆。几年来的辛酸苦痛一起翻上心头。天上的乌云太厚了，呼天喊地都不灵。这娃娃说的倒也是条路呢！

刘永江仔细分析了当前的处境：虽说自己还在咬着牙干，可从上到下阻力那么大，在厂里连出趟差都受限制，样机成功的前景也确实太渺茫了。而且妻子娃儿变成黑人黑户已经五年多了，外债欠了两千多元，粮食欠了两三千斤，现在解决户口还是遥遥无期，再拖上几年，怎么得了！

他早从报上看到许多知识分子报国无门被迫出走的报道，当时只觉那些单位领导可气，这些知识分子可怜，可从没想到自己要走这条路。此时此刻，他突然觉得走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追求那里的花花世界，不是贪图荣华富贵。是活着到另一个世界去完成自己的夙愿，是对不公正的命运的一种抗争。否则，方案搞不出来，死也不能瞑目啊！

怕那边的人听不懂他的四川话，当天夜里，借着街区路灯的灯光，刘永江写了一封信。在谈了自己的遭遇之后，又写道：

“我一气之下，流着眼泪，悄悄下了狠心，抛去八旬老母，离去妻子，丢下了四个不能自食其立(力)的孩子。叔叔、兄弟们呀：我离开他们我是有罪的，我有苦难言，一言难尽。一想到离开他们，我不知吊

(掉)了多少辛酸泪呀!我想去香港,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我的科研项目能够实现……”

翌晨,刘永江,这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机械工人,这个几十年来连做梦都在想着用自己的技术为人民造福的革新能手,吞下辛酸的眼泪,被迫踏上了通往边境的路。

最初,那脚步是迅速的,怕自己犹豫,怕自己后退,他跨过四下无人的警戒线,头也不回。再向前行,十米,二十米,一百米,二百米,离界河只有一百来米时,刘永江的脚步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了。

仿佛有一个悲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真的走了,抛弃我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吗?……”这声音开始是尖细的,夹杂着孩子的稚嫩的声音。后来,又变得浑厚低沉了;象是八旬老母的声音。不,不,这是祖国母亲的声音!声音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刘永江只觉一阵震颤掠过全身,刹那间泪如雨下……

距边境线只有十几米时,刘永江再也走不动了。他停下脚步,注视着身后的茫茫大地。只要踱过前面那条十米多宽的界河,他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可他突然想到:自己的血肉之躯、聪明才智,不都是属于这片土地、这个世界的吗?自己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搞出雷管生产自动线为国效力吗?当然,他已经付出了七年心血,只是由于某些当权者的压制破坏,才使几近成功的创造发明功亏一篑。可这些当权者能代表党、代表祖国和人民吗?“难道因为他们歧视我、诬蔑我、打击我,我就逃到另一个世界去,证明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吗?不,不能这样做。”

刘永江毅然转身,向祖国的怀抱走去。在远离边境三百米

之后，一位边防军战士发现了他……

### 生命诚可贵……

刘永江是以一种非常坦然的心情回到宜宾的。他几乎犯了错误，走上歧途，可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在广州收容站，杨站长把家中寄来的路费递给他，亲切地说：“你自己回去吧，我们信任你。祝你那项革新能成功！”

站在拥挤的火车过道上，他又开始构思样机液压传动方案了……

他还不知道：在宜宾县和化工厂，正有一些人欣喜若狂，等待“投敌叛国分子”刘永江的归来。几年来精心策划或即兴采取的一步行动，不就是为了有那么一天，把这个性子暴躁的小子逼得干出些什么事来，好用一根大棒把他打翻在地吗？

“刘永江投敌叛国，犯了大罪！”“刘永江是反革命！”各种会议上，厂头们把一顶顶可怕的帽子抛过来。七级技工刘永江被调去打铁了。出差完全禁止，革新绝对不行。还有两个厂里保卫人员气势汹汹地冲到他家，收走了全部绘图工具，甚至连根铅笔也不留。——虽说这小子在中国是白吃饭的无能之辈，可画了图纸卖给外国人怎么办？

不久，工厂又向县委打报告，请求将刘永江定为反革命，开除出厂，免去其县人大常委职务。

消息传来，刘永江陷入绝望之中。在张伯光之流面前，他绝不认为自己有罪。比起这些整天只知道以党的名义败坏党的声誉的人，自己要高尚得多呢！可是，面对妻子、孩子和八旬老母呢？这几年来，自己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还少吗？

他看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最小的刘伟已经从五岁的“小

黑人”长到十一了。如今四川许多工人农民家的孩子连猪肉都吃厌了，这些娃娃们却只能靠稀饭、泡菜和辣子，半饥半饱地过了整整六年。那脸色好黄啊！老二和老三，一个十五，一个才十三，已经失学六年了……

再瞧瞧大女儿刘英，长成十八的大姑娘了。在学校还是优等生呢，可如今既没个工作，也不能务农。身上穿的衣裳是同学给的，中间那个纽扣掉了还一直没钱去买呢……

卧病在床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她为抚养自己花了多少心血呀。如今唯一能孝敬老人家的，就是她那碗里有时比妻儿们多几块猪肉皮——那是从不吃肉皮的人家要来的，天蓉给炖得烂烂的收起来，一回给老人盛上一勺……

还有妻子，这个来自云南农村的苦命孤儿，二十几年来跟着自己本来就少受罪。这些年，她又是怎么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啊，不到四十的人看上去都有些象老婆婆了……

妻儿和老母苦熬苦撑苦等，难道就为的是今天来当反革命家属不成？自己要真的被开除出厂，还有什么脸面生活在这个家里呢？

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责备，可刘永江却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是有罪的。

一个晚上，他悄悄用小刀割断了自己的动脉，可很快被李天蓉发现，及时抢救了。后来他又买回一瓶安眠药，还是没有躲过妻子的眼睛。

最后，望着绝望的丈夫，妻子泪水涟涟地说：“要死，咱们一起死吧，可别丢下我！”

十二月的一个夜晚，月黑云低，风声阵阵。刘永江和妻子悄悄掩上家门，来到金沙江畔。

浩渺的金沙江，万里长江的上游。倘在丽日晴空之下，灰蒙蒙的江水衬出远处碧绿的群山，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江边长大的刘永江，从小听了许多关于金沙江的美好传说。他的名字永江，即取自永远与江水为伴之意。想不到如今只有四十三岁，报国壮志未酬，就要在一个漆黑的夜，在这条江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刘永江默默地望了望李天蓉，贤慧的妻子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挽住丈夫的胳膊。这对患难夫妇一步步跨进江水，向江心走去。

冰冷刺骨的江水没过了胸部，近处的江涛卷起一个又一个旋涡，刘永江和他的妻子，很快就要与这个世界诀别了，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彷徨……

突然，岸边传来儿女撕心裂肺般的号啕大哭，传来老母凄厉的呼唤。几个过路的街坊不顾一切地涉入水中，不由分说地把这对走向死亡的夫妻拉回阳世。

回到家中那幢小木屋里，浑身湿透了的刘永江和妻子搂住母亲和孩子们，全家失声痛哭起来……

### 挣扎，该不会是更沉重的失望？

由于宜宾县委一些正派干部的坚持，县化工厂的报告未获批转。但刘永江在工厂因“无故旷工”而受到记过处分，继续在锻工车间抡大锤。他妻子李天蓉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了。

刘永江在一天辛劳之余，还在苦苦研究自己的方案，并制成了第二代样机草图。此外，他还在做另一件事：不断地给上级有关部门、给报社、给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给中央和省的各级领导人写信，为自己的样机和一家人的悲惨命运呼吁

……那些信开始是很详尽的，后来就越来越简明了，有时只有七八行：

“上级啊，我忘命搞成世界先进方案，可县里和工厂的脏官不但不让我革新，还打击我，迫害我，害得我一家五口黑人黑户快六年了。上级啊，你快派人来救救我吧。”

一九八三年本应是刘永江获得希望的一年。还在《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的元旦社论中，他就惊喜地发现：一股改革的洪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激荡。我们的党，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了。

“这几个月我的上诉信大概有近千封了，不知党能不能看到？哪怕他们能看到一封呢，上级领导准会派人下来，我的冤就能伸了。”站在邮局的报栏前，刘永江充满希望地想。

几天以后，他的疑问就得到了回答。某上级信访部门寄来一份公函，上面写着：

“刘永江同志：你写给×××、×××、×××等单位的信均已转至我办，并由我办转至宜宾地区信访办公室。特告。”

读着这封盖有庄严的公章的函件，刘永江的心凉了。地区信访办？不就是自己上访多次，后来都把材料转给县委的那个部门吗？这么说，那些信上级领导一封也没有看到？这可是忍着饥，和着泪，一夜夜写出来的呀！家里连酱油也打不起，可每次寄这些信却大大方方贴上那么多邮票，每一封，包含着多少期望啊！谁想到它们坐着火车和飞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在失望中，刘永江又想起儿时的一桩往事：一次，大哥无

辜欺负了他，又先到父母那儿告状，父母不容辩解就要打他。后来小永江气极了，骂了父母一通。父母这才问明情况，批评了大哥。

“上级是好人，只不过管不过来；”他对妻子和女儿说，“坏就坏在这些小人总是呼风唤雨欺骗上级。我可以来个激将法，狠狠打他一下，他总得回过头来问我为什么，我把话讲清，我的方案就能献给国家了！”

妻女一听，坚决反对这种“激将法”。可刘永江却再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了。他怀着最后的希望，在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一封信上故意写了几句对党很不恭敬的话，然后堂堂正正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单位……

一封后来在宜宾县掀起轩然大波、并成为刘永江身陷囹圄直接原因的“反动信”，就这样寄出了。刘永江在邮筒前站立许久，才缓缓朝家中走去。他并不怕信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最坏后果，只是感到心中刀绞似地疼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刘永江，一个明明最炽热地爱着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县人民代表，竟只能用这种最违心的方法来向党呼喊？

回到家里，这个从未做过诗的人伏在桌前，流着泪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

祖国母亲你睁眼，  
谁是忠来谁是奸！  
小儿骂母非心愿，  
谄媚之徒毁江山。  
手掌手背母的肉，

爱一恨一母心偏。

但望慈母有明鉴，

包拯为民好除奸。

.....

这个事实应该能丈量出我们祖国不断前进的脚步吧：一个月后，当刘永江那封若在七年前甚至可能处以极刑的信件转到宜宾地委时，已经了解其遭遇的地委书记冯振武这样表态：“此事要考虑前因后果，不能定反革命性质。对刘永江的革新要支持，他家五口人的户口问题要马上解决。”冯振武同志还布置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宜宾县和化工厂领导解决刘永江的实际问题，支持他的革新创造。

宜宾县公安局于4月8日奉命对这一事件立案侦查，事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事件“性质是严重的，但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因此，不以反革命罪论处，也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教育或纪律处分。”公安局还在红头文件上郑重建议：“刘在原基础上又设计了第二套(装药机)方案图纸。现在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研制，请有关部门研究决定。”

宜宾的春天，金沙江上的阵阵暖风是多么润人心田啊。刘永江痛心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又怀着新的希望等待县委按地委指示为自己解决问题。至少，一家五口失去近六年的公民权该马上恢复了吧？

## 坠入虎口

这又是一个判断错误。要知道，世上尚有敷衍塞责这种应

付上级指示的最好办法。而且，有些人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作为县人大常委和工人革新家的刘永江仍旧安然地存在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他们也在等待。等待一个良机。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五点，一个重要的县委常委正在召开时，刘永江出现在会议室门前，那神情是恳切的：

“温书记，我要请示个问题。”

“什么问题？”一声阴冷的回答。

“户口问题。”

“又是户口！户口！你没见我在开会吗？”声音变得恶狠狠了，手也挥舞起来。

刘永江着急了，今天好不容易是厂礼拜，得不到个准信儿回去咋向娃儿交待呀！“温书记呀，我家黑人黑户整六年，现在硬是揭不开锅了。这可是县委造成的，现在你们又推三推四……”

话还未完，只听一声怒吼：“把他推下楼去！”两个人走过来把刘永江往外拉。

刘永江怒火中烧了：“温书记，你有权可以把小舅子从街办厂调到国营厂，可以给那么多人办非法农转非，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大套家具，你们当官的捞饱了，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吗？”走下楼梯了，他又回身骂道，“你们真和国民党一个样！”

心事重重的刘永江恐怕没有觉察到今天常委会的特殊气氛吧？就在他到来之前，温巨成刚刚严肃地宣布了会议主题：传达中央关于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

在这个节骨眼上撞上门来，不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吗？会

议的议题转为研究刘永江的“罪行”了。温巨成站起来，威严的目光扫视全体委员：

“刘永江给省委杨书记的信可是反动透顶！大家看，现在该怎么办？”

……

两小时以后，刘永江被收容审查，罪名是“扰乱办公秩序”；而在二十五天以后，刘永江的县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身份才被罢免。

按宪法规定，人大代表是享有司法豁免权的。法律被严重地践踏了。不过，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温巨成已经定了调子：“刘永江是反革命”，好戏还在后头呢！三天后，这个收审人员又被破例转到公安局看守所同将判处死刑的犯人关在一起。

可以想象，刘永江入狱以后，宜宾县和县化工厂的某些要人度过了多少个兴奋而又紧张的日日夜夜。要知道，这是收获几年来辛勤劳动的果实的时候呀。为了使这个“反革命”成为法律意义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把他从收容站转移到看守所，当然是重要的一步。这首先是领导意志的一种暗示：刘永江的罪过已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他的命运接近于死囚了！仅此一着，对一个人的精神就可能是摧毁性的一击。何况，与外界的彻底隔离，又便于放心大胆地施加各种人身凌辱与肉体折磨呢！

由于放心，也就坦率。比如那天刚吃过午饭，王所长带几个干警来了。那顿饭多出了三两粮食，刘永江照例让给同监年轻的犯人吃了。王所长却偏要追究肚子最瘪的这个人的责任，令刘永江跪在水注中，一顿乱棒抽打，边打边说：“别以为你是人大常委！老子就是专门治你这个人大的！”

刘永江并没有以人大常委身份伤害过王所长一根毫毛。这股子仇恨从哪里来的呢？

在看守所以外，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就含蓄得多了。张伯光身为共产党的一级书记，他迫不及待地命令停发刘永江的工资，自然只能是出于对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不是人大常委的阶级仇恨。至于这会使一家六口人陷入绝境，那不正好促使他们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吗？

县委书记温巨成的阶级感情，表现为对刘案定性不至偏轻的频频关注。公安局认为案情已经查清，书记却坚持“要重新详细调查”：刘永江“文革”期间有什么问题？他的家庭成份是不是资本家兼地主？他告了那么多“黑状”，还构不成诬陷罪吗？

无奈宜宾县也讲究点法制了，尽管无限延长收审期是非法的，但定罪毕竟得有事实为据，因而几十人查了半年，最终也只能给刘永江定个“越境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然而这个“越境罪”也是属于“欲加之罪”之列的。因为按我国刑法一百七十六条，刘永江在深圳的行动并构不成犯罪。温书记对这个方案也不满意，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判两年？太轻了吧？这就没意思了……”他觉得不过瘾。

于是，书记便干脆亲自部署，成立一个新的专案组。一九八四年五月，提出了符合温书记意旨的处理意见：撤销一九八三年公安局对刘永江不以反革命罪论处的决定；对刘永江以反革命罪从严论处。

温巨成只顾对“反革命分子”刘永江表达他炽烈的革命感情，竟没有想到宜宾县人民的舆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刘永江一度企图越境的行为反动呢？还是那些迫使他铤而走险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反动呢？如果刘永江在哭告无门、悲愤之

余写下那封既无反革命目的、又无反革命效果的信属于反革命罪行的话，那么使刘永江八年革新成果毁于一旦、剥夺一家老小正常生活权利长达六年和违宪长期监禁一位人大常委并施以残酷折磨等等造成严重危害社会恶果的行为，又属于什么性质呢？

现行法律只有教唆犯罪而无逼迫犯罪的条文。然而党纪和道义却有权把这个问题提到温巨成面前。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间，宜宾县有三百八十三人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四百一十五人从农业户口转为经济作物区户口。其中不那么符合政策规定的和温巨成批了条子的，不在少数。可见，政策也是可以变通，有一定灵活性的。那么，象刘永江这样有突出的才能与贡献和特殊困难，并且不止一次得到过县委书记许诺的人，宜宾县内难道会很多吗？如果说那三百八十三人中间不合政策规定的人都比刘永江更优秀、更困难，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温书记作出回答：当一九八三年县公安局和信访办以及区、乡、队和派出所都一致同意把刘永江一家从农业户口转为经济作物区户口的时候，为什么唯独您一个反对呢？

显然，刘永江的自动装药生产线等等技术革新成果本身同温巨成和张伯光的利益是不会发生什么冲突的。那么问题的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是刘永江作为人大常委进行的、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职责的活动，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造成了对他们的政治上的威胁。也只有这个答案，才能解释县看守所王所长手持皮鞭痛打刘永江时发出的狂叫。

温巨成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严峻地摆到他面前，正如一九七六年金坪区区委书记温巨成狂热地“象发

展土改积极分子入党一样”发展造反派入党时，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四人帮”就会垮台一样。

### 对真正罪犯的旁证

刘永江也获得了一个机会，在最严酷的条件下检验他对祖国的忠贞之情。

几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犯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刘永江一案却迟迟不结，与家中不通信息，重病缠身也不准治疗。这一切更是对人大常委的特殊待遇。

刘永江是用斗争，回答权力者的无情迫害的。请看他在狱中写的申诉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你们羁押我这样久，远远超出法定时限。你们这是目无法纪，你们有罪！在此期间，罪行很重的人犯，你们都一批批放出去了，却独独不放我，这是由于你们怕我出狱后会揭发你们的非法行为！我确实忍无可忍了。你们稍有一点人性、党性，应无脸见人。我早就写信告诉温巨成，我刘永江为四化是舍得一身剐的人。我不怕你们把我整死，但你们这些上欺中央、鱼肉百姓、误国误民的罪人，迟早是要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的！我要正告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们，你们敢见阳光吗？你们有种，就将我的报告转到地、省和中央去！”

主要的精力，刘永江用于思考革新方案。多亏了那个高信息储量的脑子，研究只能用少量的小纸片暗中进行，他整夜整

夜睁着双眼苦苦思索，一年以后不仅和雷管装药机相联接的纸管机和电子量药器已经成竹在胸，他还为看守所设计了三道庭院式大门和一台节能灶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狱后的刘永江陪同刘永江问题调查组来到泸州化工厂。调查组的同志是想见识一下自动装药生产线的样机，让刘永江给表演一下，看看它的性能到底怎样。

他们见到的，是一片空白。那套机器早已被当作废钢回了炉，变成另一些机器的躯体了。

本来，在那次样机鉴定会上，决定由宜宾县化工厂拉回样机，保存起来。泸州化工厂不知催促过多少回，宜宾硬是不理。为腾出车间场地，只好作废铁处理了。

“这是一次残酷的谋杀，而且非常彻底……”刘永江呆呆地伫立良久，使劲儿忍住泪水，不让它流出来……

不久，调查组就依据细密调查的结果，向县委提出了建议：鉴于刘永江同志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活动，卓有成绩，应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应尽快为他评定相应的技术职称；并按照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关于“对刘永江这样有发明创造的工人，一定要特别关心、爱护和支持”的指示，将刘的家属五口人的户口按特殊情况准予农转非；补齐收审期间的原工资；并按有关规定补调去年普调的一级工资。

据悉，本文发表后，刘永江在宜宾县仍难以容身，被迫到自贡电瓷厂作，不久又做出重大技术革新。宜宾县过去支持和帮助过刘永江的干部，一一遭到打击报复。县委书记温巨成，却非但未受到党纪国法的任何判裁，反倒荣升为地委级领导干部了。

1986年7月20日

（这篇文章是我和胡舒立合写的——作者）

# 关东奇人传

——一个既非庸人、又不是野心家的中国人的遭遇

## 第一章 此路不通

我到佳木斯市的前一天，一个消息传开了：“傅贵那小子，又给抓起来了！”

傅贵，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已经两次成为黑龙江省闻名的人物。七年前，他是佳木斯市郊区“党内资产阶级”里的头号人物，“贪污盗窃集团”的主犯，犯下了除“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外的几乎一切罪行。总之，是一个恶人，一个罪犯。后来，忽然又成了全省瞩目的好人，他把市郊一个最穷的大队变成了富队。省、市报纸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他的事迹。

这是真的吗？编写导演过前一个剧本的人，不相信后一件事的真实性。这也难怪。因为傅贵会捞钱，是他当年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原因。他现在不还是会捞钱吗？他把生产大队整富了，这也许是事实。可是，不是听说他自己也富了，都富得浑身冒油了吗？谁知道他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人家的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傅贵在犯了反对社会

主义的大罪，坐了三年半大牢以后，放是放出来了，可并没有平反呀。他的判决书上明明写着他犯下了贪污罪嘛。

在佳木斯郊区沿江公社黑通大队，我找到了并未被捕的傅贵。原来他还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近十五年则逐渐引起争议。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会议上，他多次成为争议的中心，争议之剧烈，有时竟达到使拳动脚、不可开交的程度。然后，又成了很多大字报、控告信和判决书上的中心人物。最后，连全省的大会和全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上，他的名字也作为一种敌对倾向和敌对势力的代表被举了出来。

这样的人物，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不值得研究一下吗？

一研究，我就不能不同情那些对傅贵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了。人家也是不无道理呀。道理在哪里呢？一句话：傅贵这个人太特殊了。

这个坐在我面前，满脸大胡楂子的人，除了在各种他念不出来的单据、拘留证、逮捕证上签写自己的姓名以外，没再写过第三个字。文盲由于是土匪和军阀而出名的人，在中国有不少。但傅贵可不是马占山或张作霖呀。

即使为了理解他为什么招来那么多人的猜疑和反对，咱们也得翻一翻他的历史。

### 从小就想发财

他是在三江平原上长大的。那时候，这地方还挺空旷，但是，被诗人多次歌颂过的那广阔的田野，却是专门给小傅贵放猪放马的，是让他磨练他的脚板的（到十岁，他夏天才穿上第一双鞋），是让他在大雷雨或大风雪中锻炼自己胆量的。

他是个父母双全的孤儿。父亲是个忠厚善良胆子很小的农民，又从小摔坏了一只脚，养家糊口就难了。六岁上，母亲就不得不把他和妹妹带走，寄居到亲戚家里。后来，母亲又被逼改嫁。寄人篱下的生活，没能使这个孩子学会忍受和顺从，倒使他的自尊心比常人更敏感了。每当盛一碗饭的时候，他都觉察到有人用冷冷的眼光盯住他的手。他受不了这个，八岁上就去给人扛活，独立谋生了。

放猪，牧马，给东家抱柴和生火，这就是他的小学。在这个小学里，他学到的第一课是：一个人不要依赖别人，要独立自主；人要“有脸”，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瞧不起。不管什么活，都要干好。不管怎么饿，不偷别人一穗苞米、一个土豆。第二课就是要发财。今天我给你扛活，为什么明天我就不能支使你给我扛活呢？为了“发财”，人就要有胆量，有能耐。

也怪，傅贵的亲戚多，连他爹在内，没有一个有能耐、有志气的。那些人聚在一起唠的都是什么抽大烟啦，赌钱啦的事。他们羡慕财主的生活，可是，对于过穷日子也能乐天知命。没有一个人指点过傅贵，告诉他人生在世要向上，要争气。好象人生的常规就是混日子，一边混，一边盼老天开眼，什么时候发个洋财。

他听说，一百多年前，老傅家就从山东济南迁来了。算来他傅贵是第五代。那时候还兴跑马占荒呢。四十垧（每垧合十五亩田）地为一方，好大一片呀。可他的爷爷的爷爷为什么没去斩草开荒，却给富锦县一个什么段五爷家做饭去了呢？就因为没胆量，没能耐呗。爷爷为什么在放木排的时候淹死在水里？爹为什么养不活母亲和他兄妹俩？母亲为什么叫老爷卖给另一家？都因为穷，因为没能耐，没志气，没有钱。所以人要好，

就得发财。小傅贵和一起放猪的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儿去。不管玩什么，总是他赢，还不费一点力气。这多没意思！还不如一个人在地上和江里追逐各种小动物，或者琢磨各种草呀树的有趣呢。静卧草香之中，仰望蓝天胡思乱想也挺好玩。

十岁那年，有一天远处铁桥上出现了一个大怪物，叫他吃了一惊。那是一列火车。好家伙！那东西个头儿真大呀，突突突，好大的力气，喷着白汽，冒着黑烟，真威风呀，拉着那么长一串从铁桥上开过去了。这东西比牛车马车得厉害多少倍！

“等我长大，发了财，非买个这玩意儿不可！”小傅贵盯着越走越小的火车尾巴，暗暗下了决心。朝思暮想，上了火，还得了一场病。一块儿放猪的赵小二比他大两岁，给他解释说：“那火车是日本人的。一个人买不起。你看谁家有养那玩意儿的？再说，人家不吃草，吃的是煤，你上哪儿讨换那老些煤呢？”傅贵这才醒过来，可是心却拽不回来了，买不起真火车，就用黄泥捏小火车玩，做梦也梦的是火车。

就象猪是他的工作对象，又是他的伙伴和玩具一样，他迷上火车，也不是为了挣钱。他觉得那东西好玩；他喜欢火车头的那股冲劲。突，突，突，好大的气力呀！

傅贵喜欢强大。他自己也要作一个强大的人；别人做不到的，他要能做到！

谁也不来管他。他没鞋穿，没被子盖，没人管。喂马的时候，叫小马咬了一口，腮帮子都咬透了，流着脓，他也不敢歇工。一九四五年在荒野里遇上那场龙卷风要是把他刮走了，他也就没了。可是，失去父母的抚爱，也就没有家长的管束了。上不起学，又少了个师道尊严那个权威。没有人教给他或逼迫他必须想什么，不许想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干完东

家的活儿，就什么事都由他自己决定，自己安排和自己动手了。

他有用不完的时间胡思乱想。广阔的原野不仅仅是他的运动场。别的孩子在课堂上学习识字的时候，小傅贵在天地之间上自然课，他躺在蓝天白云下，学会了幻想。他练就了一双又勤又巧又有力气的手。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一门主课：爱这个地球；独立地寻思大地上各种有趣的秘密。

### 一心耍单干

土地改革那年，傅贵和他爹分了三垧地，半匹马。不幸那半匹马又被另一匹马给踢死了。这就得和人家“插犂换工”了。一个半人工换一个马工。那年他才十五岁，已经是个整劳力了。套三匹马拉一天犁，他就得给人家铲四天半地。就这样，那三垧地还不够他一个人种的。他赶大车出去拉脚；他去鹤岗买煤卖煤；他还会盖房子。别看他没学过算术，不认识阿拉伯字，盖三间土房用多少工，多少土坯，房上得苫多少草，他说得一清二楚。包给他干，一个钱不带赔的。

每年十月一号，把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上边就该下民工伐木的任务了。那时还没有专职的伐木工人，要各村出人出马上山伐木运木。那工作又苦又险，哪年都有死人丧马的事，谁都不愿意去。独有傅贵，年年自动报名上山，他还年年都囫圇着回来，赚一把票子，又不误第二年的备耕。一去就是一冬，第二年正月十五才回来。这就把每年冬季农村扫盲这个机会错过了，他也就当了一辈子文盲。

可是就这样出大力，离发财还是很远。二十岁娶亲的时候，他手里只有七十元钱，只能给新媳妇买一套被褥，箱子还是从

舅舅那借来的。小两口结婚以后，媳妇还得烙个煎饼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村里开始成立互助组了，傅贵不参加。后来又成立初级合作社了，榜上也没有他的姓名。那时候，城里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成名成家思想搞臭，农村里就批农民“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思想，单干自然很不吃香。傅贵对这些批判无动于衷。他不明白，为什么非急急忙忙“归大堆儿”不可呢？人和人很不一样呀。他浑身是使不完的劲儿，他不怕吃苦，他脑瓜好使。有人就正相反，恨不得成天躺在热炕头上不动弹，有一碗高粱米饭就心满意足了。把勤的，懒的，灵的，呆的都捏到一块儿，能好得了吗？……他担心有人要吃亏，有人要占便宜；懒的会更懒，勤快的吃了亏，也会学懒……

你说他不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吧，不管村里开什么大会，还都少不了他们小两口儿。来得早，走得晚。傅贵还很关心村里的事，常去找村长兼农会主席田志清唠扯唠扯。找他给村里办事，不管什么任务，他都没二话，还完成得挺好。所以田村长就成了第一个在傅贵身上看出点门道的人。他说：“北屯傅贵那小子，将来能干点事情。他脑袋里有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呢？这田志清大概比后来的阶级斗争专家高明，他没有因为傅贵一心单干就把他看扁。村里有个农民，外号“杨大先生”，时常扛个铁锹在村里走来走去，见路上哪个坑儿，或雨后留下的车辙，就铲两锹土填填平。桥上有个洞，他就回家拿自己的木头来修一修。天早了，他还小树下挖个坑儿，浇两桶水。有人笑话他傻，有人说他迷信。傅贵可不，他崇敬杨大先生。这个人的形象，几十年也没有从傅贵心中消失。

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他仍然一心想发财。

## 不算投机，也是倒把

1955年那年大白菜丰收。傅贵和一个姓尹的、一个姓孙的合伙，以他为主，把全屯的白菜都“兑”过来了。这就是说，他们在人家菜地里走一趟，查查白菜棵数，估估斤数，然后定个价钱，包了下来，但并不付现款，要等卖完白菜再结帐。生意谈妥了，可是傅贵还没有马呢，怎么办？买马，没钱。听说一个名叫郭守先的要卖马，他去赊买，说好以二百七十元买他那匹青骡马，等卖完白菜再付钱。好，马是有了。车呢？手里还有一百元钱，买了个车。一匹马不够，又把母亲家一匹耳马子借了来。行，齐了。

他媳妇白天下地，把一棵棵白菜的衰帮烂叶掰掉，弄得白白净净的。晚上十二点，傅贵起来喂马，两点钟套车。然后就咕噜咕噜朝佳木斯市进发了。一路上不知要打多少哈欠。四点钟前后，天还没放亮呢，到了。把马一卸，就来买主了。也是二道贩子，讨价还价，谈妥了，给人把菜送去，卸下，哥儿仨再到馆子吃饭。跑一趟，拉两千多斤菜。跑了多少趟，白菜钱也都还给农户了，傅贵心想，再跑下这最后一趟，那匹青骡马就是他的了。那天，菜卖完了，傅贵把身上的钱和新赚的钱放在一起点一点，净赚二百三四十元。傅贵把钱揣到怀里。喂完马，几个人又去吃饭。在饭桌前坐下来，傅贵伸手往怀里一摸，愣住了。那只手老半天没收回来。钱咋没了呢？一时脸煞白，浑身冒冷汗。姓尹的姓孙的看着奇怪，忙问他怎么了？这时，傅贵心虽乱，志不迷，想起家里的媳妇。这二百多块钱是他们小两口儿半冬的血汗钱呀！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于是把心一横，便说：“我今天来了病，肚子疼。”也象，脸不是煞白吗？那两

个人忙叫堂倌烫酒，还得烫热点。不一会儿，酒壶送上来了。那两位连说：“快点 搁 下去！”傅贵多咱喝过酒呀？到这节骨眼上，不搁也不行，只好灌下去了。菜端上来，傅贵的心情也变了，心想：去他妈的！丢点钱还怕赚不回来？比人死强多了。这么一想，心里就轻快多了，就象是他发了善心，解开缰绳，把那匹青骡马给放到大草原上去了。从此，那卷票子就在他心头勾销了。

可是人家青骡马的主人还在家等着他交钱呢。傅贵只好去求情：“再容我两个月行不行？来年春节一过，我就还钱。”不行，脸子还很难看。没法儿，也得忍着。好说歹说，勉强应允了。

可见，单干也不易，比吃大锅饭操心费力损寿呀。当然，照他祖祖辈辈认命受穷那个走法儿，这条路也未必就那么难走。再穷，无非去要饭就是了，三江平原这块地方还饿不死人。可傅贵宁死也不愿受穷，不肯安分守己，这就难了。

### 个人奋斗，死不回头

怎么办呢？离春节，眼看也没有几天了。在地上，卖命你也抓不到二百多块钱，他就朝水上打主意了。“打鱼去！”冬天在冰上下“冰板网”，他们家有这个传统。可是打鱼得用网，置一套网具还得好几百呢。偏巧福胜屯里有个教员，手里存了几个钱，傅贵和他联系上了。那人愿意入个股，他出钱，傅贵出技术和劳力，捕了鱼两人分成，说妥了。（这就是咱们现在称作“补偿贸易”那种东西吧？）买来网线，由傅贵的老爹织网。封江的前两天，就可以下网。那网很大很重，得用车运。找来十来个人，起早干了一天，网是下了，可是抓不到鱼。没办法，打下网吧，那就得打冰槽子，凿眼儿，这可不是轻活儿，全由

傅贵一人干。下一回网，拿不着。挪一回网，还是没有鱼。每次都得打冰槽子和凿眼儿。下网挪网还都得从屯里请人。这是人情，以后得给人家鱼呀。从江东挪到江西，又从江西挪到江东，来回挪了五次网。江上根本没有路，得先打出车道来。这也是傅贵一个人的活儿。江面上顺流而下的冰排，在封江的那个时刻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姿势互相拥抱起来，把江的表面弄成各种不同形状的立体。傅贵必须用他的两只手把它们削平。总共打了三条车道，有二里多长。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身子里头又饥又乏，外头江风打人，寒气刺骨。他一个人背着江风，拿着冰镢子“咔，咔”地打道。两只手经过冻和震，遍是裂口儿，象小孩的嘴似的张着。就这样，折腾到春节，还是一条鱼也没打上来。莫非说身上遭的罪和心里的火，就全白搭了吗？

这个时辰，谁家里不早就吹灭了油灯，倒在暖烘烘的被窝里酣睡呢？松花江白刷刷的冰上和乌黑的两岸，所有动物也都进窝入洞了吧？他傅贵就真是一个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傻瓜蛋？脚底下茫茫无尽的松花江沉默着。除了呼啸着鞭打着他的狂风以外，一切都沉默着。这时刻，要是有一个人说一句“傅贵，别泄气，坚持干，准有鱼”也好啊。换一个人，想起欠人的马钱，欠那位教员的钱，欠那些帮工人的人情，再想想家里眼巴巴盼自己拉回几车鱼的媳妇，和这几天白费的力气、白遭的罪，就能懊丧、焦急、绝望到朝死路上想。傅贵也想了这些，可他是越想越气，越气越不服气，脑子里老是有个亮光，这时变得更亮了，引他朝前走……

他忽然想起，齐家通那边多年来谁也没在那儿打过鱼。他熟悉江底的地形，哪是洲，哪是滩，猜得相当准确。江是先从边上封的。北江沿那一头，冰碴子在江面下岔住了，不透流，

兴许鱼就窝在那里！他走进窝棚，和老爹商量道：“爹，你再在这块看一下网，我到齐家通那边看看，能行，我就不回来，在那边打眼。要是不行，我就回来，收拾收拾咱们不干了。”那老头儿性子正好和儿子相反，是一员只能取胜不能打败的老将，遇到一点失败，就泄气了。这几天，不断在那里说埋怨话、消极话，好象他早就算定这次下江捕鱼注定要失败，儿子全是胡来；又好象本来可以取胜，都怪儿子愚蠢又不听话，才落个双手空空。加上这些天，冻饿交加，也确实够老头儿受的了。现在一听傅贵还不死心，又要另辟战场，气就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你别他妈扯王八犊子了！你他妈别再糟践你老爹了！你都把我糟践一冬了，还没完？再说齐家通那是啥地方？那地方能下网？你这不是胡来吗？”儿子只能好言好语央告：只此一次，不行就撤退回家。

那老头儿，好象生来就是为了给儿子当反面教员。你就是看不着他什么时候着急。他还爱跟小孩一起玩，坐下来下个棋，走个五道儿什么的，一玩就是大半晌。哪怕屋子里着了火，他也得把那盘棋下完。这回下江捕鱼，爷儿俩也没少叽叽。下滚钩是危险的事儿。他呢，一边下，眼睛还朝四外卖呆儿呢。那是六寸长的钩子，下的时候得非常小心。可他呢，哪块儿有一点动静，他就往四下张望了。儿子提醒他，他还不服：“你他妈一个小孩子还管我！我还不给你干呢！”再说，他那下钩子的办法也不行。冰底下水流一冲，钩就爬杆儿了。别人捕一百斤鱼，照他那样儿，准保三十斤也捕不着！傅贵一说，他又来火儿了：“你他妈小孩子懂个啥！我这么下，一样捕鱼！你给我一边呆着去！”自从下江以来，傅贵得天天哄着他，劝着他……

傅贵好说歹说，再三央告，老爹总算不吱声了，条件是不

管行不行，就这一回了。傅贵把冰镢子背上，把一大卷绳子也背上，找个杆儿手里拿着，奔齐家通去了。得在冰上走，好几里地，哪有道儿呢？全是冰牙子，象冰铸的波浪。总算走到了，一看，形势很好。他在冰上每隔三十步打一个眼儿，都是一米多深，往下一探，全是冰碴子，直到冰下八尺，全是。水流也好。傅贵心里一阵兴奋——一是证实了他的估计，说明他就是比别人“能”；再一个，鱼有希望了，这就来了劲，“咔、咔”地打起冰槽子来。完了，又迈着重冰牙子跋涉几里路，跟老爹打个招呼，再回到屯里找人下网。这时他已经累得不行，还是摸黑走了十几里路，冻和饿的感觉剧烈到难以忍受了。先回家——家里也生不起炉火，冷得可以结冰——吃点饭，马上去找人。先跑社里借个爬犁，弄个马，找来十几个人，又回到江上。几个人洗槽子，几个人拆窝棚，几个人修道，紧忙干，到八点钟才下上网。傅贵把别人打发回去，在窝棚里升起个火炉，烧点开水，他就糊起窝棚的缝子了。他求爹出去把水线拴上。老头儿不干，他已经完全绝望了。“要真有鱼呢？爹，还是拴上吧。”儿子又得哄和劝。水线好歹是拴上了，可是他也不盯那弓子。傅贵一边糊棚子，一边拿眼睛瞄着那弓子。忽然，他见那弓子忽悠一家伙落下去了，这时他的心好象也忽悠一下子跳到腔子来，赶忙叫道：“爹，有鱼了！快出网！”老头儿连头也不抬，“什么鱼，那是冰块！你等着吧！”傅贵赶忙出去拉网。嗨！一条二十来斤重的大狗鱼！还有一条亚马哈！傅贵一声欢呼，把老爹引出了窝棚，“怎么样？有鱼没鱼？”老头儿也说：“可真有鱼呀！”不用儿子说，老爹就收拾起那鱼来——晚饭还没吃呢。那顿晚餐很别致，是用小米粥清炖鱼。吃的时候，把鱼刺一提，鱼肉全落到粥里了，那个香，那个鲜，傅贵几十年以后还忘不了。

可是那顿饭也没吃安稳。一会儿，呼的一下子上来一个，过一会儿又是一个。几乎坐不下来，老得盯着那网。

整整拽了一宿网。为什么全是亚马哈，再不见狗鱼了呢？——傅贵纳闷儿。狗鱼爱溜边儿，今天怎么套不着鱼呢？他叫老爹看着网，他出去找狗鱼。这回老头儿来精神了，听话了。傅贵拿起绳子上北沿，岸上有一片高粱没割。他走进一块地，一个劲儿砍了些高粱秸子。回来，他打了冰槽，把秫秸塞进去堵住狗鱼的去路。它没处走，进网了。

爷儿俩干了二十来天，打了四五千斤鱼。给帮忙的人每家送几条大鱼，余下的跟那位教员分着卖了，还清了马钱。过春节的时候，屯子里的人不断上门来，说过年了，你们爷们儿歇歇，我们去看网吧。傅贵明知道还大有捞头，但慷慨答应了。从此，那张网就串开门子了，家家都吃上了鱼……

### 嗅出不祥，傅贵出走

这一冬，傅贵没上山，没给村里干活。高级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傅贵呢，屯里也就他一个人，跟全国农村发展相比，落后了好几个阶段。人家都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了，他还在土改刚结束那地方呆着呢。一算，差上了近十年。他长的个头儿又大，单干也不遮掩点儿，还光明正大地干，在屯里和区里能不刺眼吗？别的不说，人家往上汇报成绩，他就是个白点儿。“百分之百加入了互助组”“百分之百加入了初级社”，这样辉煌的成绩，都让他给耽误了。这一回高级社这个“百分之百”，弄不好还得败在他身上，这就难怪人家要来捅捅他了。

屯里开社员大会，傅贵也去了。由党支部徐书记作动员加

入高级合作社的报告。不知是为了使报告生动点，还是为了给某些人敲警钟，施加压力，书记举了个例子：“咱屯里有的人就是不干活儿，比如傅贵，这样的人怎能不反对走合作化道路呢？”

讲到这儿，书记吃了一惊，因为听众里有个大汉子呼地站了起来，说话嗓门比他还大，话也刺耳——

“你这叫秦始皇的鸡子，官僚儿！你去打听打听，我傅贵不是个懒蛋子！不是我吹，屯里有几个象我这样年年冬天上山倒木头的！咱一冬上山，还种三垧地，地还种得不赖……”

见过这种人吗？未免也太放肆了！一位书记，不说是长官吧，也是党的领导。自打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有几个人敢在书记发表演说的时候起来打岔，还出口不逊的呢？这种人能不处理吗？书记的弟弟是公安主任，就站在旁边，这就更方便了。以“扰乱会场，无理取闹”为名，制止了傅贵的发言，差点儿没把他给“反省”起来。

其实，傅贵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觉着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想自由点儿，他怕受限制。再一个，他知道人心不齐，他已经看到有人入了社，干活儿瞎糊弄了。所以，他对“归大堆儿”始终抱怀疑。现在还嫌归的堆儿不够大，又要高级化，要把土地、车马、农具、马草全都归公，拿个溜光，这能行吗？

他决定远走高飞了。他媳妇过去是唱评戏的。那一年农村里“归大堆儿”，城里还吵喝着要“百花齐放”呢。二道河子要办评剧院，来人专请刘秀霞（就是傅贵的媳妇）。傅贵决定妇唱夫随，进城当工人去。

傅贵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那个人群嘈杂、爆土扬尘的

环境。他是没办法，不得不走，因为凭着他农民的本能，也由于他打小儿要干大事的理想，他嗅出一股不祥的味道：这里的人可能要受穷；这里，也容不得他富贵。于是，他走了。

### 好比那潜水龙头 困卧在沙滩

二道河子，是一至五道河子中间的一个。这里是木材集散地，又是粮食集散的码头。

临离福胜屯时，傅贵生了一场伤寒。久病初愈，他没去工作，天天到街上和江边溜达，晒晒太阳，恢复一下体力。

看着松花江滔滔流水和江上的木排，傅贵就想起他爷爷来了。他爷爷跟木头打交道打了半辈子。当年他冬天在豪林河上游“作”木头，就是象他傅贵那几年冬天一样，把木头从山上运到河道上来。春天开了河，再把木头穿成木排，往下游流送。一年夏天，爷爷和两个人放木排，忽然山洪暴发，江水猛涨，水流湍急，把他们三人的那个木排给冲到江边山坡的一棵树跟前。江水仍然猛劲地冲击木排，这时木排象一张被子似地叠起来了，排上的人有即将被挤压而死的危险。他们就爬到一棵树上。由于冻饿交加，浑身无力，为了不至于从树上掉下来，各自解开自己的宽腰带，把身子绑在树上。不曾想，江水不知怎么一弄，竟把木排给冲走了。三个人使劲呼救，远处有人听见了。一个人想来救，被同伙的劝阻住，没来，而江水还继续上涨，那棵树又被冲倒，三个人就全淹死了。

这件事，傅贵是小时候听大人讲的。因为他时常想，所以记得很牢很清晰，就象他本人经历过的一样。他年龄越大，越觉得爷爷他们死得冤，死得窝囊。三个大人，怎么能把自己捆在那里，活活等死呢？他研究来研究去，没别的，不是没有胆

子，就是缺少能耐。“人得有个脑袋，”他后来总结出—条人生哲理来，“当然，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意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爷爷常在江边和江上工作，怎能不熟悉水性呢？在山上山下摆弄半辈子木头，怎么就不熟悉木头的本性呢？

土改以后，他傅贵在山上干过几冬，干遍了山上的活儿。放树；抬木——大的，要八九十人抬；截树；打丫；“倒套子”——把木头装到爬犁上运到山下江边；“归楞”（码垛）……有的活儿很危险，也不是非他去干不可，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上去了。因为他好奇，什么都想尝试尝试，摸弄摸弄。比如“串坡”，那是够险的了。有几株树长在山崖边上，要伐掉，可是，坡高路陡，牛马上去，得用人工把它一点一点串到平处。“倒套子”，人在前边牵着牛或马，后边是一个爬犁，脚底下是冰道。一次拉两立方米木头，不能让爬犁滑到冰道以外去；人在前边跑，脚底下滑着呢，一跌倒，就得叫爬犁碾死。每冬都要出多起事故，不是人让木头砸死了，或者让爬犁碾死了，就是牛马“坐坡”没坐住，撞到树上死去，或者被小树扎到腹部捅死了。可是傅贵“倒套子”这么多年，却没出一点事故，不但没有人畜死伤，他还弄通了树性。从小灌木到大树，没一样他叫不上名字来的；各种树木质如何，生长期多长，是干什么用的，以及各种树的毛病——什么“空口”啦，“蚂蚁梢”啦，“铁眼儿”啦，“灯泡子”啦，他都明白。每年十月一日上山，过正月十五才回来，他耽误了上农村夜校（都是冬闲时期办），可是一棵树就象一本书，傅贵读这个书兴致大着呢。大字不识，人家竟让他在山上当起土技术员了……

现在他离开了农村。干什么工作呢？“啥工作挣钱多？”——

这是傅贵选择职业的标准。粮库里扛袋子是计件，干的多就挣得多，又不需要文化。挺对路，傅贵去了。

正赶上农民送公粮，粮食入库忙，先让傅贵搭肩——两个人把粮袋从地上提起，放到扛袋子人的肩上。他认真，舍得使劲，总是把袋子举得很高，再放下来，以为这样，扛的人可以省些力气。不管怎么说，是一百八九十斤重的玩意儿呀。可是这么一来，他的两只手却都磨出了血。有人对他有了好感，劝他说：“搭这个有什么出息，还是学着扛袋子吧！”傅贵有点怕，因为粮袋子是敞口的，万一扛不好，撒了，那该多可惜！伙伴们给他鼓劲，头一回先装个八分袋，上肩了。他不会扛，只会“贴大饼子”方式，就是把整个袋子都压到自己脖子上。他走上第一节跳板，还顺利。又走上第二节——这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往下瞅了一眼，身子立时晃悠起来，本能地伸手去抓跳板旁边的扶杆。下边的人一直盯着他，这时赶忙一齐喊了起来：“别扶！那是活的！”“赶快扔，把袋子扔下来！”这个“扔”字，把傅贵惹火儿了，把方才的害怕心情一下子冲光了。“扔？那多丢脸！”脚底下忽然稳定了，力气也上来了，刷刷几大步走到围顶，一歪肩膀，就把一袋粮食倒净了。把空麻袋一夹，又刷刷地大步走了下来。下边的人交口夸赞：“这小伙计还真行！”可傅贵心里念叨的却是：“他妈的，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因为这一口袋粮食差一点叫他傅贵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他不偷懒，还暗暗跟别人赛着干。他的名次不断往前蹿。三个月以后，七十多个扛袋子的人中，第三名叫傅贵夺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双鸭山的四方台煤矿开工了，四处招人。妻子刘秀霞也要到那里去唱戏，傅贵就去了。又是——“什么工挣钱最多？”架子工，登高的，危险。行，干！高空作业，好象整

个世界都踩到自己脚下了，真带劲！他不声不响，把一些东西看出来，琢磨出来了。人家还以为他早先干过架子工呢。干了两个月，就提为二级工。以后每年提一级，到一九六二年，他就是五级工了。

从他八岁扛活起到现在，整整二十个年头儿过去了。凭着他的聪明、大胆和勤奋，傅贵不论干什么，从未失败过一次。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唯独一件事，他不行，那就是赌博。

离福胜屯去二道河子以前，他把房子、母猪卖了，拿到二百多元钱。那天晚上到邻居家串门，见一伙人正在“撸大点”。他站在旁边看一会儿，说话了：“这么玩多费事！玩一撸两瞪眼儿该多痛快！”他坐下来洗牌，叫别人上牌。一人占一门，他说：“下钱吧！”下了，每人抓两张牌，你一撸，我一撸，就定了输赢。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没过多大一会儿，他的二百多块钱就全输进去了。他心里也没怎么上火，只觉得挺滑稽：“这二百多块钱，刚才还是我的，怎么一下子就精光了呢？”

这事儿说出去丢人，他瞒着老婆没说。可是到了二道河子没几天，他在那个打猎的把头姓周的家里，经不住劝，人家又一片热情主动借钱，他又赌起来了。心想：要是真撞上，兴许还能把那二百多块钱赢回来呢。玩了一宿，他还是来大的。越输，下的赌注越大。到天亮，把六百元钱又输个精光。

怎么办？老婆好瞒，可这笔债得还哪。这笔钱是怎么输的呢？是不是借给他钱的那个人设下了圈套呢？二十年后傅贵也没弄明白。反正钱是你输的，既然钱是借的，就得还。怎么还？他有什么本事？出大力呗。那时候二道河子的居民烧饭和冬天取暖用的都是样子，即劈柴。木头，他熟。有人买吗？有。问问价钱，一尺半宽、一米高、四米长的一垛，称为一“溜”，质量

好点的，一“溜”能卖二十五元钱。傅贵一算计，这个活还行。说话就弄了个小爬犁，上山拉起木头来了。

自己在山上采木头，自己装，自己运。得把爬犁从山上拉下来，再拉过冰冻的松花江，送到老周家的后院堆起来。也不易呀，五百斤得拉一趟；七百斤也是一趟。他又来大的了。尽管一天流几身大汗，累得呼哧呼哧地喘，还越拉越起劲，好象那里头有挺大乐趣似的。当他的爬犁拉过市街时，行人往往站下来夸上两句。有的说：“看，真行，比小毛驴拉的还多！”傅贵听了，也不觉得委屈，人家的意思还是夸赞嘛。

就这么着，整整在松花江上跑了三十个来回，才还清那一晚上输掉的钱。

从此，傅贵再没有赌过一分钱，还成了一切赌博活动的死对头。

那几年，农村不断传来坏消息。大跃进，大吹牛，大食堂，大饥荒。傅贵一直怕的那个“归大堆儿”，归得更大了，叫作“一大二公”，连工分都不算了，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事情好象证明了傅贵走对了。

他在矿山当架子工，日子混得也真不赖。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钱，相当于一个行政十三级干部了。他媳妇刘秀霞，现在在戏班子教戏了，一个月也能挣七十多元，顶个十九级干部吧。两人收入相加，钱还花不完呢。全国经济困难那几年，他也没饿着。他能上山打孢子。他能开荒种菜，还年年高产。

不仅这样，傅贵那时还是矿上的一个红人呢。他月月季季得奖，年年是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一九六一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可是傅贵并不满足。总觉得生活里好象缺少点什么。他缺

的是什么呢？你让他说，他会回答你：“我还想赚大钱。‘好汉不挣有数钱’嘛。”可是你若再叮问一句：“赚了大钱，你又干什么用呢？置地当地主？开工厂当资本家？”又把他问住了。

他是觉得身上的精力和脑子里的主意还有好多没使出来。他是没处使呀。无论干架子工或者扛麻袋，种地或打鱼，伐木或者倒卖白菜，哪一样也占不满他的脑子，用不完他的精力。

一九六二年，一股清风吹拂过中国大地。傅贵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他本能地感到中国农村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要改变农民的消沉、懒散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一个人将会有较多的自由去发挥他身上的创造力量了。

傅贵决定放弃城市生活，返回农村了。那时矿上虽然要下放一批工人和干部到农村去，却并没有把傅贵包括在内。领导人还找他谈过话，劝他打消回农村的念头，傅贵执意不肯。

于是，他一家人便在一九六二年回到佳木斯郊区，落户在“五一”大队。

### 枉费心机，还得归到穷堆里来

在各种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傅贵选中了打鱼。搞农业，他也是一把手儿，准能捞钱，可是钱毕竟是有数儿的。打鱼，辛苦点儿，可是鱼汛期里你真要把鱼群撞上，那可就是一下子几千斤的事儿。这里始终有一个未知数。干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冒险性——有趣就在这里，可又不是赌博，你得花力气，你得有知识，还得随机应变，这又有点象打仗了。你在江上摆布大网，不象大元帅敌前布阵吗？你根据水流和地形拦截鱼群，不象大将军追捕狼狈逃窜的敌军吗？需要眼力，需要智谋，还得善于决断，这就得有点胆魄，而这些，都是种地、伐木、扛麻袋那些

行当里用不上，不能施展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噼里啪拉在网里惊慌、焦急、徒劳无益地挣扎着，妄想找出一条生路的那些各种肤色、体态的肥硕的活鱼！那是鲜美可口的食品，那是钱，那是劳苦和才能的果实呀！

这半辈子，傅贵在并不自觉中间，实际上总是在和一种什么力量比赛。他要让老天和世人看看，他傅贵有多大本事！

现在，傅贵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政策的信任，把几乎全部财产——六、七千元，全部投到一张渔网和一条船上。他决定在松花江上大显身手，捞一笔大钱，让三江一带的人们瞠目相视：原来还有他这样一个能人！

买一斤鱼线，那时候要一百五十多元钱。网片子也不便宜。傅贵和父亲一起织起网来。

织呀织，几个月过去了。谁想得到呢，网还没有织成，政策又变了。这个那个又成了“资本主义”了，批的批，禁的禁，抓的抓，阶级斗争的风儿吹得比以前更紧了。

这可咋整？人也回来了，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网也整上了，可是又不许你干了！

傅贵没招儿了。他站在江边，望着松花江滔滔东去的流水，心里又是懊丧，又是不解：那水里头一群又一群的鲜鱼，都白白游走了。捞上来，就是中国的玩意儿；放过去，就成他妈外国货了。为什么就不准我捞呢？这个理儿，他始终弄不明白。不错，我个人是赚了钱，可是那鱼不还是属于中国的吗？中国有多少人成年吃不上鱼，还能嫌鱼多吗？再说，我是本人出力呀，我这也说不上什么剥削呀。可惜到现在，他快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认识“资本主义”那几个字是什么样儿，不懂它的肮

脏、可怕和危险到底在哪里。他只知道挨饿受穷的滋味儿太难受。

没办法，只好加入生产队了。从一九六三年夏天起，傅贵给“五一”大队打鱼。是大包干儿，他这一年内要交给队里三千斤鱼，下剩的全归他本人；给他划一等工分，渔网渔具等各种开支由他自己负担。这时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四月中到六月中中的鱼汛期已过。出师不利，傅贵那年只交给队里二千五百斤鱼，拿了个二等工分，不够生活的。冬天去打猎，那几年，这个还可以归自己。

又是一个春天了。傅贵心情郁闷，百无聊赖，不免四处走走。地里荒草蔓蔓，自由舒畅。这一带农村中最有生气的，就得数这个草了。人呢？人人蔫头搭脑，不是广播里说的那个“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了。几十年前的老土房，都快趴下了，还没有退役。从低矮的房门中钻出一个妇女，脸上黑不溜秋，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能吓人一跳。再看农户的院子，很久没清扫过了。“那不就是几扫帚的事吗，该烧的烧，该积肥的积肥，怎么就不弄个干净呢？”傅贵瞅不惯乱和脏，暗自纳闷，除非是没心过日子的人，不会把自己家都搞得这么邋遢的。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治住、压倒了。那么，又为什么这样穷呢？……

他傅贵现在肯定是没有退路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乡，现在他又陷到这块了。从此，傅贵若不让这地方改变，他和他的子孙就没个好。

“五一”大队是国营农场性质，吃的是供应粮，虽然安全可靠，却是数目固定的，还得月月付钱。一不作，二不休，不如到纯粹的农村去，那块儿还不这么死。于是傅贵一家就到黑通

大队的第二生产队落了户。他还是给队里打鱼，可不是包干了，打多少都得交给生产队。队里给他下工分。那工分也真够可怜的，十分只值三四角钱，一个人一天最高工分是十二分。用的还是那张网，可它也不是自己的了（他就干脆把那网卖给生产队，队里给他折了四千五百个工分）。这些钱，只相当于傅贵投入的资金的几十分之一。网不值钱，算得了什么？他傅贵这一百多斤肉，不也落价了吗？放开手叫他干，一年弄个万儿八千的不费劲。在双鸭山，他一年还值两千多块钱呢，可是只因为挪了一下地方，到了二百里外，他现在一年就最多值百八十块钱了！算下来，他落价的程度跟那张网也相差无几。

个人发家致富，现在是在没门儿了。这一来，心里就空出了一块地方。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占上了那块空地：这里为什么这样穷呢？……

## 第二章 遍体鳞伤

### 他是怎样上台又下台的？

本来年年都是“碾子响，换队长”，1965年有点特别，八月就选起队长来了。那天中午歇晌的时候，把社员召集起来开会，事先也没说开会干什么。人齐了，大队书记黄振林这才宣布：生产队一个副队长出了问题，不能干了，要补选一个队长。“经过大队研究……”说到这儿，傅贵忽然冷不丁地听见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搞的！事先没告诉他，也没人问他愿不愿意干呀。还没等他脑子转过弯来，会场上已经劈里啪拉鼓起掌来了。这就算通过了，定了。这可咋整，他做梦也没想当干部呀！

要说根本没想过，那也是瞎话。这些年，傅贵也见过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当然，都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听人讲话，他很仔细。每见主席台上那位首长念稿子，或者磕磕巴巴讲话，说这句还不知下句在哪儿，把会场上的人弄得七倒八歪、哈欠瞌睡的时候，他傅贵也曾经想过：“我呀，也就是没有文化就是了。不然，让我当你这个首长，不至于连话都不会说。那些事儿不都摆在那儿吗，不都是你天天干，日日想的吗？写什么稿子呢，用得着磕磕巴巴吗？真是！”

会上提名，鼓掌，到让他表态那短短几分钟里，傅贵的心里斗争可挺厉害。他头一个念头是：要干，能不能干好？干的话，可真得得罪些人——一想起那些人，他又想到自己未必斗得过人家，那又会是个什么下场呢？……可是人家已经在等着他表态了，这是领导说的，社员乡亲们又鼓掌了，掌声还挺有劲。他不表态不行，表也不易。说不干吧，岂不辜负了领导的一番心意？几十号人的大会也白开了。对不起人呀。他慢慢腾腾站起来了，开口之前，横了横心——我宁肯得罪人，让那些人治我吧！他发言了，很短，五个字：

“我干。要干好。”

事后，傅贵也琢磨过：怎么会叫我出来当队长呢？大队的干部早就对我有看法，二队的“爷台”们也不满意我呀，说我这人不好摆弄，好提不同意见。原来是这样：当队长，非得是贫协的人不可，这叫“阶级路线”。可是贫协那十几个人，都是过去当过队长被拿下来的，一个没下过台的人也找不出来了，实在是没办法，我又是那个铁杆贫农，这才叫我当的。几年以后他回忆这段历史，又悟出了一点：那些人叫他上台的时候，还抱过一个希望，以为给他点权，当个小官，他傅贵说不定就能听他

们的，归顺到他们一伙去。不然，牛毛细雨下几天儿宿，也淋不到他身上呀。

散了会，几个队干部要分工，李志福还是正队长，总管；张立福管财经；傅贵管生产。傅贵提出建议：“咱们队，连个队舍也没有。跟三队合用一座房子，这就象两家人住一间屋子似的，多不好。是不是想法建几间房？”那两个人倒也不反对。决定由傅贵分管队舍建造，张立福去跑木料和马车轮胎，钱呢，也由他去张罗，先把队里的几百斤葱籽卖掉。

有件事，使傅贵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他是来打补丁的。前任副队长李长发下台，罪名是搞“黑包工”。他是三把手，你李志福和张立福不同意的话，他还能带几十人出去包工？怎么一出问题，责任全扣到干活的人身上了呢？现在傅贵是三把手了，下场又将如何？

傅贵一上台，就把“阶级阵线”给“混”了。他看中和起用了一个“四类分子”田德坤。这是个能人，后来二队种大头菜、西红柿，都是他给栽的秧子。他还会瓦匠技术。傅贵带着他一起确定了队部的位置和房子的跨度。

要修一个三合院，北房和东西厢房各七间，作队部、仓库、马棚、车库等等。要啥没啥，难处很多。这是傅贵头一回作为一个小头头，领着一帮人为大家干活，个人毫无所得。可是也怪，这个一心要发财的人，干不发财的事情也同样欢势；不光是设计、组织，指手划脚，脱坯呀挖地基呀什么的，他也都动手干。可是，他这边二十一间房的墙全起来了，木料和轮胎还没影儿呢。找张立福，说买妥了，让到市里去拉。去了两趟，都空车回来了。这是怎么搞的！这象话吗！

那张立福干什么去了呢？他刚学会骑自行车，觉着挺新鲜，

成天骑个车到街上去转。这么说骑车去交涉木料和卖葱籽不挺方便吗？方便是方便，可是人家还有要务得办呢：他家房前房后的菜园子侍弄得挺好，每天得用自行车运两麻袋芹菜、辣椒、豆角子到集上去卖。卖完了菜，有工夫去办公事了吧？不行。他还是个钓鱼的爱好者，所以还得骑车到北沟子去钓鱼。钓鱼可不能性急，你傅贵打十块土坯的工夫，还许一条鱼都没上钩呢，不钓上够一顿饭吃的鱼，能过瘾吗？

傅贵忍不住了，要求立即开会。

“你钓鱼，怎么不叫我给你拴个钩呢？保管好使，”傅贵还想尽量镇静一些，别把关系搞坏，可是一句话没说完，就抑制不住怒火了，“可这是什么时候，房子全起来了，就等你这木料了。你还连葱籽儿都没卖，轮胎、木料也没买到，还叫我们去拉料，空跑两个来回！你倒好，跑生产队的鱼池钓鱼去了！……”

张立福只是好笑，也不搭腔。傅贵气得干瞪眼，你拿他怎么办？他真想上去扇那家伙两个耳刮子，忍住了。转过身来，他把目光盯住李志福，现在只能由他说句公道话了。

那李志福呢，先是一声不吭，过了老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几句话：

“傅贵，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么说话，别说张立福，连我也接受不了。你这个人哪，就是跟谁也合不来。意见不是不可以提，要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嘛！”

傅贵原以为他至少应该象个婆婆，给他俩调解调解。他倒给张立福撑起腰来了！这口气，更难忍了。于是他便冲李志福质问说：“你先说我提的这些事儿对不对？你说停工待料这么多天，是不是损失？他不工作，整天在他菜园子里转悠，上北沟子钓鱼，对不对？……”“事实是有，可是你说重了，方法不对。”

“我有话说在当场，这合乎组织原则。”……队委会的第四位委员是姓赵的会计，老实巴交，这时见势头不对，干脆甩耙子走了。这就形成了一个2：1的局势。这叫什么理？不干的倒对了，真干傻干的倒没落个好？傅贵一怒之下退出会场。会开黄了。

打这，张立福人家干脆撂了挑子，啥也不干了。李志福呢，还是啥事不管，一天四处溜达。扯闲白倒挺能耐，能把一屋子人逗乐。一干正经事，没他了。后来，木料还是傅贵去张罗弄来的，房子也盖成了，队部也搬进去了。那张立福呢，他家跟队部是一沟之隔，每天只要傅贵在队部一露面，他就站在沟那边，双手把腰一叉，看着傅贵破口大骂：“操他妈的！……”你说傅贵这肚子气怎么忍？

傅贵到大队跑了好几趟，才把大队的人请来。找张立福来开会，请了三次，还是不到。最后来了，披着一件薄棉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又骂开了：“他妈的找我啥事？够不够抓和判的？够，就把逮捕证拿出来！”傅贵强忍着气，等大队干部主持公道。心想，别的不论，就冲找这么多次不来，来了就骂，也得批一批他吧？可是大队干部来了三四个，竟没有一个吭声的！傅贵忍不住了，对着大队支部书记刘少春说：“刘书记，你全见了。我还以为你能有个态度呢。行了，这回我全明白了。这个队长，我是不能干了！”这时候，人家刘书记倒痛快起来，有态度了。面面相觑的人，这两句话说的倒挺利落：“你不干，就撂下。没有你，地球照样转。”李志福也有话了，他问张立福：“傅贵不干了，你干不干？”张立福说：“我干！”姓李的马上说：“那好，今晚这个会就开完了。小队长留下来，咱们研究一下明天拉地的事……”傅贵一个挺大的活人，好象就不存在了。你说他这时是什么心情？真窝囊呀。

这一夜，傅贵没睡觉。越想越气。这回他看透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人家原来都是一家人。其实，傅贵当队长以前，就看出一些问题来了。就说这个二队，近几年就换了十五个队长。谁干，都要贪点占点。现在出来一个想认真干点事、不贪不占的人，他们就觉着碍事了，能欢迎你吗？

到今年冬天，又该一年一度选队长了。那帮人知道队里群众多数人拥护傅贵，便特意打发他出去卖牛，免得选上他。傅贵和一个社员跑了两个县、十几个大队，出去二十来天，把牛卖了。可巧儿回来那天下午正好要开会选队长。傅贵知道反正选不上，他也不想当，本不想去了。可是又一想，不去，不正合了那些人的心愿吗？去！

他回来以前，二队大会小会已经开了五六次，讨论选举“班子”的问题，同意让傅贵当队长的人占多数，大都是外来户和成分不好的，没有发言权。反对傅贵的，是少数人，但是贫协的，有权。选举这天，候选人提了四个，就是没有傅贵。会场是三间房，一面炕。先宣布候选人名单。问大家是举手通过，还是投票？多数人主张投票。当场裁纸，发票。一投，都投到傅贵这边来了。本该分别宣布每个人得票数目，这回不，捏巴到一起，说：“计算结果，投傅贵票的也不少，但是李×得票比傅贵多一张，当选为队长。”有人鼓掌。也让李×表了态。本来事情就算办成了。不想大队副书记姓初的这时站了起来，骑在门坎上说话了：“李×方才的表态很好。我说点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选举有点怪。候选人名单不是讨论好几回了吗？为什么名单上明明没有傅贵，今天又投给他这么多票呢？你们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傅贵一听，冒火了，这不是指他吗？这个茬儿，能不接吗？他刷地一下在炕上站了起来，发表演说了：

“咱们捞干的说，我傅贵要想当这个队长，也用不着搞阴谋诡计。今年不当，明年还得选我。有没有阴谋诡计呢？有。谁搞的？你们！今天这些票，你们是怎么算的！我明明比李×多一票嘛！哪回选举不念票？今天怎么不敢公开了呢！”这一说，会场开锅了，很多人放声大笑。

这种民主很奇怪。说是人民无权吧，填不记名选票的时候，特别是划个勾呀叉呀不露本人笔迹的时候，群众还敢于表达民意。他们刚才不就行使了这个民主权利吗？可是现在他们却只能乐一乐，谁也不敢说话，公开表示个人的政见了。你说怪不怪？就好象方才那几十张选票不是这些人填写的似的。

于是，政治舞台上现在就只剩下傅贵一个人来应付大、小队干部的围攻了。那场面也真够热烈的。傅贵撒起野来，不顾后果了，把那些人见不得人的事给翻腾出来不少。他提问，一张嘴对付二十张嘴，把那些人问得哑口无言，于是就得靠放大音量声嘶力竭地叫喊来压倒他。为了刹住傅贵的气焰和防止不良影响，把大部分社员给撵回家睡觉去了。

大辩论进行到一点半，天快亮了。傅贵说了一声：“我等着，你们爱咋办咋办！”一摔门，扬长而去。他的对手们却没有离场。这些政治家们拟定了一个方案，审查这个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有人认定：这小子准是在双鸭山干了坏事，叫矿山开除的！有人觉得这还不过瘾，指出他可能是什么分子。于是当场分了工，决定派两个人出去外调。

## 第二次上台，下场也不光彩

从选举会上回来，他憋了一肚子火，一宿没睡着觉，心想：黑通算没个好了。这些人执政，还好得了？我是个孤大愣，拉

倒吧，搬家！

他曾经想发财，还想的挺邪火，可是生不逢时，路给堵死了。

那么，他现在想望的是什么呢？选他当队长的时候，他想的是：只要让我干，我真干，相信能干好，让群众也得个好。

可人家就是不让他干。

正要搬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黑通大队这一带，“文化大革命”比别处早半年。前面写的那场选举之后不久，队干部就靠边站了。

人们把傅贵选入文革委员会，他吓得跑到双鸭山待了十来天。怕的是什么呢？头一个，这“革命”是“文化”的，他一个大文盲，怎么干得了？再一个，这“革命”也有点邪门儿，怎么尽是叫人哈大腰和戴高帽子呢？傅贵也看不惯。他决不能整人，那是伤天害理的事。于是他就请了个会写字的人，写了一张声明，张贴出去了，上写：“本人自即日起自愿退出文化大革命。傅贵。”还不行，本队一个造反团体又要让他当头儿。他又到双鸭山去躲了一阵。后来军队的接管委员会又来找他，非让他当队长不可。没法子，干吧。

世上有好些事是不合常规的。不早不晚，偏偏在一九六六年这个全中国大乱的一年，傅贵能够开始实现他治穷的雄心了。短短一年，他就把二队给弄富了。社员的分配，一个劳动日的工值从一角二分一下子增长到一元二角钱！在黑通大队的九个生产队中，二队的收入达到最高水平。

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一个是种地粪肥施得多，铲趟次数多而及时；一个是组织大车出去拉脚；再一个，派人出去打了很多羊草和苇子卖钱。

他这个人点子多，胆子大，说干就干；不贪不占，干的还比谁都多。这股子正气鼓起了正派人的信心和干劲，同时也多少镇住了队里的歪风邪气。

这个“镇”，在贪懒成风多年、坏人横行、好人不敢说话的农村里，还是不可少的。傅贵的外貌——高大魁梧，浓眉重须，就有点武将的派头，再加上他胆子大，脾气暴，女人家到他家串门的，一见他回来就悄悄溜走，说是他身上长着“疹人毛”。那些行事不正、偷鸡摸狗之辈，自然更要惧怕他三分。何况他有时候还打人呢！

咱们不是说过，傅贵研究黑通为什么这么穷吗？一进二队，答案就更具体了。头一个，历届队长没有不贪不捞的。下台多少年，还“雄心”不死呢。就说刘文汉那老家伙当队长的时候，一早儿把别人都打发到地里去了。时间掌握得挺准，九、十点钟，他扛个什么农具（看季节）来了，哪个地头的人都以为他刚才在别的地里干活呢。人家正种谷子呢，他一转悠，又回村了，直奔仓库而去，告诉保管员：“地里种籽不多了，给我称三十斤苞米！”然后背上口袋就回家了。秋天打场，正入库呢，刘队长又来了，叫拿出两千斤黄豆，说是某某局是咱们的关系单位，得给人家点牛料，搁沿儿上又拉他家去了。

队里的一头一百五十多斤的肥猪得急病死了。是中午，傅贵过去一看，可不是怎的！他叫饲养员把那猪抬到背阴处，说等吃完饭安排个人来褪褪毛，处理掉。可是，没过多大工夫，那猪没了。大伙儿找啊找啊，心想也真邪门儿，莫非那猪听说要褪毛，吓跑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傅贵火儿了，说，这他妈也太欺负人了，非当个案子破不可！他这就下了茬子，成立一个三人查猪小组，刘文汉是成员之一。几个人坐下来分析案

情，七八天也没弄出个头绪。一个孩子闲扯的时候露了一句：那天，老刘头子把猪拖回家去了。傅贵想，这可备不住啊。刘文汉是贫协主席，正是吃香的时候，没个真凭实据，他才不认赃呢。正好，他老婆来了。一碰见傅贵，就猫头鼠尾地。傅贵想，我来诈她一盘试试：“二婶子，那口白猪，二叔原说给几个钱，那钱还给不给呀？”那女人当场就应承了，说过两天，等把肉钱收上来就给。傅贵又去找专案组，正开会呢。傅贵坐下来，一边观察那老家伙的神色，一边问他：“二叔，你是有经验的人了，你估计那猪能落到哪儿去呢？”刘文汉不动声色，叭嗒一口烟袋，还真是一副长者的架势，发表意见了：“我看这案子也不好破。要是当时不破坏现场，还有点根据。现在时过境迁，就难了。你怀疑也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再说，也就是个百八十元的事儿，我看还不如就拉倒算啦！”傅贵越听越火，站了起来，走到那老家伙跟前，强忍着肝火不举胳膊，伸出左手指着刘文汉的鼻子，把最大限度的轻蔑都装到一句话里，恶狠狠地说：“就是你拿去了，你还美呢！”傅贵那个脸一麻塔，坏人身上就痉挛，连老奸巨猾的刘文汉都瘫在那儿了，就怕大巴掌打掉他儿颗牙。那口牙已经不多，也都松动了……

脸也丢了，猪钱也还了，这就完了吗？没有。九队差种籽，借去九百斤，隔了年没还。傅贵把刘文汉找来说：“二叔，让你干点俏事儿，把九队欠还的种籽要回来。”要是回来了，可是装上牛车拉他家去了。

不论什么东西，也不论是什么人的，刘文汉是得撻就撻。人家买两斤冻萝卜的钱，他撻了。连他亲弟弟叫马车轧坏了脚，住院时候队里给的医药费，他也不放过，给私吞了。后来闹到两兄弟对质，起誓。刘文汉说：“老三，我要是拿了你那五十元钱，

我这辈子绝户，下辈子还让我绝户！”老三也发誓：“二哥，我要是收了那笔钱，这回我的腿叫轧折了，下回还让它轧折！”

一个人，怎能贪婪到不要脸皮、不要良心的程度呢？他傅贵也是贫农，他小时候也见过很多老贫农，再不济，也不过有点小偷小摸，还多半是偷阔人的。极少数被迫当了“胡子”的，还讲点义气呢。

村里反对傅贵的，并不都是李志福、张立福或刘文汉这号儿人。还有职业政治家呢。比如李×，就是那次“选举”中“比傅贵多一票”上去的那个人，现在降为组长了。他当兵回来，就从来很少出工，也就是打打更、当当公安什么的。搞运动，他就出来了，成分好，嘴皮子能说，喊个口号也比别人响。搞运动还总是依靠这种人，他们总能红一段，编瓜结枣地把好人整一通，然后又躲到一边，在生产劳动中甘当配角，吃救济。

傅贵要干事，能依靠这号人吗？不能。他们干脆不出工，来了也不出力。不但不能依靠，还得防着他们偷，还得镇住他们的捣蛋，二队才能有点希望。这不就得罪他们了吗？

可是活儿总得有人干哪。老实实在干活儿的人都是谁呢？没一个是贫协的会员，都是富农或者父亲有点什么问题的子弟，再就是外来户。傅贵这就难了。他要干事，就得触犯那条“阶级路线”！

社员孙玉堃，从来不好好干活。叫他看土豆地，嫌天热，根本不去，结果叫人家偷去一大片。不心疼吗？傅贵忍住了。那天正割小麦，很多人去拣小麦。傅贵叫孙玉堃去麦地，叫他们一律不准拣。这小子去倒是去了，吊儿郎当，背上扛个镰刀，晃晃悠悠的，他对众人说：“走吧，都走吧！别怨我不让你们拣。是傅长官命令我的。你们要拣，我这碗饭以后可就只好

吃了。”傅贵听见了，也没理他。接着又来了第三场——这里面就有文章了。收完瓜那天一大清早，他去找傅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听说你们不用我了？我要问问为啥不用我？！”傅贵说：“没有的事呀。你说说在哪儿听到的？”“那还用说吗？你们用什么人，支持什么人，打击什么人，不明明白白摆着吗！你重用地主富农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傅贵这回忍无可忍了：“妈的，还反了你呢！”过来一把就把孙玉莛按到地上。那人哪里是傅贵的对手，傅贵抡起胳膊，捶了他几下。他跑了，一边跑一边骂：“杂种操的，他打人，他打贫下中农！”

那年八月，上边有工作队，下边有造反派，大字报一下子铺天盖地糊了起来。罪名除了“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以外，还有怠慢“忠字化”代表，不让社员做毛主席像的镜框等等。接着就宣布傅贵撤职，反省。

傅贵成了整个大队批斗的对象。大队主持批，各个小队也可以拉去批，连学校都可以到二队来“借用”。没有“外事活动”的时候，在一个“四类分子”领导之下去割地。那年庄稼真好啊，傅贵有时候割着割着就忘记自己是批斗对象了，按老习惯，干一件事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入该分配多少，积累多少。宣布休息了，他还要找队委开会呢，一见众人已经坐好，摆好批斗的架势，这才明白他又得站着和蹶着了。

每天干四起儿活，歇气的时候，旁人磨刀、休息，他傅贵老得蹶在那儿回答问题。造反派审问了：“你今天干的怎么样？”傅贵心想，得谦虚点，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是不是故意破坏？挖挖思想根源！哪点上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太费劲了。往后再问，就说：“干的好。”“好？哪儿好？”“你看看我

掘的那个掘儿，手指头都塞不进去！你再看我割的那个茬儿，紧贴着地皮。”大喝一声“不老实！”还是不行。天天如此，还不算完。吃完晚饭，还得义务劳动三小时。

就这样，连续批斗了一百零三场。然后宣布，错误是有，不够“处理”，到四队当队长。傅贵这回是说啥也不干了。

这时候，大喇叭响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好形势”的例证，大队广播站反复报道：黑通大队二队今年还清了借银行的全部外债；工分值居九个小队的最高水平；日值一元二角钱；家底也最厚，添了多少牛马，畜力多么强……傅贵当时心里的辛酸，可想而知。

然而更令他伤心的是他老爹又神神叨叨地走过来了，附在儿子身边说悄悄话了：“听见没有，傅贵儿？大喇叭刚才又广播了，又要开批斗大会了。你听爹的话，快跑！你怎么不动弹？快跑呀！”

他爹是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吓坏的，精神分裂了。他哪见过这个？看见三个人走路，他当是去参加批斗儿子的大会的；瞧见两个人低声说话，他当是在合计怎么整他儿子的……随时都来向儿子和儿媳报告军情。

听说上边又要让儿子上四队当队长，这位老人急坏了，不住地劝呀劝，说：“那个队，你可千万不能去呀。那块儿没有一个人好人。你去，非叫他们给害了不可！”

就在傅贵到四队走马上任那天早晨，那位老人悄悄走进马棚，悬梁自尽了。

这又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 不自量力，太岁头上动土

这年，傅贵三十五岁了。当队长两上两下，挨了一百多次批斗。整他的人还都自在，他本人的罪名也没有洗清，还赔进去一个老爹。他爹死的那天，公社、大队也没个头头脑脑的来看一看，安慰几句，倒传开了舆论，好象是他傅贵夫妇不孝不贤，把老爹给逼死的。

傅贵这人自尊心特强，把个人的名声看得很重。而上述一切，没有一件不是贬低他、侮辱他、糟践他的，他怎么满不在乎，又答应上四队当队长了呢？再说，政权没变，政策没变，跟他作对的那个势力也健在无恙，他就不怕再挨整吗？

四队是个什么地方？那个穷，傅贵不是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穷，一般的破。走进那个村子，事先要没个精神准备，你能吓一跳：哎呀，我这是到哪场来啦？……是领导安排，叫咱忆苦思甜来了咋的？穷困，衰败，残破，愁苦……凡中国话里令人沮丧、绝望、沉痛、懊恼、恶心的词儿，你就敞开儿往外甩吧！管保不会夸大。

你最先看到的村内最雄伟的建筑，是四间草房，都眼看要趴下来还原为土堆了，灰拉巴儿，黑不溜秋的。好象怕人往里头看，连个窗户都没有。为了延长老人家寿命，前边用木头支着，后边用木头顶着。走进去一看，黑咕隆咚，象个窑洞似的。只有马槽上挂着一盏电灯，还是从人家老韩家院里拉过来的。连几米电线都买不起，用的是1958年那种铁心广播线。没有瓷瓶，在墙头上钉个钉子，把电线在上头绕几圈，拉过来的，再一看，连个开关也没装。真够节约的！全队总共只有十二头牲口，都是“滚蹄”、“拉拉胯”；老的老，小的小，找不出一位能

驾辕的，真正是“老牛破车疙瘩套”。傅贵拿眼角一捎，就明白了：既没草，又没料，牲口等死呢。

最有生气的是东头拴着的那两匹瘦马，比西头儿无精打采抽巴旱烟袋的几个人形儿精神多了。

再看院子里，当中是一个大坑。一下雨，牛就时常掉进去，这时候，队部就就得动员社员来一次抢牛运动。坑以外，也寸步难行。不过这也有好处，队长们在屋里喝个酒、打个牌什么的，就没人来干扰了。

再到村外看看，地里的草荒比他到二队时候还茂盛，简直就是一片草甸子。全是平板地，没起垄；看来是种下去完事，不铲不趟的。那地还乱七八糟，耕地里夹着很多荒地块子，有“抹斜子”、“夹心子”、“黄泥棒”、“大炕”等等。样式齐全。“犁都抹不过来，这地可怎么种！”——傅贵发愁了。

傅贵抄着手，在村里村外走了一圈。心想：“能把一个地方搞得穷成这个模样，也真不容易，得有点本事才行。”

迎面走过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哦，他是孙老九的儿子。这人三十二三岁，膀大腰圆，体型也很好，走过傅贵身边，白愣一眼，过去了。“这个队十三年没开支了，这小子身子骨还长的这么好！”傅贵知道这人队里的活儿一天不干，指靠什么生活呢？靠耍个钱摸个牌。跟一个姓侯的俩人，常进山沟找老农民摸牌。四人看牌，他俩使鬼。再一个财源，就更不光彩了，常把些男人领到他家里去……

黑通大队，有“八大爷”，四队就占了两三个。共同的特征，别人归纳出来的，有这么几条：“依仗权势，欺压群众；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沾奸取巧，搜刮民财；大事小情，出头露面；红白喜事，张张罗罗”……傅贵慢慢观察，这八大爷里住在四队

的孙家那两位还占有特殊地位。孙老麻子哥儿们几个和他们的儿子、女儿、姑爷，没几个常出工的。队长、会计、出纳，有权说了算、贪占又轻松的差使，都叫他们把持了。别人来干，他们就捣蛋，叫你站不住脚，灰溜溜下台。他们仗着个什么呢？穷。穷打穷闹穷偷穷耍穷搅穷告，搅穷为止。

大队支书刘少春欠集体三千元债，还能给自己起三间新房，又给儿子起一幢新房。谁出的工？谁家的料？还不是农民的！孙大麻子的七弟孙七爷，不过是个小小的出纳，你就数不清他一天喝多少回酒。到佳木斯办事回来的路上，不过二十四华里，也就是几十分钟的汽车路程吧，他就得停下三回，到馆子里喝三顿饭。有一次醉得把公章和单据都扔到电影院了。哪儿来的钱呢？贪污社员的呗。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了，可是也称不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挺难命名的。

群众赠给这些人一个称号，叫“二懒奸”，意思是：二流子、懒蛋、奸鬼三合一。

这么一股势力的存在，也没使傅贵怯阵。在二队不是较量过一场了吗？最终不还是他傅贵胜了吗？现在他不但要干，还要来大的呢。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穷；再一个，他想让黑通人看看他傅贵这点本事，也让二队那些人尝尝“后悔药”的滋味。

开春，傅贵带上人马先来整地。把一百来垧地全翻了，耙平，重新起垄，有的东西，有的南北。地连成一片了，道也没了，涵洞也挪了。回到村里一卸犁，把马拴到槽子上，一看，还没草呢。只好再跑到一队找队长借了一车碎草。料呢，也得东家西家去借，没钱买呀。

他从队里抽出十来个壮劳力到市里拉粪，粪堆堆得比哪个

队都大。他实行科学种田。他什么都懂，哪样农活儿都干，要求又严——比如种菜，还差半条垄，粪没了。在别人，也就算了。他不行，命令停工。那里挨他家近，就叫人到他家拉一车粪来，这才接着种。这么干，只要有良心的人，还不振作起来跟着队长上呀？

他实行科学种田。谷子宽播，高粱种双行“拐子苗”，包米一坩种三、四株，水稻插秧（这在当地也是新事）。都是前人没干过的，引来全郊区的干部到四队参观，开现场会。

六九年秋天，四队一片丰收景象。这年每人吃到五百二十斤口粮（这是上头规定的最高限额），不饿肚子了。多少年来社员头一回买了粮不必欠债了。一结帐，全队收入比头年翻了一番还多，从三万多增加到七万多。可是有人倒不高兴了。那年土豆长得特大，谁见了不喜欢？有人却在地里骂街了：“他妈的，连土豆都给那小子捧臭脚！”胡萝卜把垄台拱开了，鲜红鲜红的，人家又说话了：“拉拉蛄他妈也来凑热闹，那地皮是它给拱起来的！”如果这胡萝卜和土豆是长在当年地主的地里，贫农有这种感情才不奇怪。

副队长孙维森，是孙氏家族土改后的第二代，是个车轴汉子，平时不大说话。心重，谁也交不透，是个不重感情、不讲义气的人。这性格，就和傅贵不一路。他家生活比谁都好，可是老母亲生病想喝点粥，他连点细粮也不舍得给。就凭这一样，傅贵就不能跟他交朋友。但是既然一起共事，就只当没看见、不知道吧。

孙维森要盖房子了。他拆了生产队猪圈的石头作墙基，又用队里的人工和木料。好象这都是理所当然似的。傅贵难办了。他再讲团结，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呀。先看住自己的嘴，别

吐脏字儿，客客气气，说：“维森哪，咱们当领导的，这么办不大好吧？还是别让社员说话……”没等他说完，人家搭话了：“你放心，傅队长。这些东西统统作价，我到时候算帐付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队里的。”果然作价了。会计也真会算，只记了他七十元钱的帐，还不到全部物资、工钱的十分之一呢。可是人家还是对傅贵不高兴了。这人嘴里没说，心上可会记帐着呢。

可是另一类帐，他可就不记了。老孙家的人遇到困难，傅贵借给他们多少回钱？他们那几家娶媳妇，就连孙维森那门亲事，不是傅贵多次奔走出力出钱，就办不成。电着了人，傅贵去嘴对嘴作人工呼吸；死了，他张罗买棺材发送。孩子生不下来了，傅贵的老伴去帮忙，一陪陪上几天几宿。傅贵他就是这么个人，别人一遇到难处，他就心软，什么别扭、疙瘩都忘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感化感化的意思，结果呢？全然无效。

因为他消除不了一个矛盾：这个既成的社会势力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而傅贵又不能不侵犯以致剥夺他们的那些利益。每当发生冲突时，傅贵又抑制不住胸中怒火，那怒火就变成最刺激人的语言，把对方烧伤。

看地的活儿既轻松又有利可图，历来都由老孙家的人包了。就说水稻吧，每当水稻丰收在望时，傅贵都会看到这个场景：老孙家看地的那个人身上挎个大兜子，从一早晨起就到地里捋稻穗，一天下来就是一两麻袋！这不等于公开的抢粮吗？那天，碰到的是孙老九。只见他在稻地里慢悠悠地走着，一边哼着小调儿，一面熟练地捋着稻穗，捋足一把，往兜子里一塞……这事情，傅贵在会上批评、制止过多次了。他匆匆大步走到近前，叫住那个老家伙，质问他，他还顶嘴。这一下把傅贵气急

了，嘴上的岗哨全部撤走，破口大骂起来了：“你这个老王八犊子！老汉奸！你说，你这不是偷盗社员的血汗吗？你一脑子猪屎，什么好思想也塞不进去……你们老孙家呀，叫我怎么说呢，全是他妈土鳖，交人没人交你们这样的！”当场把他捋的全部稻穗和割的几捆马草全给没收了。

为什么没收人家的草呢？因为按规定，看地的人除放水外，还得割去田埂上的杂草，一年两次。老孙家的人舍不得割、也懒得割，非等草成熟了再割，好卖钱。这一割，草籽就掉到地里，明年还要萌发。

收拾完孙老九，还有孙老八呢。这人也是从来不干正经事儿，年年照拿最高分儿。他也是看水稻的。该放水的时候，他摸鱼去了。拿鱼下酒，吃不完还去卖。水稻可就倒霉了。别人看水，一垧地收四五千斤，他看的，就从来没有高产过，也就是两千来斤吧。这一年，他还是照旧。评工分的时候，他才明白，姓傅的是四队历任队长中头一个不听邪的。给他评了个四等分！他是响当当的老孙家的人，能受这个委屈吗！他闹起来了。

傅贵呼地一下子站起来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甩起一条长胳膊，大手直指孙老八的鼻子，把他吓一哆嗦：“你就是皇亲国舅，也得按社会主义的章程办！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食！”

傅贵搞了一个土政策。有些人怕得罪人，有的人由于“阶级地位”的关系，听人喝斥惯了，成了沉默分子，评工分等级的时候不敢说话。他规定：人人都得发言，还得实事求是。违反这一条的，一律不得评为一等。孙老八尝到了这个土政策的“甜头”，心里自是不服，晚上睡不着觉，还跟老伴叨叨不休：“就凭我孙老八，拿他妈四等工分？……”

这些人越是不服，伺机整治傅贵，傅贵在改造四队上千得就越欢越猛；四队越是兴旺，那些人越是想把傅贵整掉。

### 自投罗网，美梦终归破灭

他老是不满足，想把事情干得再大点，钱赚得再多点。那时候生产小队哪有办砖厂的？傅贵就建起来了，还不小，十七个门的砖窑。别人干不成的事，他偏要去试试。大队一连三年派人到岭南开荒，三趟都坐着拖拉机，向后转，说开不成。傅贵到大队去说，我们四队去试试，行不行？他带人去了，选定个靠大道近、附近有人家的地方。一看，都是一人来深的草，用镰刀打，花不起人工。非烧荒不可。这可得有点胆子，烧了山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怎么办呢？傅贵跟开荒队的头头裴月满商量：一是要稳妥。万一出了事，让裴月满去顶着，傅贵好在外头活动解围。西边是苏木河，还有条大道，不怕火烧过去。在东边，割了一条十来米宽的火道。每天晚上，傅贵蹲到草地旁边等东风。等了几天，可把东风等来了！傅贵下令“点火！”风挺硬，火烧得呜呜的，草秆儿七里咔嚓地爆响。每十五米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灭火工具。这场火没成灾，可还是惊动了政府，傅贵费了大劲，作了检讨，才平息下来。要翻地了，人手不够，傅贵就顶一个人上夜班，他坐在拖拉机后边扶犁。草根太粗太深，得拿一只脚使劲踩着犁铧，犁尖才下得去。忽然，傅贵的一只脚被草根给缠住了。拖拉机手听不见他叫，不停车，他的一只脚骨拉错了环。他自己动手，忍痛一扭，踝骨才归了位。第二天，那腿肿得老粗，可是工作还得干，没法儿歇工。就这样，一开就是两年，开出四十垧地，都越境进到桦川县界里头了。种上黄豆，又是一笔收入。

队里上下的呼声，一致要买车。买车，就得花钱，还不光是车钱，这大家也都明白。那些年，说的是“计划经济”，工厂倒是盖了不老少，好些是赔钱货。人们需要什么，那个“计划经济”偏偏不生产什么。农民买个机器配件，请人安装个什么电器，哪样儿不得送礼、请客？精神专家们十多年以后还没闹明白，“精神污染”首先是从物质那儿来的；穷困和匮乏是万恶之源。傅贵一算计，要买车，额外的钱也不能少花。他把困难告诉社员，管委会也讨论了，都说：车是一定要买，多花一两千元钱也认了。

傅贵在台上六年，总共弄来大小拖拉机和汽车十二台。那时候，周围各小队，连个手扶拖拉机也没有。他得费多少气力，走多大门子！没影儿的钱，也化了不老少。他还设计了一种拖车，直到而今，黑通那一带的拖车还是那样子的。四队只留了三台四十马力的拖拉机和一辆汽车，其余都转让给大队和别的小队了。那年头，一台车多要个两千三千的，人家还上赶着买呢，可傅贵一概是按原价收钱。

有一回，从辽阳买了台四十马力的拖拉机，派人去开回来的。真怪，那机器一出来，温度就高。一试车，就爆了一块轴瓦。到大修厂动了手术，半路上还灭火，只好开一段，让火车拉一段，对对付付弄回来了，烧坏了三块轴瓦。撘了一冬，卖给关内了。人家一修，从机油道里掏出一大把棉纱。那个单位还挺认真，党委书记拿着棉纱跑来找傅贵，说肯定是有人破坏！傅贵心里明白，是派去取车那两人搞的鬼。现在那伙人还为这台车的事攻他呢，到处说：“看那傅大头办的漂亮事！化好儿万元买回一个废物！”明摆着呢，目的就是臭他。傅贵把那团棉纱留下了，没有追查。你怎么能查清？他耗不起那份儿精力。

早就有人对傅贵发出警报了。从七十年代开初起，就有不少人听说四队富得快，队长又能干，纷纷从穷县、穷队迁入四队来。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名叫夏成有，不出半年，就看出傅贵是不可多得的能人和好人，同时也看出他处境的险恶。有一天，他乘没人的时候走到傅贵的跟前，悄悄说：

“大叔，我看你是单人匹马一条枪呀。你可千万小心。那些人没安好心，在想法儿收拾你呢。我看他们杀你的心都有，只是不许就是了。你在前边张罗，人家在后头瞄黑枪呢。”

傅贵听了，自然感激，但心情也不免有些黯然。他知道队里的多数人是拥护他的；老孙家那一派人，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那些拥护他的人又是劳动的主力，可就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呀！

他算看透了老孙家这一派人。这些年，农村硬是叫这帮人搞穷的。要是说农村中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那首先就是这伙人！现在，他们又一心盼望着四队越糟越好；糟了，傅贵就丢人现眼了，就非下台不可了。那时候，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往自己家里划拉了，啥活儿不干，日子还过得最好。

明明为人不正，怎么能有恃无恐呢？上边有人哪。大队部，就是他们的后台。

这些人之间，不仅仅有个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首先还是个血缘关系。老孙家哥儿九个，就算一家平均生五个儿女吧，五九四十五。一结婚，这个数就翻番了。可不能小瞧这些年肉体的大量繁殖如何自然而然地壮大了这种社会势力。就在一个四队，这种血缘关系就把孙、宗、李、倪、许等几姓人家纠合到一起了。他们要是决定捧一个人，那人还能上不去？他们要想踩一个人，那人也就起不来了。

坐在黑通大队队部里连任不止的大队支部书记刘少春，是老孙家的外甥女婿，这就是说，“歪头儿一般齐”，那九个大爷都是他舅舅。他还正是那些人最理想的代表人物。你别看他软大哈的，一锥子扎不出一点血来，那正是代理人必备的素质呢，往他耳朵里灌啥，他就听啥信啥。刘少春这人和傅贵碰到一起，也算是天作之合，正好是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反的一对儿。那时傅贵是大队支部委员。每开完一个会，傅贵的感想大体都一样：“又他妈开了一个糊涂会！你本来还不糊涂，倒把你开糊涂了。这刘书记也真行，也不说他今天要突出个啥，解决个啥；赞成个啥，反对个啥。他发言，脑袋一句，屁股一句，嗓门儿还大不了，头五句你还根本听不见，字都在他嗓子眼儿里咕噜咕噜的。就这么个废物。你还得服从他，因为他就是党的领导！”

就是这个刘少春，傅贵在二队受欺、两次被剥夺队长职务，都是他经手干的。在四队，他当然又是站在老孙家一边。可是在他贪占公家财物的事被追究、不及时退赔就可能被拘留的危难时刻，傅贵也曾两次解囊相助，其中一回还是从丈母娘手里骗出来的五百元钱。但是，他还是不说傅贵一句好话。四队他一次也不去，向上边汇报的时候呢，还总要说一句：“傅贵这人，我领导不了。”

这倒也是实话。论精神境界、才智和魄力，两人明显地差一大截子。这样，他们还能不崩吗？果然崩了，还是为一件同傅贵本人毫不相干的事。

那时候上大学，讲究“推荐”。大队支委会讨论过不下四五次，决定推荐女青年田丽华了。后来，又有人拱，说是不对了，于是刘少春几个又没了主意，有点想收回成命，又怕自己

得罪人，就让大家讨论。傅贵起来反对了：“那是咱们讨论多少回决定的嘛，还有什么问题！你支书要改变，自己找上头去说好了，别跟我们研究！”这么一来，会场上竟没人发言了。大眼瞪小眼，小眼白瞪眼，足足闷了五分钟。这五分钟静默，可以说是一场政治哑剧，中国观众中也只有稍谙政治生活情况的人方能明白剧中人的苦衷，他们并不是忘记了台词，而是谁都不肯得罪这一边的人，又同样害怕得罪另一边的人，或者，他们既怕犯肯定一个方案可能造成的错误，又担心犯否定一个方案而可能带来的另一种错误。咱们汉族的语言里，好象很富于反映这种心理状态的词汇，什么“左右为难”啦，“进退不得”啦，“瞻前顾后”啦，“左顾右盼”啦等等。

这个难堪的局面本来是傅贵挑起的，现在又是他第一个感到不耐烦了。他火儿了，站起来冲着会议主席、大队支书刘少春这个全黑通三千多口人中最有身分的人，这九个生产队的最高权威，说了一句很生动但很不得体的话：“我宁肯给好汉牵马坠蹬，也不给赖汉当祖宗！”说罢转身，拂袖而去。

这叫什么话！黑通三十来年的党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场面呢。说这个人“领导不了”还说轻了呢。

不过刘少春也并未发火，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他不爱记仇，只要没人唆使，他也不爱整人。他只不过为傅贵有一天会夺走他这把交椅担心害怕而已。所以，尽管傅贵后来身遭大难他难辞其咎，傅贵还一再说：“刘少春那人，本质还是好的。”

从一九七四年年初起，中国的政治气温急剧升高了。地处遥远北疆的黑通，冬眠的虫类也开始蠕动起来。这时，四队发生一起奇怪的事件：一张贵重的渔网被割碎了。

傅贵看见一些妇女正在用渔网的残骸打绳子，心里一激凌。那是队里花两三千元织的大线网呀。一问，说是于白毛子割碎的。

于白毛子，本名于明伶，是从山东文登来的。父亲是个渔霸，他本人也奸狡成性，劣迹累累，在家乡站不住了，才来到东北。他在四队是打鱼的。他的侄女嫁给了孙维森，这就成了孙家的亲家。

傅贵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割网。那人不慌不忙地说：“我寻思没用了呢。”“这么贵重的东西，我都没权利毁它。你好大的胆子！这事没完！”那于白毛子也怪，笑嘻嘻地，好象胸有成竹，满不在乎，说：“没完就没完。你是队长，谁不知道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傅贵觉着事情有点蹊跷，“他明知道这网是我心爱之物，为什么无缘无故把它割碎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知道做错了，为什么今天又这么硬气呢？平时他在我面前都是挺顺从的呀。”

队委会决定要于白毛子赔偿。傅贵通告他，他又改了口：“赔？为什么让我赔？不是你叫我割的吗？你忘了？——那天刮风，我去你家，你老伴正摊煎饼呢，我还吃了两张呢。我问你这张网没用处了，是不是割掉它算了。你说，割就割了吧。对不对？”还是笑嘻嘻的。这不是欺负人，这不是向他挑衅吗！傅贵心里这个气，没法儿说了。那于白毛子不走，还凑过来，好象非挨他一巴掌不过瘾似的。傅贵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下边又来了第三幕。

那于白毛子干脆罢工，不去打鱼了。他不出工，另外两个人就得闲着。这是什么意思？找他。他大摇大摆走进队部办公室，还拿了一张椅子紧挨着傅贵坐下了。犯得着这么近乎吗？

又有点怪。问他为什么不出工。“打鱼那活儿，我干不了。太累，也睡不好觉。你得给我换个轻点的活儿。”“那你就去割地罢。”“不行。那得哈腰。你得给我找一个不累人、不弯腰，有点权，说话别人得听，还多挣点钱的工作。”这不分明是挑衅吗？傅贵的胳膊有点发痒了，他瞅瞅于白毛子那身跟小鸡差不多的骨架子，心想，我可别把它打散了。强忍愠怒说：“这办不到。咱们队没有那种活。”那家伙还没完，把脸凑过来，歪着脖子死皮赖脸地笑着说：“哪能呢。你不是一队之主吗？你说话不是谁都得乖乖听着吗？你不是……”没等他说完，傅贵站起来，一把手扭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说：“你这是胡搅蛮缠。走，上大队说理去！”那小子本来是等着傅贵打他一巴掌，他好叫呀嚎的，把人们都引来，没想到傅贵没扇他耳雷子。怎么办？急中生智，他一低头，就把傅贵的大拇指咬住不放。傅贵疼痛难忍，举起另一只手朝他扇去，这才松了口。目的达到了，那小子就呼天嚎地叫了起来……

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两人都到大队去申诉。大队支书刘少春照例蔫蔫巴巴，不动声色，象一块等人去揉的面团儿。他连眼皮也不抬，默默听着傅贵诉说案情。擅自割网、无故旷工、无理取闹和咬人等等情节，他似乎都没听进去。听完于白毛子申诉，他也并不公然站到他那一边，而是说：“这事儿，我管不了。你可以上告。大队可以开个介绍信。”

从此，接连两年，于白毛子就告状不止；同时在车中、路上、队里……一切有人的地方发表动人心弦的演说，大造舆论。于是，傅贵在一些人心中的形象就越来越可怕，离恶霸不远了。“欺压、迫害、打击贫下中农”的名声也向四处传开。

从黑通寄出的控告、诬陷傅贵的信件，也越来越多。在副

队长孙维森老丈人家的东屋，一帮人的聚会也越来越频繁了。一拨人还饮酒宣誓结盟，不把傅贵搞垮，誓不罢休；哪个中途退阵，让他不得好死！

应该说句公道话，到一九七五年年末为止，这个活动既没有“四人帮”及其爪牙插手，也没有佳木斯市、区领导介入。这纯粹是一起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由本地土著居民自行倡导的政治活动。这个事实很值得历史学家注意，不要以为上层的“左派”政治野心家和理论家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一点社会基础。

### 在劫难逃，他仍不肯服输

一场大祸临头，傅贵还忙忙呵呵改造村子的布局呢。他跟在拖拉机后边拉线，修建一条笔直、宽阔的道路，把农田切成每四十垧为一方的方田，在道路和耕地的两边栽下一排排杨树。他照例很认真，哪棵树苗低了一点儿，就得重栽；路要平直，树要整齐，得让后人满意呀……

这是公社筹备委员会（那时正在从三河公社分出一个沿江公社，就是黑通大队所属的公社）的一把手张忠仁叫他干的。张忠仁是个为人正直、又有眼力的人，看准了黑通大队的班子非改组不可，最理想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傅贵。

这时，一九七五年冬开入四队的交通局派来的工作队已经把帮助四队买过车的蔡焕庆——绰号蔡胖子拘押起来，肉刑逼供：用炉火烤他，七天七夜轮番搞疲劳审讯，逼他招认贪污罪。蔡胖子始终不招。趁工作队回家过年，他传出一个条子给傅贵，告诉他：他们逼他招认他和傅贵、商业局的白日良科长合伙贪污了一万四千元钱。

这笔款子，是傅贵把多余的拖拉机转卖给邻队收到的款项，准备偿还买机器时欠下的钱的。担心银行扣住此款抵补黑通大队所欠的贷款，傅贵把它暂时存到商业局的名下。商业局的科长白日良正在主持修建招待所，钱不够用，提出他要挪用，至于傅贵那笔债，他可以担过来。

那些日子，傅贵心上的事还不是自己的安全。他总觉着人家蔡胖子为了替四队办事遭了罪，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不能对不起人家。白日良也是给过四队帮助的人。一定得想法儿解脱他们。他就跑到商业局去了。

没想到在白日良的办公室里碰上了工作队里那个姓于的——对蔡胖子逼供信、想借此机会把白日良整掉的就是这个人！傅贵心想，也好，让这小子听听，刺一刺他的良心。他说：“白科长，咱那一万四千元钱是怎么回事呀？”“那还用问吗，我借来修招待所了呗。”“是不是咱俩和蔡胖子把这笔钱私分了呢？”“这是哪儿的话呢！都是为公嘛。不信来查帐！”傅贵拿眼扫了一下那个姓于的，骂开了：“既然是这么回事，怎么有人他妈的说咱们私分了呢？我又不是个干部，在我一个农民身上作文章，整倒我能立个什么功呢！”白日良明白了，接过话头来说：“那可不一定。想升官的人，不踩别人的肩膀头，上得去吗！”傅贵见那姓于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低头夹起帽子溜走，心里好不痛快。

岂不知这个事儿一转眼就变成一个每次运动中惯用的政治术语：“私下串连，订立攻守同盟。”这些想象的产品，又会在另一些人的头脑里制造出一连串新的想象。

此刻，这种政治想象力正在这一片原野上盘桓：当黑通大队的其他小队都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上喘息时，为什么唯独四队兴旺起来了呢？它的收入为什么能够从一九六九年的三万零三

百元猛增到十八万五千元？这是六年前的六倍呀，怎么可能呢？不可思议啊。不搞歪门邪道，能行吗？傅贵的本事，肯定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以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一查，果然有请客送礼，送出去的大米、豆油都是几千斤，这不是明证吗？傅贵出大力、想方设法给生产队捞钱，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自己能不贪不占？肯定是个贪污盗窃分子！

想象力还继续驰骋。金钱既然是罪恶的象征，富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傅贵的企图能够局限在经济上吗？意识形态比吃饭都重要，查查傅贵这方面的问题！可惜他还不会写字，因而没写小说，也没有政治理论著述。这也不难。他不是有个唱评戏的老婆吗？那老婆不是也在家里给人唱过戏，说过书吗？这就行了！什么？她说的唱的是《三国》和《水滸》？不会吧。她就没唱《王二姐思夫》、《桃花庵》和《杨八姐游春》？不可能。写上！——“傅贵贩卖封、资、修黑货，腐蚀社员。他任队长五年，黑书、黑戏唱了五年，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泛滥五年。每天七八十人坐在傅贵家的屋里屋外听书，一次连讲六天六宿。全队七名青少年因听黑书中毒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这才能初步勾出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素描，于是佳木斯郊区也才能创造出一个头号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隆重签发了“拘留证”。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又签发了“逮捕证”。大号铅字印刷，郑重其事地书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条之规定，由本局工作人员×××对傅贵进行拘留（逮捕）”，还写明年、月、日、时，由傅贵签字承认。

可怜那傅贵，他当了二十多年共和国的公民，还不认识那两个“证”上的“证”字呢，很象当年的阿Q，只不过没有认真地在

上面画圈，而是以气愤得发抖的右手写了“傅贵”两个字罢了。

然而这整套程序又有点象滑稽戏。因为早在表演之前很久，签字人已经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从发放“逮捕证”之前一年零三个月加三天起，他就过着和发放该证后两年零两个月完全一样的生活了。再说，就是给他无端捏造的那些罪状，也没有一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以来实施的刑律呀！

整个儿案子，是由市法院院长、“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主办的。因而，尽管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办的案，还是最大限度地依法办事的，比如，事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这就不能说无中生有吧？缺点不过是选择调查对象时总是找对傅贵心怀不满的人罢了。再比如，人家也找了证人，取了证言。这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吗？只不过在个别细节上受到一点干扰罢了，那就是：由于证人提出的证言不符合政治想象家的想象，就把他们关押了一些日子，也不过一个月光景吧。那还包括一点相当费劲的排练时间在内，因为批斗傅贵的大会需要这几个人上台发言，而他们对于别人起草的发言稿老是背错，都差点儿把导演给急疯了。

对于以后案情的发展，傅贵本人应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态度不好”，没有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请看，这就是傅贵在被告席上的“答辩”：

？你有什么罪？

：我没有罪。我当队干部这么多年，向来是秋毫无犯……

？啊哈！你好大口气呀，我查出你十元钱的贪污也要判你的刑！

：我要气死你！我是共产党员，你一分钱的贪污也休想找到！有一元钱贪污，你就判我一年徒刑，十元——十年！

(众起，按脖子，被按者使劲挣扎，大出其汗。一撒手，扑棱一下子又抬起头来。)

？还说你是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都象你这样，共产党就完了！

：共产党员要都象我这样，社会主义还早就好了呢！

？你打没打过人？打过多少？

：打过七八个。

？不对吧，二十多个吧？

：不，七、八个。

？打人对不对？

：不对。可是得看打的是谁。

？往关里送了些什么？有没有请客送礼？

：有。木材，轮胎，木耳什么的，往关里送过。不送，不请客送礼，买不到车。

？这是不是腐蚀干部？

：不是，是干部需要这些玩意儿。大米、豆油什么的，都收了钱和粮票。干部要是买得着、吃得到这些东西，还用我们送？送，人家也不会收。

？旅差费有没有重复报销？

：没有。要是有的话，也是会计侯永禄把我操了。这笔款，我决不承认。每次出差，钱是他拿着，开支是他记，回来上帐是他。这个姓侯的才是真正的贪污分子呢。

？还有什么要说的？

：该说的都说了。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不服。我永远也不会服！我这人上头没有脑膜炎，中间没有心脏病，下头没有连疮腿。你们去好好查一查，我是黑通最干净的人！

干净不干净，也不难查清。三次抄家，搜出和没收的物资计有：旧自行车两辆，旧缝纫机一台，毛毯两条，轴承一套，床单、褥单各一条，布22尺，化纤织品13尺，尼龙衣裤各2件以及人民币40元，黑龙江省粮票91斤。

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有六个全劳力的一家人的全部浮财。按原始社会的标准看，可算是个大财主了。按傅贵个人的劳动能力计算呢，还抵不上他到松花江打几天鱼的收入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正是种大白菜的农忙时节，全郊区农民停止工作，学生停课，市内各行各业的代表也放假一天，总在万人以上，齐集黑通大队的广场，参加对于“贪污盗窃集团主犯”傅贵的批斗大会。

这一天，有几回傅贵的心情特别难过。头一个，给他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可他不知道上面写的那几个大字是什么。问押他的人，不说。问屯口儿上的人，也不愿意告诉他。这大概是傅贵一生中体验文盲之苦最痛切的时刻了。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悄悄告诉了他：“大贪污犯”。傅贵一听，急眼了，说什么也非要摘下那块牌子不可。他还以为写的是“走资派”呢，那多少还体面点儿。他的一番努力当然归于无效。

第二件事，是开会前把他关在马号儿的时候，那个于白毛子过来了，耸着又瘦又尖的肩头，歪着脖子问傅贵：“怎么样，我到底把你弄进笆篱子了吧？啊？哈！”傅贵朝着他“呸”了一声，说：“我到什么时候也比你强！”

第三件，最伤心的，是他在车上听见老伴儿的声音：“看，那个挂牌子的是你爷爷！”他离家的时候，孙子才三个月，现

在长得什么模样了？很想看看，可是有人使劲按着他的头，还把他的头往车上撞……他最怕叫家里人看见的就是这个。

批斗会的主要发言人，是公社书记。发言里充满陈词滥调。只有一段民间诗人创作的顺口溜还引起傅贵一点兴趣：“小吉普，门前站，家里开个大饭店；电风轮，呜呜转，包子馒头大米饭。”意思是傅贵家里经常举办宴席拉拢腐蚀干部吧。傅贵听了，觉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家里的确常常有人来吃饭，那都是到大队来办事的人呀。理应由大队出人出钱招待才是，这些年却常常由傅贵承担下来了。

“这也是罪？”——这将是今后铁窗生涯中时常想起的一个问题：“干好事犯罪，这个国家还好得了？”

最后一个冲击，是四队会计侯永禄上台发言揭发傅贵贪污。傅贵带这姓侯的进关两次，钱和粮票都由这人掌管，回来报销、上帐也都是他办的。也只能如此，因为傅贵基本上是个睁眼瞎呀。报销的大部分单据，都未经傅贵签字盖章，少量盖了章的，他本人也没有过目。现在，这个姓侯的把他自己贪污的款项推到傅贵身上，傅贵就成了贪污、盗窃、接礼受贿五千四百一十二元（这个数儿，加在侯永禄身上倒正合适）的犯罪分子！那侯永禄呢，倒因为认罪态度好和勇于揭发，在大会上说了几句：“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到傅贵的腐蚀，和他遥相呼应（官话没有编好！），对不起党的培养……”之类的假话（主持大会的法院院长竟会认为这是真心诚意的认罪和检讨！），就免于追究，当场释放了！

实际上真正的贪污分子正是这个侯永禄！有帐可查的数目就在四五千元之谱。他是连死人的钱、介绍对象时人家送给对方的“装烟钱”都不放过的。

在这一时刻，傅贵自加入人民公社以来这些年不断遭到的委屈、刁难、诽谤、打击统统汇合到一起，变成一句话，那就是傅贵在撕心裂肺般的心头剧痛中发出的一句无声的呼喊：“天，冤哪！”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听说过“还乡团”没有？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回乡，对土改分田翻身的贫雇农实行反攻倒算的那些地主、恶霸和他们的武装。

想得到吗？在实行土地改革和消灭地主阶级三十来年以后，有一个地方又来了一次反攻倒算，不过这笔帐，可算不到地主头上去了。

傅贵执政期间，把四队那个以大水坑为特征的队部改造成三十五间大砖瓦房。购置了大型拖拉机三台，汽车一辆，还有许多其它机械设备。创办了砖厂，粉房等等。

七间砖房，给摧毁了。新建的砖瓦水泥结构的猪圈，给扒了。粉房也没了。汽车、拖拉机，卖掉了。原来全部机械大、中、小修不必出队，因为仓库里储存着大量机械备件（单是各种轴承，就有上千口），这些东西也丢了不少。

破坏的速度之快，手段之残酷，够得上用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来解释了：“只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充满刻骨仇恨”的人，才能下此毒手。

但是你若按照“仇恨”这个线索和几十年不变的公式到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身上去找，就很难破案了。作案者都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好些还是中共党员，生产队的领袖人物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现实早就在嘲弄“左派”理论家并向他们挑战了，而理论家们却坚决不肯更

新他们的武器。十年以后，我们会看到他们拿出来的仍是五十年代以来那套家什。再一个，嘴里喊着“傅贵把四队弄成了空壳队”、把那个罪人关进大牢的人，自己把四队抢夺一空，变成真正的空壳队，一点不怕历史的惩罚。他们想不到中国人还有理性，有记忆，有人在看着他们，将来会写回忆录。

傅贵的死党，那个夏成有，傅贵入狱，他仍不服输。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小红本儿，他要记帐了。傅贵就没办法记，连个状子都不能写，可见文化这东西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这小子一边记，心里还叨叨咕咕：“这些杂种操的，我非把你们干的事都记下来不可，到时候叫世人看看，到底是傅贵的毛病多，还是你们的毛病多！”他还叮嘱妻子，这个小本子，千万得保存好。可惜，还是丢了。现在，他只能凭他记忆，作为黑通大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向我们口述了：

“砖房，粉房，猪圈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叫老孙家一家和他们的亲戚分了。傅贵从市里费好大劲买来的三十多立米成材和二十多立米水曲柳，破成60板，四六方，原先用铁丝拴在水泥柱上的，都叫孙维森‘借’给九队了。九队的队长许万有，外名叫许花脸子，是他的姑舅哥哥。九队用了一点儿，许万有拿它为儿子盖了三间房，又拿出去卖了一千多元，还剩好些，‘还’给老孙家了。我亲自去看过，我认得出这些木头。属他们那一帮的，全都弄到了木头。孙维森的干将于盼秀，就用从集体建筑上扒下的木料盖起了好几间房子。傅贵靠精耕细作和开垦荒地积累下来的十几万斤粮食，弄没了。粉房里二万五千多斤粉条，叫孙维森给卖了，钱也进了他的腰包。什么油泵，汽泵，电焊机……只要是能卖钱，拆得下，搬得走的，全部给卖了。结果是弄个一干二净！”

“他们这么干，社员还能好好干活呀？都‘放挺儿’（躺倒不干）了。农民没权利说话，写信报纸不给登，罢工和游行又犯法，怎么办？就剩下这么一种表达民意和进行反抗的方式了。到地里，坐下来就抽烟，一抽就是两小时。又用上一九五八年以后那些年的老办法了。”

“那边抢呀偷呀卖呀的，这边不干活，你想还好得了？一年下来，工分（十分）就从一九七五年的一元九角五分降到一角七，你说快不快？我一九七三年是听说四队富，桦南县太穷，迁来的。那一年里，傅贵就添置了一辆载重三吨的白浪河牌汽车，一台大型胶轮拖拉机，一台二十四马力的小胶轮拖拉机。当年决算，每十个工分还分了一元九角五！我去掉全家口粮钱，还净分现款三百九十三元。傅贵蹲笆篱子以后这一年里，队里啥也没买，把东西折腾光，工分倒降到一角七分钱。我那年做了三千多工分，还倒欠队里二百多元。把这两年比上一比，这不成了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了吗？”

消除了篡夺政权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贫下中农重新坐了江山，这就得象历代朝廷一样，孙、石、于、宗四个家族的文武官员，都得论功行赏呀。对于不忠不义，怀有二心的分子，一概拿掉赶走。对孙队长不表忠心的会计张喜为撤职了。妇女队长赵翠蓉不但免了职，她一家几年的口粮也给免了，谁让她父亲跟傅贵那么近乎呢。“后来户”，就是慕四队之富和傅贵之名而从外队、外庄和外县迁来的社员，有的看不惯孙家势力的胡作非为，有的受不了这个穷，有的是经不住打击报复，纷纷离队他去了。剩下两个，抗不住硬压软诱，顺了拐，跳了槽，跟那帮人走一条道了。

唯有夏成有，是个死硬派，就象大字报上写的，是傅贵的

“黑爪牙黑干将，抱大腿死不放！”软硬不吃。他干活，在“打头的”里也是拔尖的；人聪明，有胆量，嘴也硬，怎能不设法招安过来呢？最高领导孙维森礼贤下士，亲自找他谈过多次，最后把底都交了：“那傅贵，已经是佳木斯头号资产阶级分子，是非‘走铜’（枪毙）不可了，你赶紧回头，悬崖勒马，还不为迟。你不是要入党吗？那就得靠拢组织嘛……你说说，傅贵都跟你说过什么……”

夏成有很不礼貌，对“党的领导”也欠尊重，他喊起来了：“傅贵也有毛病，可他是个好人，是条汉子。你不是说‘党’吗？我早看出来，你孙维森跟傅贵不是一个党里的人！……你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我好了，把我整死拉鸡巴倒！让我帮你们整傅贵，休想！”一摔门，走了。

从此，夏成有走到哪儿，连小孩都在背后骂他。这人还就是满不在乎，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专揭老孙家一伙儿见不得人的老底儿，越是有他们的党羽在，还讲的越起劲儿，甚至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是鼠狼之辈，没长好肠子，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你们整傅贵，心毒手狠，早晚有一天要受到报应！”他一个月平均得和那些人干三仗。

傅贵的大儿子小良子，原是司机，车不让开了。割地是个能手，快着呢。这也不行。孙派人物过来了，说：“你他妈还不老实，瞧你这茬子留得多高，走路都能划人卵子了！”全村的人都不敢和小良子说话，只有夏成有陪着他干活儿。

对于“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犯傅贵一家，设了暗岗，监视着呢（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夏成有不管那一套，串门去的更勤了。问他上哪儿去，他说：“我想傅贵了。见不着他，去看看他家属！”

这样儿的，能饶得了他吗！累折腰，卡掉牙，怎么干也没个好。连分白菜、苞米都拣最坏的给他，他也不是好惹的。“这个，我不要！你要不给我换换，我就到你地里扒去！”可是印把子、刀把子都攥在人家手里。上大队告吧，刘少春还坐在支书的交椅上，哼哼哈哈不爱理。大队民兵连长，叫傅贵在二队时的对头李志福当上了，他能不收拾拥护傅贵的人？夏成有再能耐，也斗不赢。

不过他敢说敢斗，也算不易了。黑通大队弄成那个穷样儿，电台还一个劲儿嚷：“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哪个中国人肚子里填不饱的那个空当儿里不在骂？可是有几个人敢走到街上说说呢？好几千人这么个黑通，除了夏成有，就只有一个老头敢说话。那老汉，原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名叫邹化喜。仗着这一条，不怕打右派，专揭阴暗面。常见他喝上两盅酒，趿拉双破鞋，从黑通街的东头走到西头，还故意卷起一条裤腿，露出左腿上的四个枪眼儿，半说半唱地数道起“大好形势”来了。

“‘黑通好’，‘黑通甜’，就是连年不进钱！稻子五个五，谷子六个三（亩产量一、二百斤），（劳动）日值两毛八分钱。一两酒，半盒烟，借钱过个年！”

看他那满脸白胡楂子和一头苍白的卷发，被风吹拂着，醉眼朦胧，似笑非笑，步履蹒跚地走着，好象不是在嘲骂当今，倒象是在说古。他那副模样儿，也有点象半仙之体，不是行走在充满苦难和不幸的尘埃之上，而是与白云仙鹤为伍呢。

然而他说出的不正是长期困扰着黑通的那个黑色的真实

吗？

那是专门写“英雄形象”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屑一顾的。于是，邹化喜留下的这点口头文学就成了真实地反映黑通以至黑龙江那段不算很短的历史的珍贵资料了。

### 一条门缝这么小的空子，他都要利用

他们先把傅贵用卡车拉到佳木斯市一家农机厂，把他关在走廊尽头临时隔起来的小房间里，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这叫“反省”。

这个房间没有窗子，黑咕隆咚的。人伸不直腰——故意把走廊的高度给截短了。它下面是潮湿冰冷的土地，连草都没铺。它的长度和宽度都不足以伸开双腿。比起我们祖宗发明的囚笼来，它体积相当，但不透风、不透亮，因而可以使人更集中精神于反省自己的罪行。为了精神，肉体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就在这么个地方，傅贵的第一个欲望是写信。他不会写字，这半辈子也很少有过写信的需要。现在，他忽然觉得非写一封信不可了。他失去自由后第二次体验了不识字的苦楚。

很快，又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答应了傅贵的请求。两个人站立着，紧贴着门缝。傅贵说一句，那人就着一丝微光吃力地写一句——没有笔，是用一根铁钉子蘸着黑灰写的。吃力，不仅是由于照明条件和文具的恶劣，还因为那写信人也识字不多，看来还从没有写过信或作文之类的东西。这封信还很长。

傅贵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信纸折叠起来，放到鞋底上面。一个姓谢的答应替他转交他家属，却昧着良心把这封信交给工作队了，请功邀赏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封信后来就作为

傅贵的罪证，收在他的案卷里，被标明为：“傅贵给他老婆的串供信”。部分内容如下：

“秀霞：我的身体很好，吃的也很好，一切都很好。请你放心吧。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了解的。我对党是老老实实的干革命。我这一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咱们这人家你也知道的。公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用过和占过。偷鸡捣把（投机倒把）的事我也没有。咱们就不怕。为公的事情，领导会亮节（谅解）的。有几个问题和你说清：

“一，有事去找周大哥说明问题，别拿他当外人。我这封信要求你给周大哥看看。周大哥，您好，我现在反省，对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大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黑通的问题，我是一个党员，按党员的五条要求，第二条必须作到为中国和世界人利益（益），下面有两个问题须要大哥帮助，这个时间我才求求大哥你呀。我想大哥能作到：一、你跟公社领导说，黑通大队的大问题就是把（班）子问题，党员拿心（纳新）的问题。根（跟）领导说千万千万把住关，别叫鸡（机）会主义分子进来。二、我求你给我写二封信，一封市领导，一封区委公社领导。别叫人写，写完后写上我的名，叫长发（按：傅贵的长子，即小良子）去送信，把信亲子（自）送给领导手中，下面我把树才（素材）给你写去，有些事你心里都有的，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一、咱们队的斗争问题……袁井臣他成分地主……压草机、吹风机是他给○（破）坏的，这个问题大队没有官（管），反而叫他去八队，他在咱大队吃双分口粮……袁和尼（倪）家刘家什么关系你都知到（道）的……”

在列举了四队里的一些坏人如何胡来和受到包庇以后，傅贵着重揭发了大队支书刘少春本人的十九个问题，最后写道：

“大哥，这信是我求这里的小孩子写的，大哥你得一条一条的子系（仔细）分西（析），你在写信时一定要写清，别怕马饭（麻烦），这封信你得写出个水平来，我是非常想你大哥的，这些事情你不要怕，一切有我自己付这（负责），共产党员要有五不怕精神……大哥呀，这封信是在小号写的，20号写的，还不一定什么时间你才能看着，收到后马上写出去，这封信用铁丁子划的……再见。”

谁知到头来是白费了劲。这信落到工作队手中。它只起到一个作用：发现傅贵和“周大哥”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在这种关系之上的阴谋活动，比他们迄今想象的还要复杂严重得多！

“周大哥”，本名周谭，原是黑通中心小学校长。请他自己谈谈他和傅贵之间的关系吧。

“傅贵这个人，初见他，印象都不好，有点接近蛮横粗暴，有时出口骂人，简直象野人一样。我和他没有来往。一九七四年寒假，要总结四队的材料，把我抽去了。一进村，我就觉得路子不正——他们大搞副业，拉脚呀做粉条什么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这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树这样的典型。’后来，我逐渐看到了四队的变化了。傅贵没来的时候，这里是房倒屋塌，牛死马亡，种地没种籽，牲口没草料，人呢，连续十三年没开支，年年吃不饱饭！现在呢，也就是五年光景，队部三十五间大瓦房造起来了。几台大拖拉机和汽车买来了。工分日值这一年达到了一元八角三，而过去呢，说是三角几，实际不过一角多。这么好，怎能说错？我发现人们对于傅贵和他的事业，偏见很重。他用科学方法种田，一垭里种四株苞米，都说是‘胡来’，可是一调查，人家确实丰产啦，一垭地收了二万五千斤。我就给公社写了一份三十七页长的材料。

“后来跟傅贵接触频繁了，看到他的优点也就更多了。我们长谈，我们争论。我发现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人也巧，干啥都象个样儿；又敢闯敢干。后来，以老孙家为首的那帮人告他状，闹得越来越凶，而傅贵这小子却越来越硬。那些人说他是‘万字号’的大贪污犯。我一有空就去他家，也向他邻居打听过，家里很穷。那么，他拚命苦干傻干，得罪那么多人，一直到蹲笆篱子，又是图个什么呢？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们越整他、诬陷他，我倒越佩服他、喜欢他了。从此说他什么，我都不动摇；抓起来几年，我对他没失信心……那时候把我也捎带上了，说我是他的‘黑秀才’，‘黑后台’，他的自述和申诉、揭发材料，工作队都说是我给写的。哪有的事呢。把我的公社秘书职务拿掉了。不管他们大会小会怎么叫，反正我不吱声就是了。找我个别谈话，说傅贵是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正是张春桥他们要打的‘土围子’，要我表态。我说：‘现在还没有结论。傅贵还是那个傅贵，党员还是那个党员。’又说我替他喊冤叫屈了。我真不懂：他们是存心这么干，让人都把嘴闭上，或者都说假话，为的是听不见真实情况吗？开万人大会批斗傅贵，让我写批判稿。我不写。我说，我手摔坏了，没法儿动笔。那天还真是跌倒了，不过手并没摔坏，我弄了块布，故意把右手吊了起来……”

干吗引这么多周谭的话呢？为的是给那些办案的人看一看。冤、假、错案并不是不能避免的。不许人讲话是不难的，甚至用不着你下禁令，但最后吃亏的是谁呢？现在我们正在写的是一个差点被整死的傅贵，而在已经和几乎被整死的人中，又有多少个傅贵这样的好人、奇人和能人呢？

引周潭出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傅贵今后的命运里，将要起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那时他有点讲话的自由了。可见，写信和说话的自由，对咱们还是有利的。

### 专他政，他说他上了一次学校

十几天以后，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傅贵被移交到看守所。门是铁的，窗是铁的，脚镣也是铁的。这是一个铁的世界，硬邦邦的，冷冰冰的。

在铁制的门上，有一个六寸见方的洞，它有几种用途：递饭、监视，和必要时命令犯人把头探出去，来一顿猛打——那尺寸正好勉强可以塞出去一个脑袋。平时，这个洞是封闭着的，但外面控制的遮板上，有一条窄窄的玻璃。它能够称作窗子吗？人创造窗子，是为了向外看世界的，这一条玻璃，却是为了向里头看，为了监视犯人，彻底阻断他们同外界之间的联系。那一条玻璃外面，又遮上一块黑布。这是某个聪明人的发明，一是为了不使犯人看见外边的一切动静，也是为了便于突然袭击——监视者已经站在那里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一秒钟之内他就能掀开帘子，你们就傻眼了。又有一位聪明人想出个更巧妙的主意：用香烟头在那块黑布上烧一个小小的眼儿，这样无须掀动帘子，就能洞察一切了。里面的人呢，也就更难察觉外头是不是有人在监视他们了。

这样，十几双至三十几双（视“号儿”里犯人的多少）眼睛，就必须随时盯着那个小小的窟窿眼儿，以免祸从天降。可惜这新发明也自有它的缺陷：只要那眼儿亮着，就可以断定外面没人监视了。它一变黑，就是有可怕的眼睛出现了。至今还没人发明出使管教人员的脑袋变得透明，遮不住光线的办法，

而由于太穷，一时还使不起电视来监视犯人。

人是多么软弱啊，当他一旦失去自由的时候！按看守所的规定，每天早八时至晚八时，犯人（其实还全都没有定罪和判刑）都必须席地盘腿面壁而坐；头部下垂，双目对地；双手后放，握到一起。这是某位所长发明出来的一种被认为最有利于“反省”的姿势。

上述一切，其实都是理论上的东西。在实际中，人又不是那么软弱无能的东西了。

只须举出一个事例。烟瘾难熬，怎么办呢？新进来的犯人，烟也给搜走了。衣袋里还有些撒落的烟末，不是集腋可以成裘吗？这就不难创造出一支香烟来。还有更奇巧的招儿呢。管教人员吸烟，不免把烟头儿扔到门外。那玩意儿比自由天地中的一条“大中华”还更有吸引力！可是一道森严的铁门，隔开两个世界，怎么办呢？还是难不住万物之灵。首先得研究出从里面拨开门洞儿外那块遮板上的办法。成了，再从衣服被褥上抽下线来捻成一根细绳，把它拴在一个搪瓷茶杯上。摸准管教人员巡视的规律，在最保险的一刻间，赶快在茶杯底下涂上一层牙膏，从洞儿中伸出手，往下一放，就把那烟头儿给粘起来弄到手了。如是反复数次，便可卷成一根烟卷儿，轮流吸上一口，过过瘾。

巡视者往返一次，总要几个小时，这便是犯人们可以进行谨慎的或不谨慎的自由活动的了。

只有一个人，严格遵守所规，每天静坐不止。到宣布释放的时候，这人瘫了。

傅贵很气，很急。他不懂：怎么这么多年，他们还不明白

我这个人呢？他傅贵打从小儿就一件坏事儿也没做过；公家的钱一分也没沾过，这还查不明白呀？让他特别恼火和不服的，是把别人干的坏事儿都扣到他头上来了。贪污分子明明是侯永禄嘛。重用和包庇坏人的明明是刘少春他们一伙儿呀。连窖里烂掉的二十万斤大白菜和岭南毁了的小麦也算到他的帐上来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队里“反省”了，还紧急组织人抢救了白菜，入了窖，嘱咐孙维森管，可他一次不翻，烂了；他还两次派人去岭南抢割小麦，可是那时候人家已经不听他的了，不去，有什么办法？

越想越觉着冤枉和窝囊。他傅贵这四十二年，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大欺负？他是个好惹的人？至于在钱上，出力气上，别人看是吃亏的事，倒有过不少。可那是他心甘情愿的，要不怎叫他“傅大头”呢！除了那一百零三次批斗，他在谁面前低下过头？他在谁手里输过败过低三下四过？

他还很天真，以为只要他披心沥胆，尽量表白自己，上头就会相信，明白他是好人了。他还不知道，五十年代以来很多好人在运动中犯过这个痴心妄想的错误。他找来“号儿”里那唯一的一根圆珠笔芯，请挨着他睡的赵松林替他写了一份类似誓言的东西，上书：“我傅贵没有任何问题。领导怀疑，只管调查。若有违法行为，尽管从重判处——有十元钱贪污就枪毙我，我死而无怨。上边的话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的，法律上有效。此致敬礼！傅贵。”他还嫌不够庄重，拿圆珠笔芯在手指头上涂了老半天，想按个手印，可是，使多大劲，抹多少唾沫也印不上。誓言是交上去了，效果呢？不但是零，还把“态度”的罪给加重了。

傅贵还以为快了，该放他出去了。铁门一响，就当是放他

的人来了。先是盼明天，接着是盼下一个礼拜，然后就盼下一个月了。

倒是盼来了家里传来的密信。是用红笔写在衣服折进去的边儿上的。傅贵和赵松林费了好大的劲，晚上蒙到被窝里，辨认那几个字是什么。闹明白了，原来是“老老实实，注意身体”八个字。若是在家，傅贵肯定得发一场大脾气，因为他以为能给他捎来点有关案情进展的情报呢。那才是他需要的东西。

不过过后一想，老伴为什么冒着风险送来那八个字呢？那是因为家里老小知道他的脾气，怕他想不通，又在狱里惹大祸；或者着急上火，死在里头呀。这么一想，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又从心里一直涌到眼睛里来。这些年，他对秀霞也是太欠体贴了。在外边有点不痛快，回来常在她身上发泄。很少给她好脸子。明明知道她枕边的劝说是出自好心（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呀），还要骂人家；人家说对了，甚至他也照办了，也从来没说句人话，表示一点感谢或安慰的意思。现在进了笆篱子，不是秀霞说中了吗？这些往事，傅贵越想越不好受，临睡时赵松林问他家里情况，他只说了一句：“你嫂子前不久又叫我打了，伤还不知道好没好呢。”

第二天傅贵一想，也对，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死。这么着死了，一家人不清不白。“还有，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帮人还不得拍巴掌杀喜猪呀？他们休想！我在这里头得把身体养得好好儿的，进来多少斤，出去多少斤。哼，来吧，咱们这场戏还早着呢，没完！”

不但不能死，人还不能熊，精神上不能趴下。虽说蹲笆篱子，成了犯人，可是心里没病，无愧于人，还是得“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皮”。

他现在是另一个小小世界的居民了，这里需要他管的事还真不少，自然而然情绪也就转过来了。

在监狱里，吃，是一个大问题。一天两顿饭一斤粮，吃不饱。

不管什么时候，越是饿，大家一哄而上，傅贵越是谦让。也不光在吃的问题上。你看他不是那么粗那么野性的一个人吗，又没受过教育，可是在街上走怕碰着人，看电影也老想着“可别挡着别人”，乘汽车的时候生怕挤着别人。他打老早就讲文明礼貌了。

在这号儿里头，地位高低、人格优劣之别是不被承认的。但是暴力却起着作用。一些弱者，需要傅贵的保护。他不能允许人熊人。赵松林是第一个被保护人。因火灾而被捕的木材厂的支部书记，又是一个被保护人。

一个名叫徐礼的警察，因为“吃票儿”（警察吃小偷的赃物）被抓进来，还吼儿哈地耀武扬威——也难怪，他连那身民警制服都没脱呢。他横踢马槽，老说“我是好人”，可是又随意欺负别人，连管教都不敢惹他。傅贵上去了。两人比武多次，饭盆子和碗都飞了起来，直到那小子脑袋上出现不少鸡蛋形突起物，才算老实一点。管教见他挨揍也解恨，所以也不来过问。

在这里，傅贵才看到，原来中国还有许多他在黑通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在“文革”以前，只要大街上有个被游街的，或是广播里报道个什么坏人，傅贵就恨得直咬牙根，心想：“这小子真坏，该枪毙！”这回自己也进笆篱子了，一瞧，不大一样了。有些人，错事也有，可是水分太大。就说躺在他旁边的这个赵松林吧，

他倒真是跟一两个女的相好了，这不对。可是非逼他承认强奸了一个女知青不可。那是没有的事呀。只因那时正抓强奸女知青的事，这样才能判刑。人家那女的已经结了婚，夫妇感情挺好。赵松林顶不住逼供信，招认了，现在后悔得了不得。傅贵批评他：“你这不是把人家那女的也给埋汰了吗！”他连个行李也没有，傅贵把自己一个很大的狗皮褥子给他了。

也有既令他同情，又叫他佩服的。老张头父子就是。他家老三张万志偷了自行车，却把四个独立家庭的全部成年男人都给抓进监狱。多大的罪？给人带上脚镣子！父亲张景福很硬气，动不动就以头撞墙喊冤。儿子张万生也很坚强，常喊口号，当面斥骂不法办案人员张殿五。公安局那个张殿五还得意地狞笑着说：“我还没把你们家人全抓来，留个送手纸的，好大面子呢！”

就是这个张殿五，对张家父子、女婿用尽了刑讯逼供、诱供和精神折磨的手段。傅贵被监禁期间遇到几起无辜错案，都是这个张殿五作预审员用同样手段办的。关上几年，又蔫咕咚地放了。张氏父子，判过一次二十年、十年、五年徒刑，都在大街上张贴出来了。后来放的时候，又说没那么判过。但还说人家有罪，判个同监禁时期差不多的刑期，就算“刑满释放”了。

还有个叫王凤林的，当过兵，又到供销社当工人。一看就是老实人。硬说是杀人犯，夫妇双双被抓了进来，还给带了双镣！关了很长时间，也是蔫咕咚给放了。

张殿五是什么人？他为了强占人家房子，把绰号“张大姑娘”一个未婚女人硬给赶了出来，现在还在街上疯疯癫癫跑着呢，孩子也不知下落了。一个疯子跑进松花江，他还开了三枪，把人毙了。凭什么把刀把子放到这种人手里？报纸上还不

许登，说是怕败坏公安队伍的声誉！

“不该给人赔礼道歉吗？”傅贵愤愤地想，“办案的人就不该负一点责任？你抓人家，打人家，按着人家脑袋游街的时候，不是搞得挺生动活泼吗？怎么放的时候就一点声势也没有了呢？我看，就该让公安局和法院的办案人上广播电台、上电视台公开认错，让他们也露露脸。严重的，也判他刑！”

上大学，为期四年。傅贵蹲了三年半笆篱子，他觉得好象上了一次政法大学。现在回头看，从前他看见的社会和思索的问题有多窄！“无产阶级专政”，原来也和农村里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和“阶级路线”一样，很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呢。

这都是“四人帮”倒台以前的事，倒台以后，该变了吧？傅贵等着，看着。

没有多大动静。一个变化，是叫他出去劳动了。看守所当局看中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农活经验。先让他带人去拉石头，后来就叫他种菜和管蔬菜储藏。他干的还真不赖。三垧菜地、两个菜窖都管理得挺好。大白菜出窖的时候跟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傅贵受到了公开表扬。

到大墙外头工作，自由多了。也没人看着，傅贵要是想跑，也很方便。可是他跑什么呢？一跑倒亏了。老伴和孩子要来见他，也很方便，因为傅贵又和附近的一个老李头交了朋友，在他家跟老伴幽会都行。他好了，不忘铁门里的难友，帮助捎个信、传个话什么的是常事。傅贵不抽烟，还惦记着那些烟鬼，有一回摘了一捆黄烟，从窗户外头扔进去了。嗨，那些人就别提多高兴了。

但是傅贵可没有乐不思蜀。申诉信前后写了十一封了，咋

老没个信儿呢？他就常找看守所的领导去叫冤。人家烦了，就训他，他比人家还硬，喊起来了：“冤就是冤，屈就是屈！我就是有，怎么着？你给我平了反，我不就不叫了吗！”“你这还了得，……关他号儿！”警察过来了，走吧。人家还真不在乎，还得来几句：“关号咋的？上你这儿来不就是蹲笆篱子的吗？也不是来住宾馆的嘛！”就这么进去了。

可是架不住看守所还真找不着第二个人才。过几个月，又放出来了。自由了几个月，他又叫冤，又顶撞了，没说的，又关号儿了。关就关，到马号儿里把行李卷儿一夹，又进去会老战友了。就这么着，反反复复，四进四出，简直成了走城門了。

### 身在牢房，还筹划东山再起

看透了一时平不了反，再加上“四人帮”又垮了台，傅贵就另作打算了。睡在旁边的赵松林常见他拿支画笔在纸上划拉，精神还挺集中的，探头一看，人家在那儿画渔网呢。他觉得挺好笑。问他，说是要把七星网改造一下，快研究成了。多咱能出去，出不出得去还不知道呢，他倒在计划打鱼了。他对明水用的、冰下用的、冬夏两用的三种不同类型渔网，都作了重新设计。那些日子，傅贵说话很少，他又生活在脚踹波涛、风雨江上的回忆和幻想之中了。过些天，赵松林又见傅贵在那儿画房子了。这回画得更细。怪呀，他这能有啥用呢？一问，说是他出去以后，要盖八间瓦房，里头带洗澡间的。傅贵让他猜猜那座房子上的尖屋顶是干什么用的。“放点东西呗。”“不对。我要养鸡。这块地方能养下五百只鸡。一只鸡一年就算它下二百到二百二十个蛋吧，一个蛋卖一毛五，你算算是多少钱！”

他得设计个活动的梯子，平时藏起来，别让外人知道。屋顶养鸡，不但可以保密，还能防疫呢，因为在高处，同别人的鸡隔离了。五百只鸡我拿一百只鸡下的蛋卖给收购站，能换回好些糠。把发票存着，有人问，给他看：这不是，我的鸡下的蛋都卖给公家了嘛！上地里撵草籽也能顶饲料，一个礼拜就能撵好些。老伴儿小时候作过小买卖，隔三岔五让她到市场上卖蛋……

光养鸡行吗？那哪能过瘾！还得养猪、养羊。“你把鸡粪晾干，放上一一年，然后一粉碎，和酒糟掺在一起发酵，猪可爱吃了！”一说这些，他就象介绍一种名菜的烹调方法那么津津有味。还得养奶牛！家畜里，傅贵对奶牛特别有感情，是因为他童年见到大群牛在草原上、蓝天下悠然倘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吗？还是它弹响了傅贵心里那根经济弦呢？——吃草，省事，“象个机器似的到时候就给你造出一桶一桶的奶来……就是这玩意儿个头儿太大，屋顶上肯定是放不下了，放到别处也不好隐藏。”想到这处，傅贵不免又要叹一口气。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了，前几天报纸上还在讨论能不能养羊呢。听说省里的大干部还在限制，一家不许超过三只。傅贵就是不明白，那么大的干部了，怎么就是这么怕富呢？好象老百姓一富，就要变心，和共产党、社会主义打离婚似的！他们就是不怕老百姓穷，你说怪不怪！这种领导干部，看见自己管下的百姓挨饿受冻，就不脸红？

“我出去以后，要是再用我，让我当干部，我干不干呢？”自问自答：“干！”图的是什么呢？“要让那些人看一看，我傅贵这些年是真的，咱是真心要让社员过上好日子。还有，能不跟那些王八蛋斗一斗吗？能眼看着他们继续喝老百姓的血？没门

儿！……要是斗败了呢？那也没啥，无非再蹲一回笆篱子呗。这滋味也尝过了，不是说‘体验生活’吗？咱也体验过来了，也没啥。”

一九七八年以后，傅贵听早晨的广播特别认真。看守所不大放，他就伸长了耳朵听和平大队的喇叭。那半个钟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一天早晨，正在听联播节目，一个青年刑事犯老是哼哼呀呀的，说他不听，让傅贵揍了几撇子才老实。他要听中央的政策。他盼着出来一个人，真能把那一套不得人心的作法给扭过来。这就得真体察民情，不是抱住那些空话大话不放，还得说了能算数的。听到邓小平同志出来，他高兴了好几天。这回，他比较放心了。接下来，他就着手设计改造黑通的蓝图。

他早想过而且在实践中证明过了，专门务农不行。要想使黑通大富，还得搞砖厂。这回得搞个大的。十几孔的不行。二十孔、三十孔的也不行。有原料，有销路，为什么不可劲儿往大搞呢？……原来四队那个砖厂，不仅是小，还有毛病。砖难烧透，看来非改造那烟道不可……

想得差不多了，他就动起笔来，画黑通大队未来这个大砖厂的草图了。黑通那么穷，建厂资金打哪儿来呢？这个，傅贵也在心底盘算了。他那个精神头儿，就好象明天早晨沿江公社有个会等着他，让他就黑通大队的规划作一个发言似的。

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隔墙的杨树，已经探出头来吐绿了。砖厂的设计已经完工，连一年出砖多少、每块砖成本低、工作人员的收入问题都想过几遍了，可是他的案子仍然没有一点动静。他傅贵已经在狱中度过三个春节了。算来这已是第四个春天，怎能不叫人心急呢？这案情到底有多复杂？“就

是一个间谍特务，也该查清了！”傅贵悻悻地想道，“听说一年半以前，我的五条罪状就全查清推翻了。准是整我的那些王八犊子越整越虚，定不上罪，又不甘心认输，也害怕认输。是嘛，他们又不是不了解我傅贵。无缘无故关了我一千多天了，我能不要求他们说上个一二三来？”

五月间，听说又要过堂了，傅贵想，应该再写一份状子，专告那个市法院院长，市“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大队长。“我的案子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凭什么放走了货真价实的贪污分子侯永禄，硬把我打成大贪污分子？……三中全会开过了，这回审我的，兴许是一个忠臣。前十一封信一概没起作用，费了牛劲写的，算我倒霉。这一回，我看有点希望。”

提审那天，傅贵把那封信揣到兜儿里，出庭了。进屋一看，挺面熟啊，还是他——法院刑庭庭长刘××。朝代虽然变了，人还没换。也罢，没准儿人家思想变了呢？傅贵还是把信交上去了。那刘××接过信来，打开一看，立时炸了：“啊？你告谁？你告院长？谁是谁的内弟？”（信中揭发1976年当时的市二轻局副局长宁某人是侯永禄的姐夫，而工作队里有一些二轻局的人，法院院长又和宁是老同事，故此包庇了侯永禄）。结果不欢而散，傅贵很是懊恼：这封信又白搭了。回看守所的第三天，又把他关了号儿。

### 他出狱了，却还留了个尾巴

傅贵不知道，他原先发出的十一封信并没有完全白搭。给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李本成的一封信，还是辗转送到了他的手中。李本成当即作了批示，让法院认真复查此案，倘情节确如申诉信中所写，应予平反。刘××此次提审，可能就是这个人

批示的结果。

这时，傅贵一案的具体办案人也换了，现在是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的老司法工作者刘勇。这是他脱离法院工作二十二年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他接过傅贵那两本厚厚的、沉甸甸的卷宗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当年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实事求是，为三句没问题的话整了我二十多年。这回办别人的案，我得仔细，认真，千万别把好人冤枉了。”——刘勇想道。这部案卷，他从头到尾足足看了一个星期，一次审讯笔录和一个证言也不轻易放过。他发现本人口供、起诉书和证言三者对不上号儿，而且出入很大，必须重新复查，才能搞清。为了工作时间不受司机的限制，他和陪同工作的孙国亮同志放弃汽车，以自行车代步。黑通离市中心虽然不过二十几里，但由于道路失修，坑坑洼洼，骑车要颠颠簸簸走一个小时。由那里再去西斗沟子，还要骑车走四小时的山路，坡急路陡，土石路面，很吃力。

他们多日辛苦调查的结果，反映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案件处理审批表》上，那上写着：“基层党委意见”：“支部认为该同志是个好干部，个性强，有生产经验。”“群众意见和要求”：“要求回队领导生产。”在“承办人意见”一项中，办案人刘勇写道：“按惩治贪污条例第八条衡量，傅贵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是个农民。这些年郊区生产队干部外出为公办事，开支都是实报实销。傅贵担任生产队小队长期间，工作积极肯干、为集体办事多花了旅费，并未采取贪污的手段与方法，又没造成什么后果。可不予处分，无罪释放。”

但是两个月以后，傅贵被释放时拿到的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写的却是：“本院认为：傅贵担任农村生产小队长期

间虽然为集体事业做了些工作，但由于名利思想的促使，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挥霍浪费集体财物……问题被发现后态度不好，经教育后有所认识。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傅贵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

二、收缴进口手表一块……

贪污的是什么呢？“被告于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次公出，利用职权多报补助费，贪污一百八十六元二角四分……”

第一句话就错了，公出不是三次，而是两次。第二句，办案人在“审批表”上认为无贪污罪，为什么判决时又成了贪污呢？

我向市法院刑事庭庭长、现法院副院长刘××同志请教。这才知道，定为一百八十六元贪污，已经是很“宽大”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傅贵夹着他的行李卷，走出看守所大门。他丧失了三年半人身自由，得来的是一纸定他为贪污分子的判决书。这张纸的意义在于：人家抓他对了，放他也对。

那个判决书，傅贵本不愿签字的。他要上诉。可是这几年他听说的多了，头一个，一上诉就得一、二年人家才审理（好象咱们国家机关又不是人浮于事了，都忙得不亦乐乎，连写封回信的工夫都腾不出来！）。算了，还是先出去吧。带个尾巴就暂时带着吧。有几个放出去不带尾巴的？那尹胖子尹国忠，想当初，嗨，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哪，胶鞋厂的（盗窃）“万鞋事件”嘛。关了他妈五年，尹胖子又不是盗窃分子了，怎么办？嗨，不难，说他搞了两个破鞋！还是有罪，抓得应当，放

得有理嘛。不过不是胶鞋了，是破鞋！你上哪儿说理去！——忍了吧。“民不与官争”嘛。他让人替他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下面写上了中国文字中他会写的那仅有的两个字。

他还应该知足，应该感到庆幸呢，因为照“习惯法”，人家看你在判决前坐牢多久，依照那个时间给你量个刑，那就完全可以判他三年半徒刑了。

老伴儿刘秀霞特意租来一辆小轿车，接丈夫出狱。你不是不给平反吗？我们自己来平平反。咱们这三年半笆篱子就白蹲了？也得扬个眉，吐个气，让人们瞧瞧，我们傅贵是个好人，还是一个无愧于乘小轿车的好人呢！

### 第三章 秉性难移

那年中秋节，全家人四年来头次团聚了。孩子们都长高了老大一截。老大高高兴兴说：“今天咱们可得圆圆月了！”没想到这句话把母亲给说哭了，因为有一句老话：“家缺一人月缺半。”她想起“月缺半”那几年流的眼泪了。

#### 可谓“复辟”，却难说是什么主义

傅贵这些天也有些感伤，可为的都是别的。一回来，到村中四处走走，一眼就看见了村当中那两个大坑！真是“山河依旧”啊。为这两个坑，当年他跟刘少春叨叨过多少回！那坑是社员们取土打坯什么挖的。就不能指定个村外什么地方？越挖越大，一个足有三亩见方了。几年不见，那两个坑又大了不少。“这就是黑通的穷窟窿！是他们执政多年政绩的展览。等着别人来填呢！”——傅贵心情沉重地想道。到四队看看，简直成

了一片废墟。傅贵在村中伫立良久，思绪起伏，感慨不已：我六年的心血哪里去了？我那青石水泥地面的队部砖房呢？没了。我那小工厂一般的仓库呢？空了。我那砖瓦结构的猪圈呢？没了。我那财源滚滚的粉坊呢？没了。还有，那些上好的木料、砖瓦，那些我为它们蹲了三年多笆篱子的汽车和拖拉机呢？统统没了！房倒屋塌，家底儿精光，还外欠六十万元饥荒！——傅贵心痛不已，气愤地想道：“抓我关我，一条罪名还说是我把四队搞成了‘空壳队’！现在倒真成个空壳了！”怎么造成的呢？就是那帮人，在他们治下，除了自己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划拉以外，那套人马也是一样——“打更的睡觉，喂马的偷料，保管员监守自盗”！

黑通这时候穷到什么份儿上，得看这年的年是怎么过的。新上任的沿江公社党委书记刘广才由公社秘书周谭（就是傅贵称为“周大哥”的）陪着，春节前夕带上一千九百元去访贫问苦。不到两小时，两条街没走完，钱没了。赶忙打发人回去取。那一天总共付出了四千多元钱，九千多斤面粉和三百多斤猪肉，才算让全大队的人过年都吃上一顿饺子。那天看到的惨象，刘广才一辈子也忘不了。到了董真家一看，窗子上钉着一张塑料布——那是中国极北地区的三九寒天哪，炕上没有炕席，和对面屋两家共使一个耳锅，还连碗筷都没有！又到徐玉琢家看看，爷儿俩连床被子都没有，全部家财就是两个盆子和两双筷子。这家人懒是懒点，可是他们为什么懒呢？不懒的人又怎么样呢？四队有个小陈，是个有名的勤劳人，到分配的时候也得倒贴。全大队80%的人欠债。

就这，还得“年初五死个驴，不好也得说好”。“四人帮”时代说“大好形势”，那是胡吹；“四人帮”一倒，形势又“大好”

了。

再看那以十五年不倒的“太平官”刘少春为代表、年年报喜不报忧的大队政权，现在又是什么状况呢？中国农民的忍耐，也有个尽头。它的表现就是：继长期“放挺儿”（怠工）之后，现在更进一步，大队党支部说话都没人听了。人称“不喝酒不干活儿，一喝酒就仰瞌儿（卧倒睡觉）”的大队副书记范某，还是一天到晚醉眼朦胧，叼个“木什多克”（烟斗），一开会就说：“……这可是上边的精神。不讲，是我们的问题，反正我们是讲了，至于听还是不听，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他就知道他讲了也没用，人家照旧不听。总之，已经到了政令不行，政权瘫痪的程度了。

那么请问，诸公是否可以下台让贤，把那几张椅子腾一腾呢？那得看让给什么人。人家早就说定了：“你就是一块铁疙瘩，我要用你，也能让你放光；你就是一块纯金真玉，我不想用你，也要就地理你三尺，让你永世休想发亮！”

一句话，人家这个朝廷是坐定了。让位，可以，得交给“自己人”，哪怕是一个铁疙瘩脑袋呢！

一九七七年刘广才到沿江公社就任党委书记那时候，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就对他说：“黑通大队这样下去，我看没个好儿。那班子非换不可了，还越快越好。选人的时候要掌握一条：要使龙，别使熊！”

黑通这地方，熊倒是不缺，可就是难找一条龙，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李杰还催过，批评过。无奈各个层次上刘少春式人物多年执政的结果，好象硬是把龙给绝了种。

再说傅贵，从监狱一回来，他就在家织起渔网来，就象他决心以捕鱼了此一生了似的。心里头呢，还不住想着黑通的事。

这些王八蛋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就这么穷下去了？一想到这儿，他那网就有点织不下去了。

但再一想，刘某人还给我留了个“贪污分子”的尾巴，连党籍还没着落呢。算啦，谁能用你！

可是真就到了非用他不可的时候了。

李杰书记从上边催黑通大队换马，从下边社员群众的呼声也早就叫个不停了。公社书记刘广才急得不行。可是黑通这么个重轭，谁能驾得了呢？秘书周谭把傅贵推荐给刘广才，说只有这个人堪当重任。刘广才对傅贵已有所闻，见面一谈，印象很深，心里说：这人脑瓜子果然不简单，是能干大事情的人。拿到公社党委会上一讨论，问题来了。头一条，此人问题还未查清，再来个胡吹乱卷，打骂群众，老毛病重犯可咋办？也有人说，咱们怕摆弄不了，他骄傲得很，目空一切，来个横踢马槽，把大队班子给踢黄了可怎么办？前后讨论了七八次。公社党委委员七人，赞成起用傅贵的只有书记刘广才一个。算上秘书周谭（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呢），也不过一票半。一征求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更是一致反对，好象傅贵一来，这个班子就非黄不可。

郊区书记李杰，这时表了个态：傅贵是无罪释放的，可以到群众里调查调查，只要群众拥护，这人可以用。刘广才说：“我刚来，还得观察观察。”李杰说：“还观察什么！我都观察十几年了。”他早就认为这个人应该起用了。一九七四年他就在四队主持过一次现场会，见过傅贵，也看过他种的一垅四株的大苞米，觉得这人是个人才。后来听说他在监狱里表现挺坚强，也曾暗自佩服；因为“文革”那时候，有些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一被打倒，还告罪求饶流大鼻涕呢。那时候他就想过：“这小

子是个硬汉子。打游击的话，我非用他不可！”傅贵没放的时候，他就去找过市法院隋院长，打听他的案情，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年底，又是一年一度“碾子响，换队长”的时候了，黑通开了个社员代表大会。傅贵尚未出场，他的身影已笼罩了大会。会下，慷慨激昂的指责和窃窃私语的议论，主题常常就是傅贵。会场和住地内外，极力排除傅贵的串连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刘广才和周谭都有点担心傅贵可能落选。没想到六十七名代表，选举结果傅贵竟得票五十七张；十三个候选人中名列第二！傅贵当上了黑通大队的第一副大队长，第三次登上了中国这个农村的政治舞台。可是这时候傅贵本人还不知道呢。

傅贵纯粹是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的那场扫遍中国大地的春风给刮到那个台子上去的。可是话说回来了，傅贵若是躺倒不干呢？那风再大，能吹得动吗？十四年来二上二下，加上三年多笆篱子，罪遭得还不够咋的？何苦再扯这个呢？带上那张渔网，自自在在闯荡江湖，既省心，又安全，比什么不强？

可惜咱们没机会听那冬天傅贵的巡回演讲。不过即使没听，也能猜到一点他为什么非出山不可。只须知道：他在九个小队连续讲了九场。每场三个小时。昏暗的灯光和迷蒙的烟雾，本来就催人欲睡，加上多年来催人入睡的演讲家也实在太多，这就使人养成了这种一进会场就打哈欠的习惯。需要相当强大的魅力，才能把人拽住，不打瞌睡。傅贵这些次演讲，听众没一个人溜号或者睡觉的。他不用讲稿，没有提纲（有了也白搭，看

不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傅贵平时说话，嗓门儿就比人家作报告还大，到真作起报告来，就可想而知了。九场下来，他说不出话来了。讲的是什么呢？题目是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内容呢，还少得了他本人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的决心和施政纲领吗？光靠嗓门大，睡着了也把你震醒，那是不行的。透过他的话，人们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开始了，起码是瞎吹、穷批、胡斗、乱整要稍停一段时间了。这些年不都是叫这几个字搞穷的吗？傅贵的形象象一员武将，他的经历，他贯注到语言里的强烈感情，都跟人们已经熟悉了十几年的那个刘少春形成一个对比。有人说这人天塌了他能托起来，地若是有个把儿他能提起来。就算这是夸张，但他为了干成一件事可以豁出命去，倒真是不假。而现在他要办的事，是让黑通富起来。这穷日子还熬得下去吗？黑通需要的，就是这么个人！

这里得附加一笔，不然就有拔高傅贵的危险。上任之前，他向公社书记刘广才请了个假，说是“这几年蹲笆篱子，家里欠下很多饥荒，得想法儿还还。”他带上大儿子和在笆篱子里设计的三星网（一般只能捕小鱼，他改造的这种，可以同时捕大鱼）上同江县去了。过二十天，爷俩儿回来了。打了五千来斤鱼，送人一千多斤，还卖了三千多元，还清了债。傅贵这才走马上任。

可见，傅贵并不是没有私心的。

### 执意发财，不怕新帐老帐一起算

大队部已经好几冬没有煤烧了。那个冷清和晦气，倒和大队的财政状况以及人们的心情很配套。傅贵十二月末上班那天，

当年的分配方案还没拿出来呢。外债欠了五十四万元，“三角债”(私人欠队，队欠国家)四十四万元。上次李杰来，向他汇报说九个队里有三个队今年分配得“倒找”——平均一个劳动力每天倒找两角钱！（这也算是一个创造，一种奇迹，还给经济学家出了一个难题：不是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吗？那么几百个大活人一年三百多天干下来，怎么非但一无所得，反倒要掏腰包为自己的劳动贴钱呢？多少年来，年年如此，还找不到一个人负责，没有一个人为此写《忏悔录》，就象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似的！）李杰说：“不行，今年说什么也不能再倒找了。照这样，不干活的不是倒占便宜了吗？今年先由大队贴，明年争取一个好年成再补上这个窟窿。”大队按这个方针把帐整平，算下来每十个工分可以分到两分钱，相当于黑市上一斤粮票价格的十五分之一。口粮呢，一人三百来斤皮粮。一个种菜的大队，春节包饺子连白菜都供不上！

这天开会研究一九八〇年怎么办？怎么扭转这个局面？傅贵新来乍到，本该听听老手儿的高见。可是老手儿只顾叭嗒叭嗒抽烟，都很谦虚，让他说。说就说！

光靠务农行不行？不行，学大寨把人坑苦了。这点大家是一致的。可是慢着，咱们还是得算算帐，好让心中有个数。“种地，那是一本死帐，”这帐，傅贵在笆篱子里不知道算过多少回了，“地那玩意儿，它也不长个儿，老是那么大。就算上纲要，一垧苞米也就打六千斤，一斤打它一毛吧，才不过六百块钱。八百垧地，才八十万元。还得去掉种子、化肥、农药呢？还得提留呢？能拿来分配的，有二十万元也就不错了。三千人，人均才六十多元，低标准吧？这点钱活不下去。专种地是不行了。办工业呢？咱们能干的不来钱，来钱的咱们又干不了；投

资大，缺技术。”

大队办了翻砂厂，赔钱。办了机械加工厂，还是赔钱。都有关掉，马上关掉。那么怎么办呢？

“一定要办个砖厂，还得干它个大的！”傅贵来劲了。想了好几年，就等着这一天呢。“头一个，它不愁没原料，土和沙咱们有的是。再一个，不愁没销路。光说咱们大队，土屋都得拆，将来都得盖砖房。还有佳木斯呢？现在人住的多挤，都快转不过身来了。按咱们现在的政策，不得大盖其房？听说没有？咱们黑龙江还到外省买砖去呢，真是笑话！”

傅贵见有的听众嘴角上露出了讥讽的意思，眼睛倒还笑着。别人也半信半疑，象听神话似的。他明白，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题：你说得倒挺动听，可是钱呢？大队欠一屁股饥荒，你还扯什么建厂，还要干大个儿的呢！

“资金，我有办法。放心。这个砖厂的生产规模呢，一年一千万块，盈利五十万元。”

这个数儿，把人吓住了。今年大队总收入才六十二万八。一千万块砖？这小子又吹了！

大队长朱自修这时说了话：“我看这砖厂得交给傅贵办。只要是傅贵办，这一千万块砖不但能完成，我看还得超额呢！”

傅贵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呀。分明是讥讽嘛。这个茬儿能不接吗？他说：“不信就看一看嘛。这厂长，就由我来当。到年底我要是生产不出一千万块砖，你掰掉我这个手指盖儿！”

也不怪别人不信。傅贵在干事的雄心和能力上比他周围这些人高一大截儿，所以他提出个什么，总是叫人吓一跳，说他吹，说他狂。另有一点，也是相差一截儿：他设想个什么东西，都是经过计算的。今天在座的诸位，假大空，他们熟悉，也能

接受，自己就干了多年嘛。真大实，倒没见过。岂不知傅贵心里那本帐几乎都翻烂了：建砖厂得用多少钱，钱从哪儿来，有多少把握？先干哪项，后干哪项？砖机能力，人工多少，一天可产多少坯？去掉冰冻季节，一年能生产多少天？还得把下雨的天气刨出去……多少个数字，不能动笔，全靠心算，又全得储存在他那个圆周60厘米的土电脑里。容易吗？所以难怪人家一讽刺，一说他吹牛，他就发火，觉得冤枉了自己。自这次会议以后，他还发过两次誓：“不信，你砍掉我手指头！”“你砍掉我这只手！”都是听到群众中有人说他“吹大牛”的时候说的。

大队干部巴不得让傅贵当这个砖厂的厂长，——谁愿意去受那个累和冒那个风险哪？傅贵本人呢，也巴不得当厂长，原因很简单：别人干，他还不放心呢。这是难得的一次双方满意。

傅贵精心遴选出几个人担任未来工厂的领导职务。开完首次“厂部”会议，傅贵说：“明天咱们去定定地点吧。”那天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大家扛着家伙，就向新厂址进发了。那是傅贵相中的地方：有土岗，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到了一看，地面冰冻一米八。得看土层深浅哪，不刨开冰冻层能行？举起洋镐就刨。好不容易把冻块儿揭开了，一钻探，土层还可以，可是地势洼，电源远，交通条件也差。明天接着干！那天刮起“烟儿泡”来了，对面不见人，站立都困难。傅贵得拽着他那顶狐狸帽子，歪着脖子顶风走。又刨了一处。把一个车间的地址定下来了。一连五六天，傅贵领着一伙儿人，在那片荒野上绘制砖厂的蓝图。他先说，大家定：“砖机摆在这儿，行不行？”“这块儿作坯场，怎么样？”办公室放在那儿，车库、卫生所、食堂怎么安置，都定下来了。

可是钱呢？建厂资金到这时候还没着落呢。

先到银行试试贷款。找人民银行的熟人顾科长。他说这事儿现在归农业银行管，“黑通人，秦×在那儿呢，正好他管贷款，那还不好办！”傅贵笑了，秦×是造反派，老孙家的亲戚，当年在四队一直整他，便对老顾说：“他管贷款呀？那得了，一分钱也不行。”顾科长还说：“不至于吧，他还找我办事呢。”“不信你就试试。我看是‘二条不叫二条，两说着’，别人行，我就不行。”老顾真去了。一提傅贵，那秦×把嘴一咧，说：“我说二哥呀，你咋扯这个呢！跟姓傅的扯还有个好儿？他纯粹是扯王八犊子。他今年要是能出一块砖，你就把我这个秦字儿倒着写！”“我担个保，行不行呢？”“不行。”这就把姓顾的弄得出不来进不去了。回来见傅贵，忍不住噗哧一笑：还真叫他说中了。

傅贵本来就没把主要希望放在这上。转身他就去找老“关系”。

他跑到第二建筑公司，找张科长，问他今年需要多少砖，告诉他黑通大队的砖厂（还连个影儿也没有呢）可以供应多少，请他们预付订款，他按时按质交货。妥了，五万元到手了。又去跑一建、住宅公司和铁路。一概用这种“指山卖磨”的办法筹集了十七万元钱。砖，是热门货；交情也起了作用，跟傅贵不错的人，愿意帮他争口气。他又想起第二砖厂欠黑通大队翻砂厂三万多元钱，一直在扯皮。而那个砖厂正好有台制砖机准备出售。“不好把帐‘抹’一下吗？”傅贵想。一办，果然成了。

建窑的资金还是不够。傅贵把自己从前为盖房子烧的一万块大砖（一块顶三块）捐了出来，又向社员借了十五六万块砖，先干起来，同时用四队原先那个旧窑烧了些砖。

建筑队伍也不用化现钱，从几个生产队凑起了九十多人。能有几个技工？顶多是个土瓦匠，也就是盘个炕、抹个房、搭

个墙的，够得上二级工的也就是三两个人。两个打头的，也得全由傅贵摆布，其中一个半拉瓦匠，也就是看过别人建窑，可是脑瓜儿爱钻，懂点图纸，能照葫芦画瓢。就这样，一九八〇年正月初七，三十六个门的大砖窑破土动工了。傅贵的一大半时间钉在工地上，其余时间还得继续跑钱跑料。他既是工程总指挥，又是工程师，施工员，会计师，还兼着个供应科长。大队那边，他还管着全大队的农业生产。真够他忙呵的。这么忙呵着，他脑袋还不闲着，不住地在那个窑身上打主意。为了省煤，把砖烧透，他放大了烟道。又想，为什么一般砖窑建成后那四个角都慢慢崩缝了呢？哦，因为填充的土里有水份，一着热就膨胀，把窑墙给撑裂了。多难看。再说，那四个角不用，也是浪费。这么着，干脆用上它，在四角各建一间房，从远处看，象个塔楼、堡垒似的，又好看，工人冬天也有个避风和休息的地方，既美观又实用，多好。改！二月动工，五月，制砖机开动了。到七月，嗨，红砖上市了！第一窑砖能这么快，还因为傅贵在烧窑工艺上来了个革新。一般大窑，建成后先得烤窑，得用好多木柴烧呀烧，把窑身烤干。傅贵想：“为什么非烤不可？一边烧砖一边烤就不行？”别人没这么干过。可是前人没干过的事情太多了。不烤窑了，直接烧！

大队的摇钱树，就这么栽起来了，当年就结了果儿。一九八〇年大队总收入达到一百四十万元，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一倍半。人均收入从四十四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多元，主要靠这个砖厂。

天不作美，这一年本来生产了一千一百五十万砖坯，烧出一千万块砖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十月一日突降一场大雪，铁路、公路阻断，高压线压断，而砖厂未作准备，把坯棚全打开了，

一下子毁了二三百万块砖坯。再造坯，天气已不允许了。眼看傅贵许下的诺言要告吹。急中生智：拉砂子去！一家伙就补过来了。砖厂全年收入仍然达到了五十万元。

## 建 纪 念 碑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这两年里，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的无声的辩论还没有结束。一些偏爱好看、好听而不计较是否好吃的人，好象仍然看不见辽阔的三江平原黑得冒油的沃土为什么喂不饱为数不多的居民这个问题。“口粮田”（一种生产责任制）还是禁品。羊身上有多少资本主义？还是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佳木斯市，也还有人主张全部砍掉社办企业。

傅贵是在这个时候为医治穷黑通而第三次站起来的，这就难免使人为他、也为自己担心。他会直接或间接听到社员这样的议论：

“傅贵这小子，捞钱是真能捞，可是整不好咱们也许就跟他进了‘小号儿’。”

“‘小号儿’他蹲是蹲了，可不是又放出来了吗？”

“放是放出来了，不是还留着个尾巴吗？”

有时候，他就得来说两句：“放心。万一政策变了，我个人蹲笆篱子，绝不会连累你们。”

话说到了一九八〇年年底，又是“碾子响，换队长；杀年猪，选支书”的时候了。这回开会有点特别，党员来得特别踊跃。老党员来得最早，孙增海，那个当年把五队治理得很好的人，现在六十三岁了，半身不遂刚好点，今天头一个来了。八十五岁的老隋头儿，也拄着拐杖来了。

这次支部改选，提出五个候选人，出席党员二十八人，傅贵得票二十七张！他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黑通大队支部的书记。

大家请傅贵发表讲话。望着下边几十张皱皱巴巴的脸（多少年不发展党员了，所以大部分是五十开外的人）和一双双友善的、寄予期望的眼睛，他现在心里的千思万绪都化为一个念头：这些善良忠厚、不怕吃苦的人，在这块黑得象煤炭一样肥沃的土地上为什么要受穷呢？为什么还迟迟不能摆脱挨饿受冻的日子呢？从今往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

他说起他的打算。黑通的潜力大着呢，现在有了好政策，他相信变化会很快。今年这一年，不过是个小小的开头。今年人均收入一百四，还是太少了。要达到一千元！不要叫这个数儿吓住。五口之家，一年收入五千，还不算家庭副业，这比城里老高的高级干部都高一截是不是？可是只要干，不出几年咱们还真能做得到！五年之内，还得让大家都住进砖瓦房……

他说到黑通的“八大怪”，八大爷。说是“群众惹不了，干部管不了，警察抓不了”，他们真就那么邪乎？今后试试看，咱还就硬是要治治这个邪！一切不劳而食、侵吞别人劳动果实和骑到人们头上称王称霸的，都得叫他们规规矩矩，服服帖帖。

他最后提出三句话：一年摘帽（穷队的帽子），二年伸腰，三年拔高！

他的讲话，有四五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好几个老人过来跟他握手，好象是道谢，又象是鼓励，其实在那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里，还有些别的东西，比如：庆幸那漫长的“白受累、白搭工、辛苦一年还受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就在春节前夕，电灯亮了，喇叭响了，电磨转了。怎么过去会没有电的呢？因为大队欠人家一千四百元电费，叫人给停了电。社员晚上摸黑，白天得跑到别的大队去磨面。这笔债还了，才重见光明。

这年春节前夕，傅贵去慰问贫困户，都说今年过年面也有了，肉也有了。不少人，给钱不要。傅贵说：“不管咋的，还是穷！”分送一千多元救济款，傅贵的眉头总是拧着，好象一肚子怨气。他是有点怨：这些年是怎么搞的！可是他心里主要还是急。

傅贵从监狱一出来，就跑到学校去看了看。校舍四面是水，教室里非常潮湿。地上堆着些土坯和砖块儿。连整砖都很少！学生们面对面坐着，大概是为了节省“桌子”吧？光线很暗，准得都变成近视眼！傅贵不由得一阵心酸。“这还叫个学校？还不如我小时候上过五十三天学的那个教室呢！”傅贵吃了几十年当文盲的苦，他不明白，为什么就舍不得几个钱用到教育上去？他想起蹲笆篱子的时候老伴儿传来个密信儿也得找别人看的苦楚。这些孩子也许不需要蹲笆篱子了，可是恋爱总得谈吧？难道那时候还得请别人给念情书不成？

他一直记着这个教室的形象、气氛和他当时的心情。没办法，大队没钱哪，等等吧。

不到三年，一九八二年，他把这问题提出来了。造个三层楼的小学，建筑面积一千八百六十平方米……

朱大队长就没听说过农村有盖三层楼的，还是个学校！这回说话了：“这么大，搁啥盖呀？钱呢？料呢？还有技术呢？”

傅贵讲清财和物的来源，技术也有办法，他可以请双鸭山退休的老师傅来指导。

“你是一把手，你说干，你就干去！这时候盖学校，扯蛋的事，这得多少钱呀？”

傅贵说：“我说干，就能干。这么着吧，你不用管，由我来。”

一百天，三层楼的学校起来了！十月一日剪彩的时候，市长都来了。城建局的人说，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佳木斯市建筑史上所没有的。

明亮、宽敞的教室里，是一排排固定在水泥地上的铁木桌椅。傅贵建造什么，都喜欢搞得坚固，牢靠，耐久。砖厂的坯棚，别处都是木柱、草棚，他呢，弄成水泥柱和石棉瓦顶的。村里的厕所，也是保险一百年塌不了。大家还注意到教室里有一个新鲜玩意儿：教室前方，离黑板不远的地方，墙上设有电插销。这也是文盲傅贵的主意：得为将来的电化视听教学作准备呀。

可是有些事就是客人们看不到的了。施工时秩序井然，地上连块碎砖头儿都看不见。一天也没窝过工。建筑物是内外一齐施工，砌二层楼时，一层室内已在抹墙、安装桌椅和暖气了。

总指挥加施工员，还是傅贵。他少睡了多少小时觉，也是在建筑物上看不出来的。就从这座学校的出现起，傅贵同朱大队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因为对傅贵的每一句褒扬，都刺痛一些人的自尊心。大队和公社里，还都有这种人在。

其实，朱大队长的自尊心应该说已经得到超量的满足了。这么多年，他是市劳动模范，哪年那朵大红花都由他戴（那还是一床绸子被面呢）；“创业有功，成绩卓著”的金匾和五百元奖金也是他的；市里“光荣榜”上挂着的也是他的大照片。这个

朱自修是一员福将。在五队，他是接孙长海的班当队长出了名的；真正创业的是人家孙长海。朱自修会武功，为了一点小事，他把“打头的”杨喜利的一条腿打折了，没人追究他的责任。要不是那年四队把傅贵送进大牢，黑通可就显不出五队的朱自修来了。这三条，都是他的福气。想不到，傅贵又从“笆篱子”里出来了！政策也变了，傅贵这种人也吃香了。不然，大队支书就准得他老朱来担当。他的福气在一九八〇年上断了脉，主管四千人的大权叫那小子弄走了！朱自修怎能不觉得象叫人冷不丁地夺了权一样痛苦呢？按说，比劳苦，比本事，比贡献，感到不平的本该是傅贵。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偏偏是干啥啥不行、啥事也不干的朱某人反而感到他受了委屈，他的自尊心发疼了。

### 铁腕人物，这可不一定是褒词

早晨醒来的时候时针若是指着在四点上，傅贵就会浑身一激凌：“糟糕，起晚了！”晚上呢，十点钟以前没躺下过。在十一点到三点钟之间，大队支书也并不全是在睡觉。

一个星期里，至少有两个晚上他得起来，出去巡视一番。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不那么“相信群众”，后人也许可以原谅吧。比如，他走到九队，见打更的睡觉了。天亮时，打发人把这人叫来，问他：“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值班，守夜呀。”“你照照镜子去！”一照，没话了，原来有人在他脸上画了一个小王八。

更不放心的是砖厂。他踏着月光走去，躲在暗处观察。然后走到明处，故意转上一圈，让大伙儿知道，偷懒是不保险的。

问题也就出在他的这种过于认真上。一天深夜，他看见往车上抬坯板的人把一板砖坯扔到地上了。他还以为是失手呢。可是那小子又扔掉一板！傅贵压着心头怒火，心想：“看他还作践多少！”那人竟接连扔掉六板砖坯，一板是十九块，他毁了一百多块！傅贵几步快跑，站到那人跟前，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嘴里说着：“你是中国人吗！你给自己家干活儿也这样吗！”可是临到砖厂领导要罚这个人款的时候，傅贵心又软了，说：“他家六七口人，还得过日子呢。”

为了打人，他吃过多少亏！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继他之后担任砖厂厂长的夏成有，当年在四队保他有功，该算是他的亲信了，可是也照样叫他训得鼻涕眼泪的好几回。学校工程由于砖厂供砖失时而停工待料那天，他也免不了挨傅贵一耳刮子。傅贵的“干部路线”是不用亲友。用夏成有，是因为他人正，人能，但是傅贵的方针是：“你不是跟我不错吗？那你就得比别人干得更好。想找点俏活，胡搞八搞什么的，没门儿！”

每见人干活哄弄事儿，把好好的庄稼、树木或建筑材料糟蹋了，平时在傅贵胸中平稳地跳动着的火苗，这时便立即爆发为一片烈火，燃遍他全身。当年，他制服难以负担的重载、难以驾驭的烈马和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劳累时养成的那种对自己和对自然的狠劲，那种使他敢于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野性，这时就不听从他理性的制约了，立时迸发出来，转化为暴力——在那一瞬间，他本人和他那双长长的胳膊就成了那种力量的工具。这种力量是六亲不认的。二儿子不听家教，赌钱了。那天晚上，傅贵把铁砂子装进火枪枪膛——就象俄国的伊万雷帝杀子时一样，狂怒战胜了他心中的一切。

这毛病改起来很难，很费劲。先是学会了事后赔礼道歉，然后才学会了控制住自己。

难怪在让不让傅贵担任副大队长和支部书记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反对的一方论据之一就是：那小子上台，对过去反对他的人能不打击报复？报复起来能不下狠茬子？

傅贵若是记仇，他头一个收拾的就该是前任黑通大队支书刘少春。听刘少春说说吧：

“我从大队下来，公社让我管了一个时期工厂，也叫我整黄了。老傅主动找我说：‘回去吧。这么多年，你在黑通没有功劳还没个苦劳？这么大岁数了，老跑也不是个事儿。’让我当保管员了，挺好的。这人心胸大。我以为他回来得把这些人整一下，没有。一般人可做不到。老孙家的人整傅贵都整红眼了。现在傅贵对他们好，也不相信了。”

各生产队原先的队长，都是刘少春的人。这些人走一个队败一个队，没一个给他争气的，还老不下台。现在下台了，怎么处理？咱们不知道傅贵是不是有一个赎买政策，反正一个都给安排了新差使。吕××，吃喝嫖赌，还欠生产队“三角债”五千多元。傅贵让他去当大粪队队长了，这回再想吃喝是困难了，可大小还算是个队长。三队前队长钱××，派他去打更，是个闲差。那个杜×，运动一来就夹着个小本专门整人的，这回用了他另一种专长，让他当大队兽医去了。总之，各得其所。

是不是一概宽大呢？也不。“八大爷”里头有两个大爷还闹呢。这个邪，能不治吗？

秦才，人称秦二爷，是秦家兄弟四人（都不是好点的蜡）中的一个。二十年的电工了，是当地的电霸。傅贵一当大队支书，

就接到群众的检举信：“大队党支部能不能管管老爷电工秦才？可把我们整苦了。我家房子盖上二年了，还没点上电灯呢。不请他喝酒，就是不给接电！”“党支部：秦才这个电老爷，能不能拿下来换换？说卡就卡，我们一家人就得摸黑……”

大队的粉房，从前秦才吃粉条随便拿。烧柴，磨米磨面，吃豆腐、豆油，也一概免费。一九八一年，粉房包给个人了。也不是没给他粉条，就是没敞开供应就是了。秦才掏出钳子就把人家四根高压线给掐断了。人家去报案，还以为是有谁破坏呢。秦才也来了，还装模作样地说这案情得分析分析。傅贵对秦才麻搭着脸说：“还分析什么？这案子好破。靠你一个人就能破，交给你了！”秦才还想争辩，傅贵说：“你说黑通老百姓谁有这大胆子？你说黑通有谁懂这个，能掐高压线？我看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把有的人供的、惯的，粉条少给几斤就不行了。不就是这个吗？——秦才你说？”后来他只得悄悄给接上了。他们兄弟几个都在七队分粮分菜。那年白菜长得不好，有些没心的。他跟队长说他要挑点。队长说，等给社员分完了再给你弄点。当天他就把七队的电给掐了，说是“安得不合乎规定，于防火不利。”队上喂马都没个亮儿了。傅贵找秦才来质问，他还反诘说：“电跑了火谁负责？”傅贵说：“都由你负责！不合乎，也是你安的。你安了二十年了，怎么那时候合乎，到分菜的时候就不合乎了呢？”大队有上百户被他掐过电。今天掐了，明天请他喝一顿，又接上了。就是这些酒，把他灌成个酒疯子。不喝正适度，一喝就醉了。

这回修建学校大楼，一个电闸正好在校门的位置上，必须挪动。校墙也完工了，那边变电亭也造好了，他光说来，可就是不动弹。傅贵把他找来，录音机往桌上一放，谈判开始了。

“知道我找你干啥吧？”“知道。”“知道就好。快两年了，那电闸早就叫你挪。到底能不能挪？”“玩意儿不全。”“缺什么玩意儿？”“没线卡子。”“那是多大东西？有多难整？怎么两年还整不来呢？你说一句：到底能不能挪？”“我不能干了！”“你再说一句！是这工程不能干，还是电工不干了？”“这电工我不干了。”“好，这可是你说的，听明白没有？”叭，关上了录音机。傅贵从小队抽了两个懂点行的人，把电闸挪了。

从此，秦才就一天到晚宣传黑通怎么黑。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他喝醉酒，在黑通街上从东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来回走，嘴里喊着：“操他妈的，昨天晚上我别着斧子找傅大官人去了，找他没找着！我还得到大队找他去，我跟他没完！”傅贵听人说他腰里真别着把斧子来了，出去一看，没人。告诉民兵，他再到大队闹，就把他绑起来。那秦才听说傅贵下茬子了，他也不来了。有一天他没醉，和傅贵碰上了，傅贵说：“以后你再喝醉酒，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我明白对你说，再闹我可就要收拾你！你不是人称‘黑通一根棍’吗？我要撅折的就是你这根棍儿！”

过了很久，秦才的媳妇到傅贵家来了，说：“大哥，现在秦才挺后悔的。全家人都说他呀，他醒过腔来了。上我家去吧，你们哥儿俩喝点酒交换交换……”傅贵去了，一进门，那秦才就放声哭了。鼻涕眼泪地说：“大哥，你说这黑通我服谁呀？我这秦二爷是出了名的。我心思是拿你一把，吓唬一下子，没想到吓不住，拿不了。这两年算算帐，我少挣好几千块钱哪，后悔死了……”傅贵一看一听，这是真心话。他就怕别人软，再一听人说真心话，不管多大的火儿，心就软了。他说：“冲你说这话，这杯酒我也能喝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秦才你说，打

我执政起算，我哪一点对不起你？……”老伴儿也插嘴了：“孩子也说他呀，这个死玩意儿！喝点酒就要酒疯。那赵××老来，一来就喝酒，就说道你……”这时秦才也杀了回马枪，说赵××如何如何。傅贵喝罢杯中酒，站起来说：“那好，明天你就来上班。你可不要以为是我傅贵惧你秦二爷。有毛病，能怨你自己不怨我就好……可是不能让你管全大队的电了，把南砖厂交给你管好不好？”“那敢情好。想不到的事。大哥，以后你让我咋干我咋干！”

那些天，正赶上南砖厂安装电，那秦才干起来还真出力。他还跟别人讲：“别人谁敢说我不？只有老傅，别看他说我，我不生气。”

### 威严的政治信号，又来和经济打架

同我们国家的通讯条件相比，在谣言的传播速度方面，咱们是可以自豪的。咱们平均多少人才有一部电话？私用长途电话和电报至今还属于奢侈品，所以神经衰弱的人一接到那玩意儿就可能受不起它的惊吓：“别是老爷子(或老太太)出事了吧？”是不是咱们人口稠密、时间充裕、好奇心盛这三条弥补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不足呢？反正我在佳木斯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听到很多有关傅贵的传闻。几乎每一个走进我房间的陌生客人都能带来一两条消息：“傅贵欠银行的贷款有一百多万元呢。”“他那个大队富的富，穷的穷，有人都上吊了。”“傅贵还搞破鞋呢。”

后来我人都到了二百里外的双鸭山，还有一位思想并不保守的同志告诉我：“什么人喜欢傅贵？地主富农。”

高潮是在去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一开始，合江地区

联营公司一位经理在职工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的时候就 说：“那傅贵，不是就因为有问题没交代，给抓起来了吗！”

这才是解开谣言传播速度之谜的关键所在，在咱们国家，什么事情不依靠组织和领导是很难开展的。那些当年整过、抓过傅贵的人，那些不相信三中全会以来政策“长得了”的人，以及黑通以老孙家为首的那股势力在佳木斯市各级机关中的三亲六故，怎能不密切关心傅贵的命运呢？一九八二年春天，在这些人的想象中，连支持傅贵的人都面临垮台的边缘了，说是“傅贵抓起来了，李杰吓跑了，刘广才吓蔫了。”

追根究源，傅贵本人也要负相当责任。他老是把事情办得太大，叫人一听就吃惊，一看就眼晕。怎么一个务农的社员收入都赶上十四五级的干部了呢？黑通三年新盖的砖房、新增加的居住面积，就相当于城里平均每人住宅面积了。佳木斯通向黑通的路至今坑坑洼洼，黑通却铺建了四千多米的砂石路！大拖拉机、小拖拉机和拖车增加了两倍，还买了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中型脱粒机和十五个大油罐。除了两家砖厂，还办起了锹把厂、白铁厂、冰棍厂……大队的公共积累三年翻了三番。这不是跟变戏法儿一样吗！准是有点鬼名堂！钱一定不是好来的！

那阵子，不断有人到傅贵家来。有的是看看虚实，有的是来慰问又一次遭难的家属的。多的时候，一天达到八起。

这就难怪，傅贵也有点毛了。一九八〇年首次报道傅贵（《用了一个人，富了一个屯》）的作者陈恩复和李洪仁一来，他就问：“上边的政策变了没有？变的时候，千万打个电话来，你们消息灵通。”后来谣言越来越盛，省报记者采访三次，报上迟迟不见文章。他感觉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象，就对陈恩复说：

“你看，整我的人上下里外都有，我还有个好儿吗？……老弟，你得支我一杆子呀！”意思是希望在报纸上再给他来一篇报道。

可是他并没灰心。老伴儿的“见好儿就收吧”的规劝也没起作用。不过他还是不能不准备一手儿。首先，对全队社员的广播讲话，他每次都事先录下音来，放上一遍听听，涂涂改改，再听听，“可别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然后才拿去放。不能说一句错话，这玩意儿本来就难，可是别看傅贵是个大老粗，他还挺讲究独立思考，不愿意炒冷饭，连语言都得是他自己的，这不就更容易犯错误了？对于政策可能变，他早就有了提防。建房，从砖瓦砂石木料到窗子上的挂钩儿，全部单据都保留起来，为“永久和牢靠”起见，还找来一个大炮筒子，小心收到里头。他叫这是“防变天帐”。就差准备炸药了——邻县一个农民盖了个两层楼的猪圈，施工时就备好放炸药的地方，一旦政策变了，就炸它个片瓦不留，“销赃灭迹”。

“黑通穷那么多年，也没人舆论，”傅贵暗自纳闷儿，“怎么才富这么一点儿，就老是舆论我，没完没了呢？超过别人就不行？好事只能少干，干多干大了不行？”越想越气，干脆大声对自己发表起声明来了：“我就不信那一套；不信中国人生来就是受穷的命！你不是舆论吗？我还是照样干。无非是再进一回笆篱子吧？咱们体验过那生活，没啥了不起。”

有一次，他还真对后事作了安排，和老伴儿研究过他被捕后一家人生活怎么办。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周文华上任不久，便特地到黑通大队来，肯定了傅贵的经验。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始终坚定地支持傅贵，多次劝说沿江公社的有些干部，对傅贵要一支二帮。他本人也不断鼓励傅贵，批评他的缺点和错

处。一九八二年秋后，合江地委书记兼专员孟传生还到黑通大队住了一个星期，系统地总结了那里的经验，向全地区作了介绍。

傅贵是并不孤独的。他幸运，因为他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雄心勃勃，可是得提防有人下绊子

象一些省、市、县的党政一把手一样，傅贵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没有想事的时间。尽管命运使他节省了读书看报的时间，还是没有工夫坐到一个地方想想问题。时间这东西若是能调拨一下多好！不是有好多人躺在沙发上发愁没法儿打发时间吗？能出钱买一点来用用也好。

于是，走路便成了他能够专心想点事情仅有的机会了。他老是低着头走路。迎面来人向他打个招呼，他赶忙抬头应一声，连那人是谁都没闹清。俗话说“仰头老婆低头汉”是难以对付的人，但傅贵的心计却是任何人都不必提防的。

上天把他写字的时间也替他节约下来了。他便在地上写——把头脑中设想、分析和计算好的事情，直接变成地上的作物、建筑或人的组织。这倒象从美国引进了电脑办公室，完全节省了纸张！

要建个温室。也得搞永久性的，砖瓦、钢筋结构，三角铁扣玻璃，不必年年维修。别处都用火墙取暖，他用暖气。专家说不行，可实践证明温度均匀而持恒，比老办法强得多。

砖厂运坯的车子，别处用的多是人推车，他用四轮小拖拉机。亲自设计，一车能放三十二板，每车一趟就运六百多块砖坯。原设计砖机一次切坯十七块，他一鼓捣，变成十九块了。

这是技术。他想得更多的是制度，是想什么办法把人身上的潜力最大限度挖出来。砖厂他搞了一整套的承包和严密的定额管理。你在砖厂就找不到一个人有闲工夫。按各种工种，有的工种还按不同季节规定了不同的报酬。他的砖厂规模跟国营第四砖厂一般大，可是第四砖厂用三百六十个工人，他只用一百八十人；第四砖厂管理干部用了三十六人，他只用五人。每烧一万块砖，他只用煤一吨，这也是佳木斯的最佳纪录。

一九八一年，当许多地方在把生产队分小的时候，他却在筹划并队了。为了便于搞大规模的专业化，他把九个生产队并成四个，分别搞粮食、蔬菜和养殖。收入悬殊怎么办？头一个，他办砖厂时已把农业的三费（水电、机耕的费用和大队干部工资）负担起来；再一个，他采取以高价收购方式由大队补贴粮食队的办法，使四个队得到平衡。

傅贵的目光始终向着未来。他想得很多，唯有一件事他却想得最少：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填充那些十几年来恨他、整他、陷害他的那些人和那种社会势力掏出来的那个大窟窿！从大处看，这几年，他为那些人偿还了二十来万元外债。从小处看，那些人不仅把他十几年前建造的那个好端端的砖厂破坏掉了，至今那死于非命的砖厂还欠着外边一些单位十万元钱和几万块砖呢。原先的付砖员是刘文山，卖几千万块砖一块也不带少的。老孙家把他拿下来了，换上了孙维林。他一年付二百万块砖，就少了三十万块，全拿去换羊和卖钱了。

傅贵没工夫感伤。眼前的烦恼就够分心的了。

“什么事，计划、张罗都是我一个人。你朱自修，身为大队长，却在一旁看热闹，反过来又说我骄傲。几年了，两个新砖

厂建成了，外边的人都来参观，可大队长就没留下过一个脚印！温室嘛，倒是去了一趟，是挑毛病去了。这黑通大队，要是有一个厕所是你朱队长出了主意或是出了力的，也叫我佩服！”

他哪里知道，人家朱大队长正在忙喝别的大事呢。

一九八三年春天，他跑到公社和郊区区委汇报：大队五百垧耕地，有二百垧还没翻。大队既缺种籽，又无马料，眼看种不上地啦！……他企图给人制造一个印象：傅贵光抓副业，不管农业！

上边一听，着急了。正好整建党工作队也在，队长和区里、公社的领导干部就到黑通来看地了。每走一块，就说好。粪上得多，地头地脑也耕耙得整整齐齐。公社书记田禄对傅贵说：“这一走，和汇报的不一样呀！数你进度快，质量好！”过了四天，地种完了。一位公社干部说：“老朱这两年在我跟前就没说你一句好话。把个黑通说得一片黑。”

是因为中国人爱静不爱动吗？下绊子和放暗箭的人，总是比骑马的人安全。前者一事无成，可以饱享清福；后者一旦马失前蹄，便前功尽弃。

今年全大队小麦空前丰收。朱自修大队长又该到市里披红，领回一张大红被面了吧？可是去年秋翻，他到地里来过一趟吗？是傅贵带着拖拉机去的。他专找洼地，踩着湿得陷脚的地，走在前面，拖拉机在后面跟着，把每块地先耕了四边，说：“就照这么干啊！”九十万斤小麦的基础是这么打出来的。傅贵凭他的观察，小麦吸水和蒸发的能力强，果然，今年春天四十天无晴日，小麦地却没涝，还取得了空前大丰收。黑通人每人分得麦子二百五十多斤。

老天爷对傅贵并没照顾。四年执政，倒有三年遭灾。两年大旱，一年大涝。今年继春夏持续低温多雨，瓜地全部遭灾，赶忙毁了，种上秋菜。又来了四十天无雨。秋菜倒还是长得很好，不料后来生了黑斑病，九月又来了一场雹子。由于今年基本建设收缩，红砖的市场又不景气。傅贵心中那张今年人均收入预计表上的数字，便连续下降。本来估计可以达到七百元，这个数字很可爱，因为正好是去年的两倍。现在却降到六百零七元了。

这个数字，也比去年多出一百余元，相当于一九七九年的十五倍。但是傅贵的目标是人均千元，还差一大截呢。他盯住的是这个。

## 第四章 是非功过？吉凶祸福？

### 被迫评功摆好

迄今为止，佳木斯市和黑通大队都没有发现地下组织、非法刊物和私人电台，可是反对和围攻傅贵的舆论和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事情有点反常。傅贵何许人也？他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佳木斯市郊区沿江公社黑通大队的支部书记，四千人的政治领袖。他得到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周文华、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一九八三年，《黑龙江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长篇报道表扬了他。省电视台记者不断来，关于傅贵的一部彩色记录片即将问世。按照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常规，傅贵的地位还有什么问题吗？中年读者心里都装着几个这个省、那个县出来的闻名全国的终身劳模吧？有的人变

质了。比如，靠四十年前种了几亩花生，当上劳动模范，再就不摸锄头了，啥水平没有，还能几十年如一日声名显赫。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成了地方一霸。可是这种人，从来不挨批斗、不进笆篱子，反对者无权发言，有权者吹捧庇护，在“文革”期间还能当上中共中央委员，有的至今余运不衰，那么为什么独独傅贵，二十年来坎坎坷坷，好不容易有了三中全会，本该时来运转，就是不当劳模、人大代表、什么委员之类，也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吧？怎么老是不得安宁，还有一根头发丝拴着的宝剑吊在他头上呢？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倘若我们向下一世纪的发明家借来一种仪器，测听对一个人的赞美和咒骂的心声，便会听到在傅贵式的政治家、哲学家、企业家、新闻记者的周围，有悻悻然、汹汹然的诅咒之声，乱箭般向他射来。

对于这种无形的压力和它所造成的烦恼，傅贵作出的反应也够独特的。一九八四年春节期间，他发起了反击。在大队播音室里，他连续用三个早晨和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把大队部里发生的争议向四千名居民摊开，请大家评议是非。他从自己的家史讲起，把他二十年来的经历和本人的优缺点也公诸群众，请人们公断。这倒是咱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新事，是傅贵又一个小小的突破。干吗非要把什么都包着捂着不可呢？一个书记，既然对几千人的命运起着重大作用，让他领导下的公民了解一下他的历史和功过，也是需要的吧？至于一个基层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既然已经发展到难以调和的程度，在群众中造成混乱，又不涉及党内机密，公开出来又有何不可呢？

十几盘录音带，不可能全部转告。只能摘取这部演说中我们没有写过、又比较有趣的一小部分，告诉读者。数字是枯燥

的东西，却又往往是不可缺少的。我请求读者耐着性子，看看傅贵在演说中列举的一张统计表。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数字，这也不仅是黑通大队四千人十五年来饥饱悲欢史。这是我们祖国经历的一场历史性巨变的一个缩影，能够象一首史诗般引起有心人的遐想和深思。

年 份	大队总收入	总支出	积 累	人均收入	劳动日值
1969	39万元	22万元	24万元	51元	0.52元
1970	50万元	20万元	7.6万元	88元	0.95元
1971	58万元	23万元	6.8万元	101元	1.05元
1972	56万元	24万元	5.4万元	91元	1元
1973	61万元	25万元	6.9万元	91元	1.05元
1974	64万元	29万元	9.6万元	86元	1.04元
1975	86万元	43万元	11.2万元	72元	0.64元
1976	79万元	39万元	12万元	75元	0.42元
1977	97万元	44万元	11.7万元	96元	0.74元
1978	97万元	47万元	7.8万元	106元	0.77元
1979	63万元	42万元	4.7万元	44元	0.37元
1980	140万元	45万元	30.6万元	186元	1.07元
1981	179万元	50万元	46.9万元	251元	1.33元
1982	272万元	63万元	55.1万元	344元	1.41元
1983	378万元	160万元	199万元	607元	1.44元

一九七九年，即结束十年灾难后的第四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黑通大队的收入倒创造了十年间的最低纪录！一九八〇年傅贵上台，当年就使大队收入比多数年份翻了一番或一番以上。一九八三年，大队总收入相当于一九七九年以前最高年份的四倍！人均收入是最高年份的四倍以上。

## “这群人没服输”

下面，我们就要听听傅贵的自白了。他是个粗人，又好冲动，用标准政治语言去衡量，有些话是欠文雅、欠圆滑的，但是只要咱们别忘了他是个基层干部，没人给配秘书替他撰写和修饰讲稿，就可以谅解了。报告文学得讲究真实性，因而对作者也请不要责怪。

“……我上台以后这四年，总收入从六十三万提高到三百七十八万，人均收入从四十四元增长到六百零七元，是多了还是少了？这几年老是在分配上出说道，作文章，造谣言。说黑通穷得有人穿不上裤子了，都是傅大头要成绩搞的虚夸。是不是我要成绩、搞虚夸呢黑通有十六七个生产单位，会计和出纳各有十六七人，大队还有总会计，都是能算会写有文化的人，能听我这个双眼睛摆弄？社员们啊，你们要清醒清醒，黑通有人造谣煽动，说‘别跟傅贵的屁股后头转，跟着他拣不着好粪！’有人还真就信了。照我看，你们不但没拣着坏粪，还拣着金豆子了呢！这几年你们哪个吃了亏了？工资多的一年有拿到八千多，五千多，三千多，两千多元的。那一百五十处新砖房，一万六七千平方米，是谁建的？前些日子生产队的牛分到户下，两三个小时，都让交现款的人牵走了。分队到如今，三千六百多元一台的拖拉机就进了二十台。这钱都是哪儿来的？一个社员说：‘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我同意这个观点。凡是出力干的，都富了。一天到晚偷懒瞎扯淡的，穷了。你穷你活该！谁让你不干来？瞧把你美的，穷了倒有仗势了！耍钱、扯闲话都是你干的。真要是遭了天灾病孽或者家没劳力的，穷了有情可原，咱们应该救济。可是有人凡对黑通有利的事一点

不办，拉屎都上柴禾堆去拉，生怕成了队里的粪肥。给你修了溜光的水泥厕所，怕你掉进去淹死你，还给你修了隔墙，让你摸着扶着，可是你偏往人行道上拉！那屁屁橛子有香肠那么粗，不是小孩儿拉的。这不是牲畜吗？你听着！我就是骂你了，你把我这话录下来！

“我来黑通二十多年了，没过几天好日子。我看黑通这地方，就是认不清好人坏人，是非不明，真假不分。从二队到四队，我把两个最穷的队整成最富的队，容易吗？可是到头来一个队把我批斗一百多场，一个队把我送进笆篱子。我不怪一般社员，你们是没权说话呀。那帮正事不干、专门整人的人，谁干事整谁，整下来他上去，他不干还要说了算，专门往家里搂。四队那几个人，把我关进笆篱子，你们应该有点志气，要点脸了吧？应该比傅贵干得好得多，也免得叫傅贵日后说你们嘛。连脸都不要的人还有出息吗？我当队长时四队存下的那些粮食，那二万五千斤粉条子都到哪儿去了？马号儿里拴着那十几立米松木和水曲柳哪儿去了？不都弄你们家去了吗？这事有吧？是真的吧？你们现在听着脸红不？社员们仔细听着，你们的眼睛可得擦亮点呀，这群人还没服输，他们还想重演一遍那场戏！

### “说说我的好处”

“黑通四千人，真正了解我的不超过十人。我今天要专门说说我的好处，有人不乐意听，我脸上也臊得慌。可是这也不是批判会，不能专讲我的坏处，是不是？咱们就综合着讲吧。远的不说，就说这四年。一九七九年以前，黑通大队有什么工业？除了那个一年收入四五万元的车间，就是一个小砖厂，还是我在四队搞起来，大队收过去的。他们一搞，净坑人骗人，

弄黄了，拉下的饥荒到今天还没还完。我上来以后，黑通建了两个大砖厂，在合江地区是大拇指头。光是水泥柱、瓦顶的砖坯棚子，一百三十米长一栋就建了八十栋，国营砖厂也少了吧？这是不是真？沙石场，百十里周围兄弟大队都没有，一年收入四十万，还解决了黑通几百个劳力的就业问题。老畜牧场黄了，咱们又建了个锹把厂，一年收入四五万元，还把社员的烧柴问题解决了。这不假吧？白铁厂，现在交给老谭头个人承包，八四年大队稳拿四十万，哪个不服？冰棍厂，二层楼，标准式的，年产冰棍二百万根，佳木斯人都吃着了吧？还有那两座大楼，大队办公楼五百平方米，学校一千八百六十平方米，都摆着呢吧？你们的孩子上学不坐砖头了吧？不用从家里抱柴禾来生火了吧？冬天外边零下四十度，教室里零上二三十度。这不假吧？早先葛文志和秦伟家前头那条南北道，下雨能不能走？现在不用人扛自行车了吧？东边朝北去的道，现在光溜不光溜？下雨还陷不陷脚？从前那大洼塘有多深的水，记不记得？这几年光栽树就近一百万棵，一棵树一年能长出一元钱来，这是不是给黑通的子孙后代造福？……这一切一切，是地壳变迁变出来的吗？是火山爆发烧出来的吗？同志们，你们得有良心哪，黑通倒底是好了还是坏了？我说的这些还有哪些不实？是不是我傅贵带领大家干出来的？一九七六年整我的时候，说我把四队弄成了空壳队，三台大热特拖拉机和一台汽车，说是我的罪。四队的人大部分还活着吧？你们心里明白，是谁把四队弄成了空壳队。现在还是那些人，又要折腾了，又要把黑通说成空壳大队了。

“不是我要给自己评功摆好，是那些人把我逼的。我是不服啊。也不是我吹。我傅贵，当队长象个当队长的样儿，蹲笆篱

子也象个蹲笆篱子的样儿。你们去问问，我胡说八道没有，我乱咬过别人没有！我不服。怎么黑通人挨饿受冻倒血霉那些年，老是喊‘大好形势’‘形势大好’的，现在真好了，又硬说糟了呢？那时候你们不准说阴暗面，怎么现在，你们和你们儿女从没吃过那么多的粮食、从没拿过那么多的钱、从没住过那么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也都成了‘阴暗面’呢？阴暗面有没有？有，就是你们这些因为丢了权、不能再欺压剥削老百姓的人！听见没有？谁敢到这儿来跟我辩论辩论？你们老是在下头小广播，那有多大意思！我坐在这儿一说，几千人一下都听见了。你们有胆子的也来试试，要能堵住我这张嘴，我甘拜下风！”

### “人得有良心”

“我的功劳，十个钟头也说不完，太费时间，不说了。现在咱们比一比人品。副大队长朱自修和倪万峰，还有孙维森什么的，咱们都摆一摆好不好？叫黑通社员见识见识他们的领导人，看看哪个为公，哪个为私，私心各有几斤几两，好不好？我傅贵当干部二十来年，佳木斯我跑了多少趟？你们到帐面上查查，我报过车费没有？再查查我报过一顿饭费没有？再查查我家里有没有队里的东西，队里又用了我多少东西。吃饭的时候去我家看看，哪一天没有两三个人在我家吃饭，都是到大队办公事的。省里来人，摆了两三桌，我收钱没有？那年二队斗我的时候，编了一首诗，说我家‘开了个资本主义大饭店，吃的是贫下中农的血和汗’。你们查查，我吃了哪个贫下中农一粒汗珠子？我个人的钱，有笔有宗的，支援各家盖房子买砖花了两万一千元。你朱自修还欠我二千六呢。你看看多少穷人家的房子是我借给钱盖的，我一次没要过。我这钱是贪污来的，

还是偷来抢来的？你再算算，我把钱存在银行里，三年下来是多少利？光是砖厂就欠我三万多，那是我儿子开车赚来的。五六万块钱我借出去了，可我家现在天天过日子还得跟人家借钱花。老朱，这种事你干了多少？倪万峰你又干了多少？沾你个人利益一点边，行吗？了得吗？老朱还说我儿子没劳动！砖厂成天使我的车，我儿子在二砖厂接连两个月拉着拖车干，给了我多少？我要没要过？后来我说，算啦，给三分之一工钱就行了，就这也没到手呀。就这么干，还有人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我这些事，登登报上上广播，有何不可？有人说这说那，是我让记者们来的？我请得动吗？……我也不谦虚。你们不是造谣惑众，有人心里也没个数跟着胡讲乱讲吗？我更不能谦虚了。这几天，又有讲法了。昨天有人专程来我家看我来了，说听说我大年黑里强奸了一个姑娘！谁造的？还不是黑通人！你们听着！这是我的话，你可以录下来；黑通还就我这个人最好。你在活人里找，你把死的也扒拉扒拉，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个人！”

“现在我要说朱自修了。老朱你们全家听着，最好录下来。说错了，来找我，我保证平反，还要负法律责任。我要把大队的事摆一摆，让社员们评评是非。别人说黑通穷了、坏了还可以，你老朱不该这样讲。你是大队长，去年以来还是副大队长，黑通穷了，你也有一份儿责任吧？你这些年穷了吗？你吃亏了吗？你拿的钱比我少一分吗？你那八间大瓦房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不是这几年吗？你老朱和我一样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没念过书，本该团结起来象亲兄弟一样。咱们俩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怨谁？这场战役是谁挑起的？”

“从刘少春当支书的时候，你就老是在背后说他这不好那不好。我上来，你反的更厉害了。你到处乱讲，就不想想你是干啥的？你不是二把手，大队长吗？这几年你到底有啥贡献？我干的那些事，其实都该是你干的，你不是分工管生产吗？你不干，倒也罢了，怎么还来破坏呢？怎么你一家人都拆台，还把我当成仇人呢？你一家人见了我就眼眶发青，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的！”

“老朱，人得有良心。你多咱也到这儿来摆一摆你为黑通做了几件好事。去年你带头搞私分，这是为什么！？从去年起你是副大队长了，让你到一队管财物。你把水稻私分了，干一天活分十斤水稻。我广播说不行，你背着我干。把两万斤水稻分光了，你也分了一份儿吧？分完水稻又分豆油，开会定了给关系单位的，你给分了。自己也捞了几十斤吧？卖甜菜籽收入几千元，买点化肥行不行？还点饥荒行不行？也分了。又跑到公社去告状，说人没吃的马没料，还要往公社牵马，把副区长和公安人员都弄来了。瞧你那天哭的，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还没说你从林业局弄两千元给自己买大车的事呢。把集体的车轴和轮胎也拿家去了。这是什么问题？定你贪污屈不屈？凭什么林业局跟你那么热乎？是不是你拿五队的东西换来的？我干着，你便宜着，你还不消停，弄得黑通老是不得安宁。我说的这些，哪条不实，咱们到广播上争对争对！我要是输到你手，决不带告状的。”

### “你们得认输”

“再说倪万峰，你别不要脸！你听见没有？你在黑通多少年了？你当了少年会计？你把七队搞穷了，我把你弄到砖

厂，又当了副大队长。你尽装老好人，净干俏皮事。让你负责三队的粮钱物，你私分没有？你为什么把电视搬到自己家里去？你那身呢子服是怎么来的？咱俩还算是亲家呢，你侄媳妇姓傅。可是你的孩子见我不说话，你姑娘找对象，凡跟我好的人，连象都不肯对，这是为什么？你还一肚子牢骚！……

“这几年，黑通老是有人兴风作浪。四队那个败家子儿孙维森，我不跟你算旧帐。把我弄进笆篱子的是你，把全大队最富的四队搞垮了的也是你，我追究过你的责任吗？那回你找我，我一桩桩一件件给你摆，说一件你点一下头。你们是孙家的人，每年包一顿饺子请我，也还不完这个情。我不求别的，只望你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干点好事。可是你还不服输，到处告状。你说公社把你要去，那是走了后门，连党委书记都不知道。怎么样？官司打赢了吗？我希望你今后还是改过来，多做点对黑通有利的事。钱交不出，可以记在帐上，地还是给你种。过去的事，揭过去了。我今后也不再说你了。

“这二十年整过我的人，大部分还在黑通。我一个也没报复。比如侯永禄，你贪污那五千多元，是有目的、有方法、有手段的。最近又有人揭出了一千四。定你个罪，判你七、八年徒刑并不为过。刘文汉死了，听不见了，活着的，你们的心愧不愧呀？不愧。好象你们整人还是整对了，那就别给我平反，别让我当支书呀。还是整错了吧？我也不要求你们赔礼道歉，可是你们得认输。这不是对我傅贵认输，是对共产党的三中全会路线认输。就因为你们不认输，又有人给你们撑腰，黑通这几年才老是安定不下来，老是有说道。这几年，你们不能再从社员身上捞油水了，就对现实不满。为了否定黑通这几年的成绩，你们什么方法没使出来？大队收入增加了，你们散布说‘光

那些地就卖多少钱！‘那地是我卖的吗？卖给航运局地的时候，我还在笆篱子呢。南边给军队的地，那是哪年的事？钱到过我手吗？你们是一点良心话不说。不是在这头找，就是在那头找，反正是 不肯承认黑通这几年的变化！’

### “这股势力有基础”

“你们这股势力，在下头也有点基础，那就是你们在台上整好人、整勤劳的人，执行那条左的路线那二十多年培养起来的那些混日子的人。你们把很多很多好人给毁了，所以黑通现在才找不出‘杨大先生’那样的好人来。也许是我眼睛瞎了，我在黑通就找不到突出的人。不论干什么事，要选拔出一个能人来，费死劲了。队长、会计、出纳，就老是这么二十四块坯，上下倒换。明知他护小头，私心重，想不用，可是硬是找不出个人才来代替他。连找个打更的都难。有什么高标准？无非是到点上班，晚上不睡觉，谁来拿啥不装老好人送礼罢了。上回南砖厂想用个打更的，掂量来掂量去就找不到一个人。咱们这是四千人的大队呀。想找个给十来个人做大锅饭的厨子，也就是一天做三回大饼子、馒头、大白菜大萝卜的吧。酝酿来酝酿去，也是找不着。后来找了个姓纪的，一月七十元工资。这人做完饭往那儿一坐，啥活手不伸。门外十步远就是菜窖，里头装的白菜萝卜。把窖门子盖一盖，别让菜冻了行不行？不行。把一窖菜全冻坏了，他一点不心疼。这事他连想都不想。那块儿东房山头有个厕所，是原来老王头用木头修的，干干净净。那两天下了大雪，你拿个条帚出来划拉划拉行不行？他不动弹。路封住了，就在墙根上拉满了屎尿。他一天干什么呢？到处扯鸡巴蛋，这儿一嘴那儿一舌头，里外挑拨是非。姓纪的，我说

你了，你算个屁！你家什么事找我我没帮助过？不用你，你还有说的呢，你能说出个鸡巴毛！

“不治懒，就治不了穷。你光看人家手里的花花银子眼红不行，你得干，你还得有本事！老想不出力，还得占点便宜，告诉你，那个时代过去了！跟我好的也别想占便宜，就是我爹，我也不答应。你们看看，黑通我偏向过谁？就因为这个，我没有亲信，有些人跟我好一阵子就掰了。凡跟我好的，你得让我对得住大家。王×为什么坐在家骂我？拉木头他偷木头，拉羊草他偷羊草。打我旗号上一队去骗菜，到砖厂去拉了一卡车煤。你就是我老祖宗，我也得治你！你恨我骂我算个屁，我才不在乎呢！”

“我希望全体社员心里都放明白点：从今往后靠成分好吃饭不行了；靠跟谁屁股后头溜须拍马整人吃饭，也不行了。往后，一切都得靠你本人；你人好人坏，是勤是懒，本事大小，都得在称盘上过一过，想换称砣是不行了。人人的是非功过，都得有个公断。昨天，刘文汉在敬老院发病，几分钟就死了。他外孙女和侄子给他穿衣裳，怎么也穿不上。你们敬老院里的几个老头儿就不能给穿穿抬抬？不干，眼皮都不撩一下，在那儿晃悠悠，还说‘不能在炕上搁着！’是怕臭，怕脏了你们。晚上十点钟我又去一趟，知道你们那几个人不会好好照管，怕狗把老刘头给吃了咬了。他们在那儿下棋呢，见我去，六十好几的人了，连个礼貌也不懂，屁也不放。那老宗头还说：‘赶明几个我死了，谁也不用操心，我个人上火葬场。刘文汉是党员嘛，我不是。’这是什么话！敬老院里的人，你们都听着！你们这辈子给黑通做过什么贡献？老宗头，你们一家连吃带搂，干什么好事了？社员们也想一想，咱们活着的时候还是多给大

家办点好事，将来老了，让年轻人养活咱们，也不至于心中有愧。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会刻在黑通四千人的心上；也可能印在纸上。不是很多人都在写回忆录吗？你活着的时候人家不说，死后可就挡不住人们说你和你了。就仗着你年纪大、资格老，人家就得听你养你敬你呀？没那事！……我越说越冲动，得赶紧控制。说错了的，希望给我指出来。

“现在说说我的缺点毛病。我这人毛病是比较重的。一个是我好冲动，伸巴掌打了好几个人。不管为什么，当支书的伸巴掌不对。可是打去年往这边，没有了吧？是不是没再伸过巴掌？再一个，我是家长式的领导，往往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毛病绝对有。你权力再大，本事再高，不民主行吗？往后民主还得一年比一年多才行。我改。再，群众怕我，我也确实一天拉拉个脸子；明明是好心话，叫我一说就不中听，就象鲁智深似的。还有，我这人气大，一来气，说话就伤人。这是我主要的毛病，可能还有不老少，请大家尽量多提……”

### 他是一个问题，答案也在里头

出远门的时候，傅贵总要想办法找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喜欢乘火车，那“突，突，突”的劲头就挺合他心里的节拍，再说，火车的车窗还能把宽阔的景致收入眼底。这人缺少点审美眼光，“那山坡，撂着多可惜！种一片松林，不是比野草强多了？……”铁路两边的庄稼，他都要看看，都要品评品评，一见地里的野草高了，心里就不痛快。火车过桥了。他望着溢出两岸的江水，心里又发痒了：“今年江水大，鱼头儿不错。现在正是‘敢条’鱼上网的时候，一条三十来斤重呢。……为什么夏天打不着狗鱼？亚马哈、折萝夏天也不出来，都到哪儿去了？这，

值得研究。”

因为他喜欢这个世界，他才同大自然和人生有那么广泛的接触面呢？还是因为接触得多，才更爱世界和人生呢？反正他看个没够儿。可是七几年两次进关，他走的都是直线——办事，买车，没去一个多余的地方。带儿子进关那次，路过天津时，儿子苦苦哀求父亲，一起到北京看看。傅贵硬是无动于衷。这些年，他也一直没看电影。老是象有一场火灾在前头等着他去扑灭似的。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走过这样一条曲折而坎坷的路程，仍然不畏脚下的荆棘和前面的艰险呢？

他身上印着四处伤疤。右颊上至今残留着四十年前那匹小黄马的齿印。右手上，被于白毛子咬伤的拇指上伤痕犹在。右脚上，是七十年代岭南开荒时同荒草的粗根搏斗在踝骨上留下明显的印记。头部正中，是八十年代他在砖窑带头取出滚烫的砖时窑顶上一个可疑人物丢下的一块红砖留下的伤疤。

然而他生活道路留下的这些记载，仍不足以使人相信他是他实际上是的那个人。十几年来围绕他争议不休，就因为他这个人很难放进我们长年惯用的那些框框里面。

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刘秀霞，也不大理解他：

“跟他一起过这大半辈子，真老象是在半空中悬着似的。外边一吵吵，我脑瓜子就轰地一下子：是不是我那老傅又跟人家唧唧啦？他这人，别的我不操心，就是那个脾气，嘴冷。明明是好心，比方说那柿子不大好，你可别吃坏肚子呀。他一说，就两样了：‘你他妈怎么搞的，那柿子能吃吗？给我撂下！’人家还想，我吃个柿子都不让。其实，让人吃东西他还怕人嘴小呢。平时千好万好，一句话就把人得罪了。‘工作好干，伙计

难搭'呀。他跟谁吵了一架，我就得偷偷到人家赔不是去，低三下四地：‘我那老傅呀，就是狗脾气，他就是那体性，嘴黑。千不是万不是，都看在大妹子身上，原谅点吧。’

“有时候他还动巴掌撇子的。一出事，我急忙就得上门去道歉。我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回来我再劝他：‘你再动脾气，手痒的时候别动手，自己把手掰两下子行不行？人家正找缝儿下蛆呢。你不骂不打，他能挑咱啥？’

“人家当干部的，两边不得罪；他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再加上嘴臭，能不结仇吗？我常说他，各扫门前雪不得了？这碗水非得你替人家去泼呀？咱们人单势孤，‘好虎架不住群狼’呀。我真怕哪天晚上他一个人前头走，后头“梆！”一下子。他倒不在意，半夜回来门也不插。

“出笆篱子，公社的人又让他当干部，我劝他别干，‘你爹就是为你当干部死的，将来你老婆子也得死在这上。’不听。

“后来我又劝他见好就收，不然挨整那天可就晚了。听说他那砖厂一年要出一千万块砖，我吓得忽悠一下子，咋那么多呢？能行吗？话说小点不好吗？从此，一下大雨我就一宿睡不好觉。坐起来往外看，心里祷告：可别再下了，把砖坯都浇堆了，多大损失呀。还跑去问保管：坯架子上都苦上席子了吗？一刮大风，我从路上看大棚（简易温室）呼达呼达的，就想：大棚那边有人看着吗？压上了吗？又一想，我这不是胸坎子上挂笆篱，多捞这份儿心吗！

“人家都不显山、不露水的，蔫咕咚地把钱挣了。他可好，老说他有多少钱。我说，包子好吃不在折儿上，你尽装大爷，人家不勒你大脖子呀？他说：‘也不是偷的，光明正大，唉’，一家有了千家怨’哪。

“值不当的事儿，也来找他。有时候大年三十儿的坐这儿哭，我心里真不乐意。不吉利呀。一个人说他爹要死了，没钱发送。老傅借给二百。人走了，还不知道那人姓什么！”

“我真不服他，可是他的道道儿又都实现了。那天赵松林来，对老傅说：‘你在笆篱子里想的那些事儿，都办到了。你胜利了！’可是谁敢说将来怎么样呢？”

九天九夜，我听傅贵讲述他的生平。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是：他是个人主义者吗？不是。他是个先进人物吗？是。他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还超过很多先进人物呢。

可是听他的自我介绍，倒很容易使人想到他二十年来所做的一切，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他自己。

“这些年我和那些人斗，为的是什么呢？我要证明我没错。我要让大家看看，我是真的为大家办事，我有本事把事办好。”

他甚至不讳言他还有更多的个人动机。

“名利二字，我重名。那座学校楼，五十年内倒不了吧？我活不了五十年。等我死后，要是有那么两个学生想起来，说句‘多亏那老傅贵……’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自己的估价，是不是太高了呢？

“说我骄傲，我有点。你在黑通找找，有没有第二个人！连我那老伴儿，别看几十年了，她也摸不透我。归根是我想出的事跟她太悬殊。她老是说不到我心上。怕我干大了，张了脚，得罪了人。老是说，楼不盖不行吗？砖厂不盖不行吗？能听她的？那就什么也干不了。指望几句话解劝得了我？指望我泄气？没那事！我就是觉得我高明。我有把握。我也真的一次也没失败过。”

“我不谦虚。我看我有五个优点：一，不自私，打记事起没受过小，当干部必须手脚干净，这才有本钱，有说服力。什么叫威信？我看要有信才能有威。你先使威，那就叫威吓，不叫威信。是不是？二，我健康，干什么能出大力。三，我业务熟，我爱琢磨。四，我能吃苦，劳累、辛苦不在乎。五，不但能吃苦，还能和那些坑害集体的王八蛋们斗！”

有这样自我宣扬自己优点的中国人吗？可是话说回来，他说的这些，你可也驳不倒他，因为是事实。综观他这一生，这些话并无夸大之处。问题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话不该他自己说，由别人来说就好了。

他要表现他自己；他要实现他自己；他不停地鞭策自己一定要超过别人。然而他又全靠自己的劳动，靠实干，靠扒地皮和动用各种有用的因素，而不是靠剥削他人、践踏他人，不是靠整人和害人去表现和实现他自己的。这个从小儿要发财、又很善于找钱的人，现在却视家财如流水；别人有难，挥金如土。干这种好事又象流水一样自然，泥土一样朴素，正如他显示和夸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一样，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用不着半点勉强。他没法儿写日记，但即使他写，大约也不会把每天干的好事记下来，再写下些豪言壮语。

他也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但是——

“应该打盆说打盆，打罐说打罐。人有一百个好儿，有一个过，就全给麻撒了，这合理吗？我见过一些干部，出一点错儿，几十年翻不过身、抬不起头来。不干事的人，成天哼儿哈的当‘太平官’，倒平安无事，按年头儿辈份往上升。我看这个不改，中国好不了。”

他是不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呢？

“我崇拜人。有能耐的人，出大力的人，有作为的人，我尊重。”

这是事实。他说过他尊重和喜爱的很多人。但是，看来他也很欣赏他自己。

“自古雄才多磨难。这些年的刁难、谣言和攻击，把我的精力和心劲儿给削弱了三分之一。今后要是不整我，我还能做很多事。我心里还有好些花骨朵儿没开放呢。”

一个目标，是使黑通大队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千元（家庭副业不计算在内）。那以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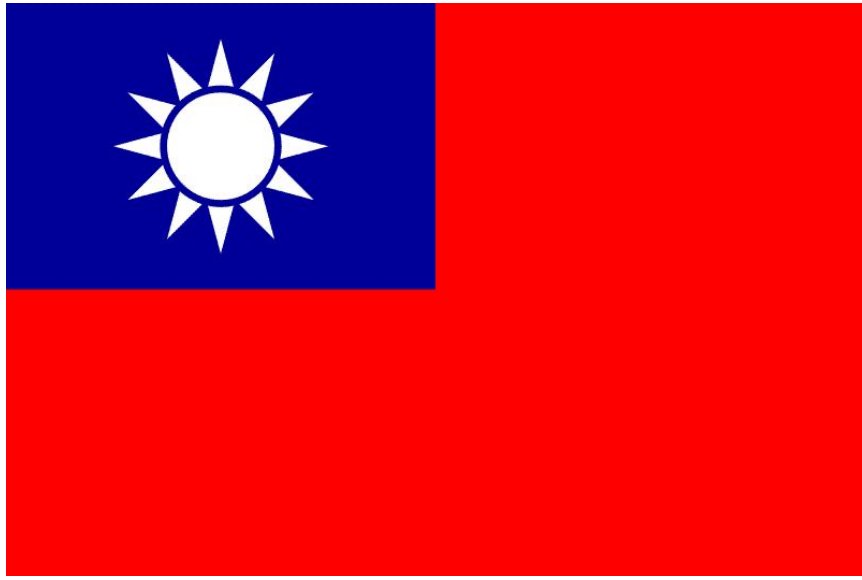
“我有个汽车。我把全家人放到大篷车上，到全国去旅游！”

傅贵，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想，他是个武将的材料。他若早生三十年，会是个马占山式的人物。他会被穷困和压迫逼上梁山。他会劫富济贫。他会成为一位抗日将领。

然而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只要给他中学以上的文化（天哪！在祖国土地上众多的新老文盲里，埋没了多少可以跻身世界名流的英才！），他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一个出色的组织者，甚至一个诗人。

怎么评价这个人呢？有些规范对他是不适用的。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他的一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可是明白人也不难从那里悟出一个答案。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稿，一九八四年七月补充，修订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